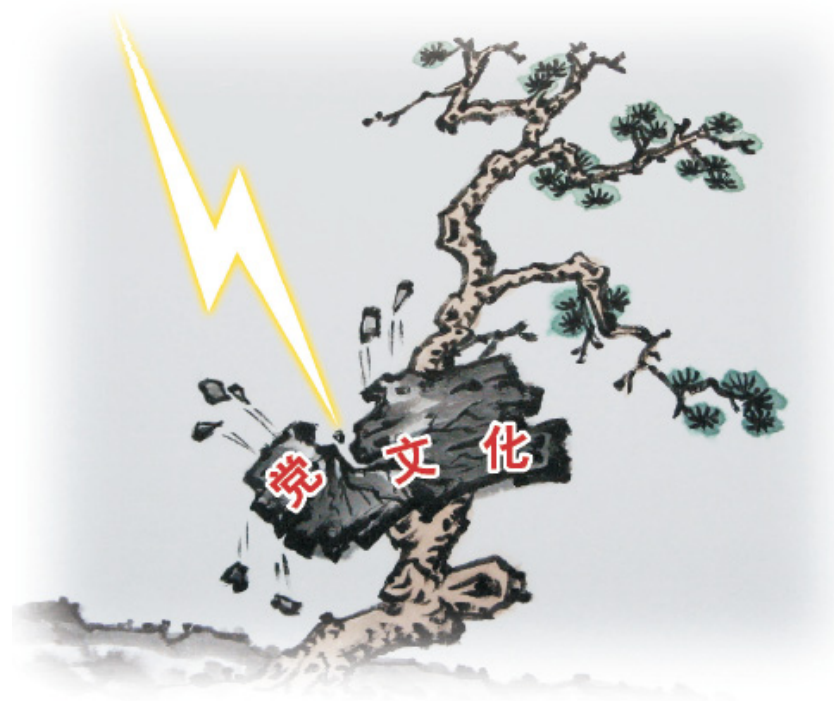


解体党文化

(下)

第六章：习惯了的党话	2
第七章：生活中的党文化	35
第八章：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	54
后 记	81



第六章 习惯了的党话

引子：语言——民族的灵魂和记忆

语言是人类用以储存记忆、交换信息、传递经验、教化后代的工具。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

据《易·系词下》记载：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抬头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现象。俯身观察地上山川河流等变化规律，观察鸟兽皮毛文采与地上适宜生长的植物，近则取法于人身，远则取法于各物象，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与神明的德性相贯通，用来表征万事万物的情状（“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话虽然是讲八卦的起源，但我们几乎可以把它移用来概括中国语言的起源。先民们把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形象提取出来，制成半抽象半具体的符号，用来表征天地万物，并且与神明沟通——这就是汉语的来源。汉语的起源决定了其字形和语音与宇宙有着巧妙的连带关系，语言成为沟通天、地、人三者的桥梁。

语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由于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活动都以语言为中介，因此可以说，一个文化的形态就是该民族语言的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创造文化，就是创造一种独特的语言；毁灭文化，就是毁灭承载这种文化的语言。

古人云，言为心声，文以载道。古人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赐予他们的语言文字。从存世的典籍我们可以约略看出先民的语言风貌和精神风貌。从深奥精微的《周易》，到简括透辟的《老子》；从温柔敦厚的《诗经》，到瑰丽高洁的《离骚》；从微言大义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记》；从质直少文的汉译佛经，到恢弘华美的唐诗、绮丽婉约的宋词、酣畅淋漓的元曲，汉语记录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内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个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语言，一个自爱的民族必然爱护自己的语言，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语言。

可是，由于近代中国在文明进程中遭遇种种内忧外患和屈辱，一次次军事和外交的挫败使很多人渐渐丧失了对古国文明的自信，也丧失了对中国语言的自信。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废除汉字、线装书扔茅厕……知识分子提出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危机意识深重的民众不暇深思，一些方案于是在社会上赢得了相当程度的赞同，汉语的纯正性开始被缓慢侵蚀。虽然如此，这些局部的对语言文字的摧残和变异，由于没有政权的大规模介入，并没有对语言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视正统中华文化为其专制统治的最大障碍。面对人口众多的中华古国，中共无法完全撇开传统另搞一套，因此它选择了借体寄生、从内部毁灭民族文化的做法。它对汉语的态度也不是连根拔起，而是继承表面

在破解党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对比党文化与中国正统文化或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尤以前者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文化复古。中国几千年流传的文化中也存在着许多糟粕，为党文化的推广与建立提供了着力点。我们所推崇的是儒释道信仰中所包含的敬天敬神、珍惜生命、重德行善的精神，并由此达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

《解体党文化》一书所描述和批判的很多问题，共产党并不都是始作俑者，很多其实源于人性自身的弱点。神传文化能够帮助人们对这种人性弱点进行反省修正，而党文化却恰恰是有意地引诱甚至强迫人们向外寻找问题的原因，千方百计放大和利用人性弱点，加以极端化，使其破坏性的规模和强度超过任何其他社会和时代。正因为如此，没有真正对自我道德良知的反思和拷问，我们就清除不了生命微观中的党文化，甚至会为自己在党文化建立过程中的推波助澜而寻找借口，不敢正视。

共产党摇摇欲坠，却又是个庞然大物，其巨大的阴影造成了许多人的无奈。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人们在数着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其实，人们在直线外推历史发展时，常常没有意识到改写历史的经常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历史上无数强权在突然之间倒塌了，那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是神的安排。

对神不敬，必遭天谴。天灭中共，此乃天意。共产党不可一世，但天意难违。《九评共产党》及其掀起的退党大潮，正是天意在人间的展现。而解体党文化，清除党文化的毒素，正是顺天意而行的必然之举！

解体党文化，才有未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才能重建人与神的联系，重建人与人的和睦，在广阔壮丽的新天地中修身养德，生生不息。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就算能够把表面的礼数学到家，人们心里并没有对神传文化的尊崇，不过是为了用孔夫子赚些钞票，这种形似而神非的炒作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破坏。宗教的归宿在彼岸，而中共发展的宗教首先要接受不信神的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宗教，何以面对神的教诲？用传统文化包装党文化，是中共对传统文化的再次糟蹋。

博大精深的神传文化，被共产党掏空了神的内涵，掏空了文化的灵魂，只剩下一堆杂要和古董。信仰的失落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并引发文化的堕落。今天的“中文热”，热的只是外人们想到乱世的中国捞一把银子，哪里有历史上“万邦来朝”时对大唐盛世和中华文化的仰慕？中华文化被中共破坏得如此不堪，还有多少文化的神韵？如何立足于世界？失去了文化之根的中华民族还能走向哪里？

历史给了中国一个机遇，也成为了一个劫数。共产党走投无路为自救而启动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境地。穷怕了的中国人，在稍稍松绑之后爆发出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勤劳智慧创造出了经济的奇迹。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文化的支撑，需要道德信仰的支撑，需要一个适应发展的政体的支撑。但是，承载着一个十几亿人的巨大经济体的却是党文化，而党文化正是扼杀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的刽子手。于是，一方面世界掀起中国热，中国变得日益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道德诚信全面崩溃，整个社会极度腐败，生态环境高度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民怨民愤，信仰真空，媒体钳制，人权恶化，外面的人想去中国淘金，里面的有钱人想方设法资金外逃和移民他国……有人说中国要崛起，有人说中国要崩溃，真个是乱象丛生！

人们并不是认识不到，乱的根源就是共产党。包括中共媒体都在讨论，反腐败是体制问题，治理环境是体制问题，解决金融危机也是体制问题，人权和信仰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都知道一切问题的最后都卡在了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党的问题，而中共的底线就是决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党的因素成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障碍，去除党的因素成为正常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包括重建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

人们找到了乱的根源，却找不到问题的出路，因为卡在了党文化上。人们被共产党制造的各种谎言和造成的恐惧包围着。或者被谎言所误导，或者被恐惧所震慑，在如何对待党，如何清除党因素时，人们的思维表现扭曲混乱至极，明明知道共产党危害中华，却要去为共产党寻找各种借口。《解体党文化》一书正是详细论述了党文化的建立过程和在方方面面的种种表现，以期帮助人们摆脱党文化，解体党文化，恢复正常的思维。其实，那些中共编造出来的谎言，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地貌似完备、高深或诱人，如果我们回到基本的道德是非层面，那些谎言都不值一驳。

每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崛起，中共也在利用这个口号为自己贴金，继续蛊惑民众。但应该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不解体，人们不从党文化思维中走出来，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在历史上，中国曾被称为“天朝上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我们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或武力的强大，亚历山大、凯撒大帝乃至纳粹德国的武力及经济都曾盛极一时，但他们的帝国却迅速衰落、分崩离析，唯有中国依靠文化的力量让我们民族的血脉延续了五千年。

形式，输入党文化内容，使党文化的毒素附着在民族语言的肌体上。这种做法，对于中共来说，可谓“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文艺团体，没完没了的会议、堆积如山的文件、不间断的狂暴政治运动，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党文化新词和特殊的表达方式，再用字典、词典、各种工具书、教材、语言规划部门的文件把它们固定下来。简化字的颁行使年轻一代无法阅读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党魁创造了新的语言规范和美学标准，大、中、小学一以贯之的党文化教育使学生们把邪恶僵化丑陋虚伪的党话当成理所当然。时至今日，同志、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党八股词充斥在文件、报刊、书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铺天盖地的党话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语言现实。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营造的语言空间中却冥然不觉，以为现在使用的语言是民族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以为天下所有正常人都这么说话。离开了党八股，人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

中共盗用国家政权对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深刻伤害，可以说前无古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被党文化严重污染的语言，严重地损害了人们反思中共、反思党文化、构思民族未来的能力。很多人都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人们用中共制造的语言批判中共，愤怒声讨中共的文章仍然称中共建政为“解放”，有人在“退党声明”中仍然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让人简直难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弃中共，还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权摇摇欲坠、人民亟待回归正常人类文化的今天，认清附着在民族语言上的党话，清除党话，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1. 相互叫“同志”

中国人最熟悉的党话要算“同志”了：张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长同志，领导同志，司机同志，局长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台词和生活中的习惯用语：“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们，冲啊！”，“一条战线的革命同志”，“同一个战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学习”，“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一词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都不觉得它是共产党的词了。

有人从中国古籍中或者成语中找到几丝“同志”的踪迹，但应该说被共产党流行起来的“同志”一词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一个外来词。考证起来，“同志”来源于英文单词 comrade，常见于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 comrade，后来引入中国，作为对于志同道合（特别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称呼。十九世纪末，清光绪皇帝在筹划“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对变法派的大臣采用了“同志”这一称呼。在同盟会以及以之为基础而创立的国民党内，“同志”一词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同志”在国民党内使用的时候，更象是一个普通名词而非称谓用词。在使用称谓时，依然采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张先生是我们忠实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泽东、罗学瓚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

其新的涵义。1923 年以后，在中共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也多了起来。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同志”一词在中国大陆地区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中共头目在 1959 年还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在其党内一律称“同志”。实际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扩大了，使得这一称呼并非仅仅在党内使用，而是成为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了，并习惯将这一称呼放在对方姓名之后，甚至放在职称之后，成为一种最经常使用的称谓。例如：“张同志是忠实可靠的”，“部长同志”，“工人同志”，“妇女同志”等等。

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人际交往时的称谓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党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赋予人“集团”、“党派”、“帮派”的性质。这个称谓具有鲜明的选择意味，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遵从中共的“革命”目标，服从党的领导的就是同志，背后掩盖的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剥夺。人们天真地以为，彼此称“同志”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的平等和亲切。恰恰相反，“同志”让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同志”反映的是绝对权威，“小平同志”表现的是领导一切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显示的是阴谋家的火箭窜升。什么时候中共干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过平等的“同志”？

中国自古对于称谓是很有讲究的。《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君要象君的样子，臣要象臣的样子，父要象父的样子，子要象子的样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子路》记载，子路一次问孔子：“如果卫君有意让您来主政（卫君待子而为政），您将从何处下手呢？”孔子说：“那一定要从‘正名’开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说起来便不顺；说起来不顺，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那么刑罚也不能中肯；刑罚不中肯，民众将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在传统观念中，制订并使用恰当的命名是“为政”（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出发点。恰当的称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把人置于一个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使人的行为有所依据。

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外衣，语言也能创造出物质现实。中共就是这样在废除传统社会以天然伦理为基础的称谓系统的同时，废除了传统宗法制度，把社会中原本定位有序的个人变成了无序无位的帮派教派成员。

把丰富的称谓简单化为“同志”，其实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需要。“同志”一词也确实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国家成为主流称谓。这一称谓在社会学上的特征为：（1）个体独立性差；（2）群体封闭性强；（3）社会包容性差；（4）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里，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就是另类，就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中共发行的毛选开篇即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共树立的几大“民主党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亲密朋友”，中共也都称他们为“同志”。“对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象严冬般冷酷。”“同志”这个称谓所具有的肃杀政治气味，人们也早已习以为常。凡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为敌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在上个世纪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于

后 记

中国曾是神眷顾和传播文化的主要地方。在远古时代，人神共存，在神的引领下，人们直接奔人体、生命和宇宙去研究探索，留下了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中医、汉字和预言等辉煌的成就。历史上慈悲世人的神佛，下到人间救度众生，留下了许许多多神迹，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他们共同缔造了独具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华神传文化或曰半神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一场场以天作幕地作台的人类文明兴衰的历史大戏中，让东方的华夏古文明奇迹般地一脉相承，延绵不绝。

宇宙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层层叠叠纵向和横向空间的无数的生命，经历了成、住、坏、灭的过程，走到今天，各个空间中败坏了的势力安排了共产邪灵，利用邪灵在人这个空间的表现形式共产党来危害人间。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神州大地上，共产党采取了高压浓缩的方式，用无神论、唯物论破坏神传文化的精华，否定传统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确立共产党的文化理论；采取铺天盖地的暴力方式，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灌输进化论和所谓的现代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思想改造，把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基本粒子；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人们开始用颠倒的是非标准、变异的思维方式、八股的话语系统、暴力的行为方式作为日常思考、语言和行为的基础，中共由此建立起了为维持其生存而需要的邪恶的土壤环境——党文化。

当神再来到人间时，神的子民们已经不再信神，而且还要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神，用最刻薄的语言去嘲笑信神的人们。

但是，历史跟共产党开了一个大玩笑。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之后走到今天，如何满足十几亿国人的文化需求，如何面对同世界接轨时的文化输出，如何因应世界兴起的“中文热”，如何平衡与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共产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在“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走向世界的时候，号称代表“先进文化”的共产党，居然羞于让它的“先进文化”——无神论、唯物论、马列主义、毛思想等等——跨出国门半步。在西方总统访问中国要高调去教堂做礼拜敬仰神时，中共领导人出国访问却从不敢搞一个公开的“马列主义先进文化”的讲座。

终于，中共在其文化走向死胡同的时候，把眼光投向了被它批倒批臭的所谓“封建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央视的晚会上出现了《千手观音》，孔庙门前也变得熙熙攘攘，中共甚至也号称要大力发展本土宗教了。舞蹈《千手观音》中所表现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人最熟悉和崇拜的神，不过从编导到演员，在细说作品的创作和排练过程时，并不认为其中有神的内涵。官方的解说是“观音菩萨不过是劳动人民善良的化身”，也就是一介凡人而已。相由心生，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们心灵的直接反映。无神论者展现神的故事，人们除了欣赏到表演者纯熟的技艺外，体悟不到救苦救难的觉者的慈悲和圣洁崇高，也没有超凡脱俗的与神沟通的心灵感应及自我灵性的升华与超越。孔庙祭孔却“忘记”了如何祭孔，祭孔典礼乱如菜市场，更闹出供牲中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的笑话。

出来。他们发现不用再看政府过滤后的假新闻，不用再被党文化塑造自己的思维，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才是人真正应有的生活状态。虽然中共媒体一直对东欧国家进行妖魔化宣传，以表明中国人决不能选择抛弃中共、和平过渡的道路，实际上除了少数国家外，东欧改革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东欧转型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尽管共产党可以再次组党参加竞选，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再次选择共产党，也没有民众再次选择党文化。抛弃共产党和党文化的东欧人，失去的是一座监狱，得到的是平静地安享自由和正常人的生活，社会和国家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更加生机勃勃。

因此，丧钟只为中共而鸣；亡党不等于亡国。中共是现代中国人苦难的根源。不理智的怀旧只会加强中共对你心灵的控制，使你无法摆脱昨日的梦魇。

解体中共，解体党文化，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新生。

结语：回归正常思维

人的头脑就象一个口袋，装进去金子他就是一袋金子，装进去一袋党文化，这个人就是一袋共产党思想，不知不觉地成为共产党的传声筒。中共的宣传覆盖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人从有成就的学者到普通百姓，离开了党文化，都无法正常思考、无法正常说话了。

共产党就是要让党文化、让意识形态、对党的恐惧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细胞深处、心灵深处，形成条件反射。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化的产生与传播，而是为了建立中共独裁暴政所需要的“软专政系统”，也就是思想专政系统。在党文化里，不管是中共最高层的官员，还是一般百姓，都生活在党文化里，难以逃脱党文化思维的影响。这个恶果相当可怕。

中国人的党文化思维不是一天一时形成的，它不是某个个人某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状。这个过程是中共长期有意识造就的。它运用一套扭曲的道德善恶标准，通过暴力灌输和血腥恐怖，通过欺骗宣传与扭曲逻辑，让中国人对一个强行霸占中国社会资源的集团感激，让人们恐惧，让人们成为党文化的囚徒和奴隶，乐于接受中共谎言而排斥正常思维。正是这种不正常的思维，维系着中共的谎言欺骗，维系着中共的暴力专政，维系着中国人的苦难与悲剧。

要改变一种定型的思维或心智模式，需要深刻的反思，一种集体的反省。但党文化的思维恰恰不是内省的。在中共的资讯封锁中，人们要想听取不同的角度看法都很困难，更不要说一种新的视角对人们惯常思维的冲击了。但是要想走出党文化的陷阱，回归正常思维，真正做自己心灵和思想的主人，我们今天就不能不正视我们曾被中共扭曲的思维，主动改变自己在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要想真正爱国，真正为这个民族的将来着想，就需要抛弃党文化的思维，用正常人的方式来思维。要真正得到健康的生活和社会，需要每个人清除自己的党文化思维。因为中国社会是每一个中国人一起组成的，其中包括你。

“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家庭）或有点儿历史问题什么的，长期蔑视你的人称呼你一声“同志”，你能激动得浑身发抖。

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可能会面临着失去“同志”资格的危险。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仅仅是犯了错误，哪怕是严重的错误，失败的一方通常还可以保留党籍，并且尽管很少再有机会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例如讣告），官方文件依然会称他们为“同志”。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的性质比犯错误更严重，失败的一方通常会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今后的官方文件也不会再称之为“同志”了。同样，在共产党的国际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这一称呼，也反映了两国是否还属于同一阵营。

典型的“同志”既无个体意识，也无社会公民意识，承担不了正常社会中公民应负担的责任，剩下的仅仅是对上级帮派组织中共的服从。众多“同志”不能构成正常意义的社会，仅能构成团体和宗教。这个团体采用控制的方式拢住人心，并执掌国家政权，把社会变成邪教式的封闭体系。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共历史上，众人在挤进“同志”行列的同时，不惜把他人打成敌人，以至人人为敌。

这个称谓通过千百万次的“称呼—应答”的实践，具有强烈的暗示诱导作用，使人们加深对中共集团的认同感。《九评共产党》揭示出中共是一个害人的邪教，“同志”的称呼就是这个邪教团体对其信徒的召唤和控制。每次你对“同志”的称呼做出无所谓的应答，就是承认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强了邪灵控制你的那个无形的纽带。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在党、政府和军队内部的正式会议和文件中，人们依然会按照以往的方式来使用“同志”这一称谓，但在社会上的使用面开始缩减，一般人在正式场合相互称呼不再使用这一政治意义非常浓厚的词，而是更多地使用“先生”、“女士”、“小姐”或者更显人情味的“师傅”等等。不过，人们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亲叫不听话的女儿“小同志，你听着”，朋友聚会“来来来，同志们，干杯”，求人帮忙“都是革命同志嘛”。这种看似不当回事的叫法，却是党话对人民生活潜移默化最深版本。只要人们乐于叫“同志”，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人们就在共产党的志，就在坚持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极权专制。

2. 典型的党八股词

上面列举的“同志”只是习惯了的党话的一个例子。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大多从小就生活在党文化造就的语言环境里，对党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根本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自然的。换句话说，人们还以为所有的正常人都是这么说话的。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党话是共产党为了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刻意制造并推广的，因此在非共产党的政治体制里，并没有使用党话的需要；共产党到来之前的中国人也从来不是这么说话的。中共经过几十年的高压统治和封闭灌输，不光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强烈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系统。目前中国大陆社会人们讲话的语言中，相当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过或是中共造出来的语言，而且是张口即来。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些典型的党八股词。需要强调的是，党话中的词汇、语句并不一定都是共产党造出来的，或者是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所特有的。凡是在党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义，并服务于共产党统治的词句，都可以归为党话。

比如“团结”一词通常表示不同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其他语言中也有意思近似的词。但在党文化的斗争哲学中，“团结”被加入了特定的含义。被宣布为“团结”的对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属于中共定义的“自己人”，但又不属于敌对的一方，比如所谓“民主党派”就是中共“团结”的对象；党文化中常用的“团结大多数”隐含的意思是，“极少数×××分子”不在被“团结”之列，因为他们是打击、斗争的对象；当中共宣布党的×××会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并不表示会中没有不同意见，而是宣示“以×××为首的党中央”是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与“党中央”不同意见者已遭到整肃，或者至少目前没有机会表达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在党文化中“团结”一词已经被加入了服务于斗争哲学的特定含义，所以称之为党话词语。

1) 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传达、领会“×××会议精神”、“统一认识”、“坚持×××路线”等等用语，对于生活于一个正常社会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为什么大家要走同一条路？为什么要统一“认识”、要传达、贯彻×××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讲“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说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见和选择，这样组成的社会才丰富多彩。

中共不断变化自己的立场原则，走的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圆圈，不断改变方向、甚至多次走回头路，可是在每一个历史时刻，中共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确“路线”。中共“路线斗争”往往你死我活、残酷无情、肮脏无耻，“反动路线”的追随者下场悲惨，“正确路线”拥有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每次中共路线斗争结束，胜利的一方都会宣布落败的一方犯了“×××主义”的错误，左倾、右倾、左派、右派、形右而实左、形左而实右等等。总之，只有胜利的一方走在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他们的角色是“思想汇报”、“提高认识”——最终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承认坚持和追随“路线斗争”中胜利的一方，向党表忠心。

一般的会议都会有一个决议。因为大家对同一件事的认识有分歧，或者什么事需要很多人一起协调去做，才有开会的必要。人们在会上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决议，会议过后按照决议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在会议上意见得不到统一，那么最终往往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怎么做。通过投票产生的“会议决议”是不同方面意见妥协的结果。虽然可能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满意，但这也是民主的议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会议的参与者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而“会议精神”就不同，它是在开会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党中央”、“党的上级组织”的意见，跟会议参加者的看法无关。参加会议的人只能“领会”会议精神、“传达”会议精神、“贯彻”、“坚持”会议精神，却决不能质疑会议精神、挑战会议精神、反对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人只不过是受支配的木偶，牵动木偶线的是躲在后面的中共。如果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认识”，最后达到“统一思想”，服从中共的精神控制。

在党文化中，这一组词语的功用是通过反复使用而强行进入人们的习惯语汇，最终在人们潜意识中形成条件反射般的对应行为，从而无法觉察到自己已经被变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壳。

2) 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

的国家形象。相反，他们带来了美国荣耀，因为他们以巨大的勇气捍卫了人权与尊严，带来了平等与公义，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们的努力，改变了一个种族的命运，改变了美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中共诋毁人们对中共政权和中共迫害中国人的揭露，经常用的一个理由就是国家形象。但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正义者们的精神和目的，如果我们明白了中共是中国形象的真正伤害者，那么，我们会更容易理解今天无数反对中共暴政的抗争者，尤其是千百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和反迫害的努力。维护信仰和制止中共对无辜百姓的迫害是中国人民的正当权利。他们的努力，事实上维护了所有中国人的天赋人权和尊严，维护了中国人的形象。

6) 丧钟只为中共而鸣

有些受到党文化洗脑深的人，一听到中共要完了，就想我们该怎么办啊？好象中共完了，他也完了。

在一次“九评研讨会”上，一位老太太提问：共产党垮台之后，谁给我们发养老金呀？一位主讲人回答到：没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了这个庞大的官员系统，而这个庞大的官员系统是一群世界上最腐败的官员，没有了他们以后，中国老百姓的退休金要翻倍地成长。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看看海外的华人就知道，没有共产党，日子完全可以过得更好。如果中国大陆不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今天人均收入应该与台湾类似，那么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等于美国、日本、俄国等几个强国加起来的总和。中国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来说，没有共产党不是他们的末日，而是他们的真正解放。没有了共产党，他们才能真正施展才华，发挥才能。现在的官员都不得不主动顺应中共的粗暴领导，或者干脆被党的系统束缚住了手脚，想干正事干不了，想不堕落却不行。

现在的中国人，大半生或一生都生活在共产中国。虽然这段历史充满了恐怖和荒谬，但很多人的青春、理想、友谊、爱情、婚姻、家庭、成就甚至整个人生都和中共统治的这段历史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那些为民主自由奋斗了多年的人，他们的智慧和辛劳也和这段历史纠缠在一起。因此，很多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共的罪恶，但在感情上还对中共的党文化存在相当大的依赖。比如，有人不自觉地唱所谓“革命歌曲”来配合内心的感情；或者拿这样那样的“红色经典”当艺术；受到不公待遇的人怀念“毛主席”时代的绝对平均；对外来文化冲击担忧的人错把党文化当成中华文化而维护等等。这种怀旧情绪反过来又使人们无法真正理智地审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因为自己本身的经历和中共联系在一起，对自己的维护和珍惜不由自主地也分给了中共一份。一旦没有了“党”，有些人好象话也不会说了，手脚不知往哪儿放了，人生的意义也不知应该寄托在哪里了，心里甚至觉得空落落的。

其实，一个人成就一番事业，实现人生价值，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是中共把人逼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空幻而险恶的小道。古来的圣贤在正常的社会里，通过自己的修为和涵养，达到了崇高的人生境界。“天生我材必有用”，各行各业的精英也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青史留名。没有了共产党的中国社会，将会恢复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将会更加关爱和睦。

东欧共产党国家解体后，在党文化下生活的民众从谎言包装的生活下解脱

是党造成的；最后把爱国定义成坚持党的路线；起到混淆概念的目的，让人把爱党拥党等于爱国。

4) 爱国不等于爱党

中国自古以来都不缺爱国者，但爱国并不是爱党。真正的爱国者关心的是人民的疾苦，而不是忠诚于一个领袖、政权或党派。因此，爱国者经常针砭时弊，批判现实。屈原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则控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人都是中国真正的爱国者。按照中共今天的标准，他们很可能就会因为“恶毒攻击政府”，“反党反政府”的罪名遭到批判，身陷牢狱。

中国大陆如今流行的观念，其实是要在中共政权的意志下，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去行动，并为符合中共利益的成就欢呼，这就是爱国了。其实这是一种荒唐扭曲的爱国意识和爱国行为。2003 年萨斯（非典）爆发，卫生部长张文康信誓旦旦表示中国很安全，非典得到控制。但他显示的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对人民的忠诚。他是爱党，爱他的乌纱帽，而不是爱国，爱民族，这样的爱党付出的代价是中国人民的生命。真正的爱国者是蒋彦永医生这样把萨斯真相公布出来，使萨斯能够被重视，使人们能够采取措施，挽救更多生命的人。真正的爱国，不是为了向中共表示自己的忠心而做出的种种“爱国”的表现，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中国负责任。反对当权者对中国人民的迫害是真正爱国的表现，是因为中共的诋毁、中共混淆党与政府、国家的概念才制造了种种思维误区，让人们不能理解被迫害者和和平抗争的正面意义。

5) 谁在伤害中国形象？

对于批评中共的人，共产党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伤害中国形象，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但非常清楚的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批评中共当然不等于批评中国。事实上，真正伤害中国形象的恰恰是中共。中国古人讲“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自己做好，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自然就会变好。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对信仰者、独立思想者、敢言者的人权迫害，利用共产党的体系搞残暴统治，在国际上扶植暴君和独裁者等等行为是国际批评中共的根本原因。因此，正是中共的高压残暴政策，伤害了中国的形象。而那些批评中共迫害民众做法的人，恰恰是维护中国形象的人。它意味着中国人敢于捍卫自己的尊严，有勇气去改正自己的错误。

2005 年 10 月 24 日，美国一位名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妇女辞世。50 年前，她在阿拉巴马州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拒绝服从不公正的种族歧视法令，拒绝向白人“让座”。她的公民抗命义举引发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种族隔离制度因而被废除。在她的葬礼上，国会参议员肯尼迪说，美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英雄。同样身为黑人的美国国务卿莱斯发言说：“没有她，我今天不可能以国务卿的身份站在这里。”

另一位受到美国民众高度尊敬的民权领袖是马丁·路德·金博士。1963 年，他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组织了一次 25 万人的集会，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就在这次集会上，他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次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死后十五年，美国设立了国定假日“马丁·路德·金日”以纪念这位民权领袖，他是除了华盛顿总统外享有此殊荣的唯一普通人。

没有人会认为罗莎·帕克斯和马丁·路德·金给美国丢了丑，损害了美国

时下在年轻人的流行语中，“领导”这一称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用来指称“老婆”。人们常常听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称，“这事得回家请示一下领导”。这反映了“领导”在党文化中特殊的广泛意义。在正常社会里也有“领导”——如老板、主管、经理等等，但他们的管辖仅局限于业务范围之内，反对领导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被“炒鱿鱼”。可是，在党文化里，“领导”管辖的范围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领导”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领导”也能管，从评职称、涨工资到结婚、离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对领导不仅仅是丢饭碗而已，还可能面临“挨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头，还可能在档案里被塞进黑材料，走到哪里都摆不脱。

“领导”之所以能无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单位”里。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过“单位”来解决，或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在“单位”里，每个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测的“善恶簿”，叫做“档案”，其中记载了一个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大大小小的奖、惩历史，从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风问题”……几乎事无巨细，全被记录在册。一个人要想“调动”离开某“单位”，需要接收“单位”发“调令”，如果本单位“领导”不同意，可以卡住“档案”不放。最令人恐惧的是，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看“档案”的，所以这个“档案”永远保持神秘，当事人无从知道“单位领导”把什么材料塞在了里面。还有一个与“档案”紧密相连的过程叫“政审”，这个过程中“领导”可以调阅审查某人过去所有的社会活动记载，需要时还可以动用人力到各“原单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审核某人“对党的忠心”，直接决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参与“重要工作”。

有了“单位”，党只要保证“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轻易控制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

中共派驻“单位”的代理机构是“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角色常常热泪盈眶地说，“终于找到组织了。”现在人开玩笑时也经常这么说。“和组织失去联系”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组织”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结论”，“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是中国人自我心灵安慰中常说的话。“有组织”常和“有计划、有预谋”联系起来。“法轮功有组织”是个罪名。“组织上”表达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党组织”是对敌斗争的指挥部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归属感、孤独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赖感、绝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党话灌注到“组织”这个词里。构成“组织”的个体是“同志”。“党”把社会划分为“单位”，以便于“组织”全方位地附体在社会的肌体上。

此外，中共还通过“户口”进一步控制社会。“户口”、“暂住证”大概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绿卡”、“短期工作签证”之类，只不过限制对象是本国公民。这对于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三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的中共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莫大的讽刺。

总之，“领导”、“单位”、“组织”、“调令”、“调动”、“档案”、“政审”、“户口”、“暂住证”等等一系列党话词语，反映了人们处于中共严密的邪教组织监控之下的生活特征。它们时时在提醒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体制外”几乎没有生路。在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人哪怕得罪了上司，大不了还可以回家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就算得罪了皇帝，还可

以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但在中共严密控制的社会，“单位”、“调动”、“档案”、“户口”等等使这一切都不再可能。虽然今天“单位”、“调动”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党文化形成的思维模式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成型，由此派生出的常见党文化思维依旧阴魂不散，比如“跟党作对没有好下场”，“党给了我饭吃”，“党把我培养成为一名×××”等等。

3) 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

中共建立的社会具有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在这里，“党”的意志至高无上，因此党的政策无需讨论也不能讨论，人们能做的只是“宣传”、“贯彻”、“执行”，而且“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优秀文化的传播靠的是其本身的吸引人之处。中共虽然号称“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可是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谋福利，因此制订的政策往往违背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才需要“宣传”、“号召”人去做这做那。积极响应党的“宣传”、“号召”，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被称为“劳模”、“标兵”，他们实际上是这个等级社会最底层的“螺丝钉”。中共的“宣传”、“号召”以暴力为后盾、以利益为诱饵、以欺骗为手段。“贯彻、执行”的是中共的意志，跟到底应该怎么做无关。如果有了成绩，那是认真“贯彻、执行”的结果，出现失误、造成事故，则是因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或者“把党的方针、政策教条化”的结果，反正党的方针即“真理”。

在“单位”之上有“上级单位”、“领导”之上有“上级领导”，最后一直到“党中央”。“中央”文件、“会议精神”下达到哪一级，哪一级可以接触部分海外资讯、可以享受什么待遇，都有严格规定。“党中央”是“真理”的化身，而“上级”比“下级”更接近“党中央”，所以也就更接近“真理”。因而“上级”来到“下级单位”就代表党的意志，叫做“指导”、“视察”、“慰问”，“下级单位”要记录其“讲话精神”，要“请示”、“汇报”。尽管有时“老上级”、“老部下”还可用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并不消除他们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上级”、“部下”之间的纽带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党”。

在正常社会，人们通过选举自己的民意代表（比如议员），参与社会管理、发表意见，民众可以随时自由地与民意代表沟通意见。如果选出的代表不能令人满意地履行其职责，民众还可以在其任期到达之前动议罢免。但在中共治下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高高在上的中共大笔一挥：我代表人民群众……可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让中共代表。中共先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划到“广大人民群众”之外，作为“一小撮”严厉打击，然后宣称自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共曾经“代表人民”杀害了上百万“人民”中有财产者（“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代表人民”饿死了上千万“人民”中无权无势者（如“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国社会也有为中共充门面的“人大代表”，可他们不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而且其主要职能是“代表”中共而不是代表人民，让他们“举手通过”中共的决策、粉饰中共的极权本质才是他们存在的真正目的。

各色各样的“×××委员会”、“×××办公室”是中共等级制度中直接听命于中共高层的特权实体。比如中共的“政法委员会”的职责据说是“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确保政法部

以为是在爱国的面子，其实是在爱党的面子。

在正常社会，人们拥护政府是不需要表达的，因为他们的选票已经表达了这一点。恰恰相反，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是需要表达的。政府无论做得多好，那都是它份内之事，当初百姓不就看你能做好，才选了你吗？反过来，政府做得不好，那就下台，换个能做好的上来。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法国总统出访，法国大使馆要组织人去欢迎他。民选政府领导人也有这个自信，他不需要这样的外在形式来证明他的权力合法性。而共产党这么干的时候，它自己都意识不到，欢迎的人也意识不到，这是中共缺乏执政合法性而伪造的补救措施。

党、国不分的混乱思维是中共有意制造的。中共知道自己只有几十年的根基，又是舶来品，所以需要找个依靠。中国人向来爱国，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于是中共几十年来一直把自己吹嘘成爱国者，把自己打扮成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欺骗百姓。同时它把党和国家、人民、政府总是连在一起用，爱党爱国，反党反人民，反党反政府，因此制造出种种党与国之间的混乱。

3) 中共不等于中国

我们需要确立的一个常识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了几千年，而中共的出现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统治中国不过五十多年。

中国一词自古有之，最早指居“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原地带。近代以来，特别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一词始成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法律和政治概念。一般而言，从历史的角度，“中国”是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经历了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和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朝代和政权的连贯历史的整体。从地理的角度，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约13亿）的国家，国土面积排行第三。从政治或行政的角度，目前存在两个政体：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

当一个人提到中国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可能是一张中国的地图，或者是那里的亲朋好友，熙来攘往的人群，也可能是长城、黄河，地标性的建筑，文物古迹或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等等，但不会是一个政党。这都是人的自然反应。国家的内涵包括了国土，国土上的各族人民，经济、科技、文化、饮食、教育、节日、社会、宗教和政治等诸多层面。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而中共不等于中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货风行世界，标签上的“中国制造”，没人会理解成“中共制造”。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的确把中共等同于中国，爱国等同于爱党。一谈到中共，很多人就下意识觉得是在谈中国如何如何，“没有了共产党中国还能存在吗？”，“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还是拥有广泛市场。

在中国人普遍不相信共产主义，贪污腐败盛行的今天，“我党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好”等政治口号已经不足以再让中国人相信共产党。为了保持中共的统治，不让人们质疑为何要让共产党来统治中国，中共再次把党和国家概念混淆，利用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来引导中国人把爱国情绪放到党身上。爱党的行为和思想被中共宣传为爱国的行为和表现。

中共中央制订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用中国人经济建设成果来让人坚持党的路线，用党的路线的内容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自我肯定，党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偷梁换柱说，中国的成就都

(13) 党把“反党”标成“反华”

虽然党无处不在，弄得人们分不清党同政府国家民族的概念，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共产党掩耳盗铃地把“反党”、“反共”涂抹成“反华”的主动混淆是非的宣传。

共产党的暴政在世界上名声很不好，有的西方国家在移民时有三种人不受欢迎，纳粹、恐怖主义和共产党。说有人反共，那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是，中共在批判反共言论时，总是给对方贴上“反华”的标签，“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坚定反共的称作“反华头子”。如果是中国人自己反对中共，更被骂作“卖国”、“给中国人民抹黑”等等，潜移默化地灌输“中共”就是“中国”，就是“中国人民”。

党成为“一切”后，人们就真的弄不清党同政府、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了。

2) 人们混淆了党同政府、党同国家和党同民族的概念

批评美国总统的人，没有人攻击他不爱美国；批评美国共和党的人，也不会有人攻击他不爱美国人民；反对执政党，并不意味着就是在反对美国政府；不论是在美国白宫前还是在美国之外抗议美国政府的美国人，不会被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也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在给美国人民丢脸。反某个党，更不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

但是，当有人揭露共产党、批评社会黑暗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破口骂道：你是中国人吗？在海外，如果有人对中共高官抗议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愤怒不已，认为给中国人民丢脸。当有外国政要批评中共的时候，中共会奋不顾身地起来批判，老百姓也跟着附和。这些人的愤怒常常是出自内心的。当你在曝光中共的恶行时，他觉得你此时此刻真的是丢了他的脸，他认为因为你揭露中共的丑事而使他遭到洋人的鄙视，看不起他，让他的脸在洋人面前挂不住了。可是，洋人们根本就不会有这种反应。中国人敢于出来揭露一个专制政权，反而会让洋人们佩服你的勇气和良心。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有这种“丢脸幻想症”呢？就是因为混淆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党与民族的概念，把自己作为了中共的一分子。很多人不自觉地吧爱国等同于爱党，以为批评中共就是批评中国，反对中共就等于反华，就等于出卖中国人民。

中共领导人出访时，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就是有抗议人群也有中共组织的欢迎人群，但欢迎人群基本上是见不到被欢迎者的。那为什么还来欢迎呢？他们自己的理解是，欢迎不是目的，本来就知道领导人不会同他们照面，安排他们来的目的完全是针对抗议人群的。胡锦涛 2006 年访问美国白宫时，有西方媒体采访欢迎队伍的组织者，问道：“你看对面啊，有两千多人的抗议队伍，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欢迎队伍的组织者回答说“中国领导人来访是一个很高兴的时刻，在这个时候抗议领导人，是不合时宜的。”这个回答很可笑，因为你说现在不合时宜，那你能给这些抗议人一个合时宜的抗议时机吗？你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那个机会去见中国领导人，就敏感问题上访是“扰乱社会秩序”，要坐牢的。而领导人到民主国家访问，人民才有机会去抗议，为国内没有说话权的同胞表达诉求，可有人又说在“高兴的时刻”去抗议是“不合时宜”的，领导人出访又都很高兴，那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去抗议了。欢迎人群他们觉得他们是为了表达爱国热情来对付抗议人群的。可是，不让中共领导人听到受到迫害的人民的心声，中共如何能改错呢？改不了错，继续迫害民众，对国家和民族不是灾难吗？这种后果是爱国还是害国呢？说白了，那些欢迎的人

门的执法活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问题是司法、执法部门本来只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动即可，在各法治国家皆如此，何须在法律之外“统一思想”、“坚持方向”？实际上“政法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确保当正常的法律活动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法部门坚持“党性”而不是坚持法律原则。与此类似，“六一零办公室”的设立，就是为了能够运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手段对付法轮功民间信仰团体（不然只要公、检、法就足够了，根本不必成立“六一零办公室”）。再比如各地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就具有在法律之外抓人、抄家、强行结扎、流产等等权力。

当人们习惯于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等党话词语的时候，实际上加强了中共建立的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更便于这个金字塔结构之巅的“中央”对全社会的控制。

4) 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

“运动了！运动了！”电影《芙蓉镇》结尾中，疯了的王秋赦终日敲着破锣发出的嘶哑叫喊令人心悸。从“肃AB团”、“延安整风”、“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尊法批儒”、“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镇压反革命暴乱”、“反法轮功”……从中共诞生之日起，“运动”不曾停过、斗争不曾断过。斗争哲学是中共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共的邪教生存方式，不断斗争可以淘汰异己、培养成员的“党性”，为党充电、补充能量。人们习惯的党话包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斗争精神、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敌斗争、一场……的斗争、斗争的依靠力量、斗争的打击对象、“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语）。

受党话影响，在现代中国人的语汇里，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把斗争当作生活常态。比如人们要努力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习惯性地会用“奋斗”这个词。“为……而奋斗”，“经过多年的奋斗，我终于……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正常人干什么事只需要努力即可，为什么要去斗呢？又比如在很多中国人的用语中，“妥协”被视为贬义词，它往往和“投降”联系在一起。可是“妥协”这个词本来是中性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谈判，最终往往是参与各方做出让步、妥协，才能够达成谈判结果。在国际社会中，发生冲突的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往往是战争、流血，所以首先承诺放弃武力、主动做出让步、妥协并促成冲突缓解甚至和解的一方往往被提名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党文化中，斗争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妥协”是缓和矛盾，“阻碍”历史进步，所以就成了贬义词。

“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开展斗争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党文化中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和传统文化中的“内省”截然不同。后者是内心的自觉修正过程，其参照标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也是普世的价值规范），如“仁义礼智信”，目的是达到精神的升华、内心的纯净，放弃低俗的欲望和追求；而中共的“自我批评”或“自我检查”则是斗争手段，其目的是“统一思想”、开展斗争、清除异己，参照标准是中共的教条，但是由于中共的教条是不断变化的，“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九评共产党》），所以这个参照标准实际上成了对党的忠心程度，前提是“党总是对的，错的总是自己”。所以“自我检查”者要扭曲自己的观察，通过自我检查，给自己强加一个罪名，以此表示对党的

毫无保留、一片忠心。“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自觉净化自己的心灵，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或物质利益被迫扭曲自己的心灵，以期通过“党的考察、考验”。

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批评”往往还是为了“批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熟悉这样的场景：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某党员先说几句自己“性格急躁，工作方法需要改进”之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连篇累牍地批评、攻击别人。其特点是向外找，鼓动人与人互相攻击。

这些党话对人们思想行为潜移默化的改变起到了很大作用。习惯于党话的中国人，自觉在日常生活中“以斗争为乐”，并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挖取尔虞我诈的整人术等糟粕加以应用，“和为贵”的中国传统就这样被变异成了“窝里斗”的党文化。

3. 中共用党话重组中国人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用暴力改变世界。而一旦某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煽动起群众的狂热，就会转化成非理性的暴力行动。因此，共产党从产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理论和承载理论的语言。语言可以说是共产党“改变”世界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中共在中国改天换地，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它凭借的工具之一，也是语言——一方面铲除传统的正常人的话，另一方面制造党话或把人话改造成党话，再用党话去规范制约中国人的生活。本节首先用列表的方式列举一些常见党话，让读者朋友对无处不在、人们已经习焉不察了的党话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然后从政治体制、精神生活和私人空间几个方面，阐述党话是如何重组中国人的生活的。

1) 习焉不察的党话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党话遍布精神信仰、政治体制、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个人的思想感情等各个领域，体现了中共的邪教属性、暴政历史、“运动治国”和“流氓治国”的政治手段、对社会和人们思想的严密控制、森严的等级制度、对真实历史的歪曲和篡改、对正信和正常人类社会的丑化和污蔑。党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覆盖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请看下表（表一）：

称谓	同志，领导，上级，书记，支书，战友，爱人
历史分期	解放，建国，解放前，解放后，旧社会，新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荒唐岁月，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九年春夏之交，一九九二年那个春天
家庭出身	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狗崽子，黑五类，红五类，出身好，唯成分论，老子英雄儿好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
个人身份	党员，团员，队员，群众，积极分子，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
个人定位	我为党干了一辈子；我是新中国长大的；我是长在红旗下

中共喊了多年的“党政分开”，但党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的，根本分不开。从中央到地方到街道到乡镇，书记永远是一把手。这种从上到下密密麻麻的一把手权力架构，让人们无奈地接受“党才是真正管事”的现实，人们也习惯于说“党和政府”而不是“政府和党”，觉得离开党来谈事情，没有意义。

（10）党从宏观和微观同时控制着政府

共产党并不是给每个单位派个书记就完事了，而是本身从中央到基层有一整套的并行于政府机构的班子——“中央军委”与“国家军委”，“党中央”与“国务院”，“省委”与“省政府”，“县委”与“县政府”，“乡党委”与“乡政府”——政府有“公检法”，党有“政法委”；政府有“广电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人事部”，党有“组织部”；政府有“监察部”，党有“纪检委”。党是一把手，党委永远领导政府。人们想象不出没有了党，政府部门该如何运作了。同时，政府官员都由党系统任命，政府官员反过来绝大多数又都是党员，官员身份的二重性进一步把党和政府盘根错节地绕在一起。正常社会里，各党派的党员、组织机构不能由纳税人供养。但是共产党却直接附体到了政府身上，各类专职、半职的党务机构强行由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

国家的运作本来靠政府，但是共产党附体到了政府身上，并从宏观和微观同时控制着政府，掌握着政府大大小小的决策。从宏观上讲，行政部门层层由党领导，“党中央”领导“国务院”，所以政府要听书记的；从微观上讲，政府官员本身又是党员，在党员小组会上，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以，宏观上摆不平的事，党通过微观的手法一定会摆平。如此，一方面党完全控制了政府，让后者成为其傀儡，另一方面也让人们难以分清到底哪个是党，哪个是政府，由此而经常把党和政府混为一谈。

（11）党利用一切好事为自己涂脂抹粉

运动员得了奖，科学家把卫星送上天，农民有个好收成，申办个奥运，修了个水库，中共都会把功劳算在自己身上。时间久了，人们还真认这个邪理了。把有点突出表现的人再诱骗发展入党，这样好事都成中共干的了。所以，有个现象，只要说一点中国的好事，人们自然就觉得是在说中共的好事，都能成为给中共涂脂抹粉的颜料。有一个词叫“党的政策好”。党不管农民，农民有饭吃了，党不管个体户，个体户发财了，没有党干扰了，百姓日子好过了，这本来是暴露共产党有多么不好，但共产党反过来把这叫“政策好”，老百姓跟着就感恩戴德。现在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靠的本是廉价劳动力、海外投资和中国人的聪明勤劳，中共把这些都当作自己的资本。其实，恰恰相反，中共急功近利维护其合法性的心态，造成了多少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以及社会不公和道德败坏。是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的大市场才掀起的中国热，可是中共的宣传总是把世界对中国的重视当作对中共的拥护。

（12）党动辄就要代表一切，领导一切

中共独裁专制，却很喜欢把“国家”、“民族”和“人民”挂在嘴上，动不动就发声它要“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如何如何。老百姓没有发表言论的份儿，只好被“代表”了。而反反复复被“代表”后，也就习惯了，好象中共真是“代表”。

党不但代表一切，还管一切。党管政府，党管军队，党管国家机器，党管外交，党管着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党就象癌细胞，侵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真是民族的大不幸。

把党和饭碗等同起来的时候，“反党”就成了“反人民”了。

（4）党代表“先进”

共产党热衷于划分“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落后分子”是斗争的对象，而党员必须是“先进分子”，是“先锋队”，是社会的“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于是，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未来”、“走向”。在这样冠冕堂皇的宣传攻势下，恶党居然成为“好人”，于是人们的潜意识中就更加依赖共产党。

（5）党是“出路”

整个社会的权力被控制在党的手中，不入党就提不了干，不入团个人前途就受影响，甚至不让入少先队都会成为奇耻大辱。加入党组织成为人们在社会上找到出路的前提条件。党同人们的事业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了。

（6）党掺和个人生活

党支部书记不务正业，也没有什么正业，除了宣传灌输党的方针政策，外加抓思想工作。这个思想工作不但有监督群众是不是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的这种政治思想，还包括邻里纠纷、职工纠葛和家庭矛盾。于是，党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私生活都分不开了。

（7）党标榜自己是“道德化身”

虽然共产党社会的道德都很低下，特别是现在的大陆，道德危机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共产党在宣传上总是一以贯之地把自己标榜成道德的化身。每个时期都有一堆道德口号，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五讲四美”、“精神文明”、“三个代表”、“以德治国”、“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等等。因为它倡导的道德观只是忠于党维护党的道德观，共产党自己又是不讲道德的，所以道德总是越来越下滑，到了今天已是乱象丛生了。但是，这些道德政治宣传运动让人们误认为党是强调道德的。在学校，道德课也是属于政治课，同党绑在一起，让人相信是党要求人们学道德的，虽然中共宣传的道德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但是从小就灌输党是所谓“道德化身”的教育体制，让人总是相信党本身是好的，坏事是个别人干的。这一切都把党同它自己造成的道德败坏分开了。

（8）党以国家民族的代理人自居

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是最朴实的公民意识，而共产党把这些感情的表达完全操纵在自己手里。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的教育基本上是通过共产党的少先队、共青团和党支部来组织宣传的，宣传的时候总是打着爱国主义教育用一堆一堆的谎言来灌输对共产党的热爱。这样，从小教育到大，习惯于从党那里接受有关国家民族的信息，人们不但觉得共产党是爱国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更加热爱以国家民族的代理人自居的党了。

中共在宣传爱国主义时，有一个专用词汇，叫“爱国进步人士”。这里的“进步”就是指拥护共产党。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支持共产党的人爱国才有意义，才是正确的。反党的人不配爱国，或者，爱国是“落后”的，是错误的。这种宣传确实能把人们的思维弄乱了。爱国就是爱国，是超越政治的，中共的这套把戏反而说明中共是不爱国的。

中共还有一个词，叫“反党反人民”。它把这两件不相干的事放在一起说，长期下来，人们也就习惯认为反党的就是反人民的了。

（9）党是一把手

	的一代人；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
论资排辈	老革命，老红军，老首长，老上级，资格比我老，离退休干部，第×代领导核心，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荣誉称号	劳模，标兵，优秀党员，优秀团员，红旗单位，党的好儿子，党的好战士，党的好干部，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理想	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和谐社会，以德治国，红旗插遍全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思想方法	怀疑一切；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实事求是；解剖麻雀；真理越辩越明；你不打他就不倒；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
国内形势	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大乱达到大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国际关系	一边倒；和平演变；主权高于人权；中美必有一战；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党暴力起家	工农武装割据，枪杆子里出政权，两把菜刀闹革命，“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党“一贯正确”	向前看，定调子，交学费，拨乱反正，拨正船头，一场噩梦，痛定思痛，生死存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保持和党中央的高度一致，关于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特立独行”	反潮流，造反有理，要算政治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党残酷无情	铁拳，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在萌芽状态
党“宽宏大量”	甄别，平反，纠正，结论，落实政策，补发工资，安排工作，宽大处理，留党察看，向组织交代，党内严重警告，开除党籍留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党“有人情味”	送温暖，下基层，办实事，排忧解难，深入群众，为人民服务，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党“决心从良”	整党整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拒腐防变，净化党风政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党绝不退出历史舞台	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防止和平演变，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党的江山是几千万人头换来的，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
文山会海	讲话，作报告，吹风会，神仙会，务虚会，中央文件，红头文件，上级指示，中央精神，领导意图，党中央的声音，第×届×中全会
经济	国营，待业，下岗，内退，大跃进，放卫星，生产队，供给制，双轨制，公私合营，人民公社，一平二调，计划经济，经济特区，买断工龄，集体所有制
军事	总政，总参，超限战，党指挥枪，军委主席，钢铁长城，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人民子弟爱人民
教育	学工学农，开门办学，又红又专，白专道路，四有新人，革命接班人，接受阶级教育，德智体全面发展，五讲四美三热爱，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新闻	内参，敏感，枪毙，自律，舆论导向，党的喉舌，报喜不报忧，中宣部点名，党的宣传中心，上级审查部门
与天、地斗	抗洪，抗旱，消灭四害，改天换地，人造平原，围湖造田，大兴水利，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与人斗	定性，交代，检查，检讨，政审，外调，掺沙子，挖墙角，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从……开刀，扩大化，划清界限，错误路线，你死我活，无限上纲，打开突破口，拉出来打进去，鸡蛋里挑骨头，永世不得翻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借群众运动打击异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时代口号	“……站起来了”，“×××万岁”，“保家卫国”，“人民公社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为纲”，“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打倒……”，“反对……主义”，“向×××同志学习”，“抓革命，促生产”，“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炮打……”，“备战、备荒、为人民”，“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团结起来，打败……”，“团结起来，争取……”，“团结一致向前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讲”，“三步走”，“三个面向”，“三个代表”，“三个有利于”，“四有”，“四化”，“四项基本原则”，“五年计划”，“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进行到底”，“×××压倒一切”

为了稳固党的统治，中共严密地控制社会运作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机构从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穷乡僻壤，无处不在；行起事来从杀人放火到战天斗地，可谓无所不敢；就是节庆婚嫁和女人生几个孩子，党也要无所不管。党所到之处，“政府”、“国家”和“民族”就变成了党手中的木偶，线牵在党手里，为党服务。

今天的许多中国民众，不是不知道党同政府、国家和民族是两回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心理上党的影子是如此沉重，如此微观，“党”成为左右中国人命运的解不开的符咒。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人们觉得离开共产党来谈这个政府、来维护这个国家、来兴旺这个民族，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就象离开水来谈鱼儿，觉得简直是胡闹瞎扯。于是，党、国家、政府、民族等概念的理论区分挡不住经验范围内的混杂一处，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情结也就全都转融到了对党的情结中。反党就是反政府，就是不爱国，就是反华，就是卖国，就是给中国人丢脸，给民族抹黑。党伪装成政府的权杖、国家的化身、民族的代表。一言以蔽之，党就是一切。

1）党就是“一切”

（1）党自封为“亲爱的妈妈”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孝道中对母亲的孝顺最为突出。共产党就把自己比作了母亲，甚至比母亲还要亲的亲人，从而获得民众的百般孝顺。儿不嫌母丑，共产党再坏人们也愿意去维护党的形象。

（2）党号称自己养育着人民

党不种地不织布，哪里能养育人民呢？正相反，是人民养育着党，是“纳税人”的钱养活了共产党。

但共产党通过国家机器控制了全中国人的财富和资源，“共”了全中国的产。拿了原来属于中国人的东西，再“恩赐”一点给百姓，人们自然觉得是党送自己上的学，为自己分配的工作，为自己介绍的对象，为自己分的新房，为自己发的退休金。长期的封闭灌输造成的母亲情结，让人们本末倒置地普遍觉得“共产党再怎么不好，但毕竟它对我有养育之恩啊”。其实恰恰相反，正常社会里人人都要上学工作，成家立业，从来没有听说是哪个党的功劳，一切是人们自己的劳动和付出所应该得到的，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国人生活的改善绝不是来源于共产党，而是来自自己的辛勤劳动。而且，没有共产党的剥削和压榨，中国人的生活肯定比现在更好。君不见，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不是有更多的人上学，有更好的工作，更大的住房和更多的退休金吗？

（3）党控制饭碗

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相信这个外来的邪劲十足的“母亲”。不过，“人是铁，饭是钢，三天不吃饿得慌。”“党妈妈”对于不听话的人自有“大义灭亲”的办法。不给你饭吃，你怎么办？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前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任何一个人需要找工作，都得到党那里去找，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象党给了我们饭碗一样。直到今天，党只要愿意，它可以不讲任何道理地抢走我们的饭碗。这反而让人感到——党本来可以抢走我的饭碗，但它竟然没有抢。由此人就对党“感恩戴德”，觉得饭碗是党给的，却不想想“党本来可以抢走我的饭碗”这个前提本身就是荒谬的。从心理学上讲，党越把饭碗控制得牢，人们也越觉得是党给了自己基本生存的保障。人民是离不开饭碗的，当人

讲党八股话也是由中共党文化的话语系统决定的。在党文化里，歌功颂德、吹须拍马、政治表态，构成了中共官场三大特色。正如第六章《习惯了的党话》所分析的那样，中共的党话具有黑社会的鉴别身份的作用。会讲党八股话，是中共对其帮派成员的基本要求，是该成员飞黄腾达的通行证。不讲党八股的人，则被认为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不被信任，受到排挤打击。人们要欺世盗名，要削尖脑袋往上钻，抑或只是为了在夹缝里卑微地生存，都不得不说党八股。还有的人认为讲党八股话才符合中共统治社会中的“主流”，把党八股话当成场面上的话随时随地来几段，显示自己很入流，有本事。别人也觉得他会说话，很佩服，这样又加重了这种习惯，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3) 党八股的毒害

习惯性讲党八股话的党文化思维带来严重后果。

人们对党八股话的传播，不管人们是违心还是讥讽，都使得党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生存的一部分，因而在不断地给中共创造着生存的环境，起到维护中共黑帮邪教的作用。因为人们对党文化语言系统的使用，就是对中共因素的接纳，就是在加强中共生存所依赖的场。

讲党八股话的思维也使得中国人与国际社会难以沟通。党八股话反映的是一种虚伪的帮派文化，它使人难以在言语上跟他人沟通。其他国家的人在和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听着后者说出来的一套一套党八股话，常常愕然莫之能解、茫然不知所对，不知道这个偌大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从十几亿人里面找出一个半个会说正常人的话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

同时，人们习惯于说党八股话的时候，也许不会意识到，党文化因素已经开始了对人们独立话语的扼杀，对独立思维的绞杀，对独立人格的虐杀，对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的闷杀。不管中共如何坏事做绝，中共的党文化话语系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人们的思维，扭曲人们的判断标准，同时隐瞒自己的罪责，结果造成很多人习惯性地为中共辩护。因此，不管中共如何一次次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苦难，如何犯下一桩桩无法饶恕的罪恶，中共对中华民族的附体和对中国人的控制通过言语象梦魇一样长期挥之不去。

4) 冲破语言牢笼，恢复自由心智

一个人的语言是其精神世界的反映。语言反过来又能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党八股语言反映的是一种虚伪、丑陋、僵化的病态心灵。逐渐习惯于说党八股话的过程，就是逐渐放弃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过程，就是逐渐成为党文化僵尸的过程。而诚恳的、和善的、宽仁的、自由的、灵动的、优雅的语言，则反映了美好的内心世界，同时有助于培养自由的思维习惯和丰富多彩的个性。

告别党八股，告别束缚我们语言和心智的牢笼。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智慧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中国社会才能重新恢复活力。

5. 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党与民族的概念

共产党夺权之后，把改朝换代称为“建国”，继而以“救世主”和“缔造者”的姿态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数十年的宣传灌输，仿佛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并没有在地球上存在过。于是，政府成了由党创建、永不变更的政府，国家成了由党缔造、终生领导的国家，民族成了由党来救世、无条件代表的民族。没有了共产党，政府要成无政府，国家要成一锅粥，民族要成亡国奴。党给自己规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在“政府”、“国家”和“民族”之上。

党肯定的思想行为	艰苦朴素，爱憎分明，无私奉献，克己奉公，政治觉悟高，靠拢党组织，积极要求进步，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忠于革命忠于党，立场坚定斗志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甘当革命老黄牛，甘当革命机器的螺丝钉，对敌人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政治帽子	右派，黑帮，恶攻，×教，搞政治，三反分子，破坏合作化，不法资本家，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阶级的孝子贤孙
常见名词	路线，方针，政策，方向，任务，制度，核心，领导，干部，队伍，人民，群众，敌人，势力，保证，丰碑，凯歌，觉悟，武器，战线，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先锋队，战斗力
常见动词	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动员，斗争，奋斗，战斗，批判，总结，前进，推进，坚持，改善，发展，重视，加强，巩固，高举，丧失，危害，动摇，建立健全，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加大……力度
常见形容词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长期、艰巨、复杂（的斗争），光辉（的历程），大无畏（的精神），光荣（入党、牺牲），坚决（拥护），深刻（领会、认识），牢固（树立），自觉（维护、抵制），严格（执行），高度（重视），重大（意义），亲切（关怀、会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坚定不移，迅速果断，轰轰烈烈，旗帜鲜明

表中收集的语词，从人际称谓上的“同志、领导、上级”，到历史分期“解放前、解放后”；从家庭出身的“贫农、富农、地主”，到工作中的论资排辈“老红军、老革命”；从常用名词“路线、方针、政策”，到常用动词“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动员”等等，都是中共党文化的产物。即使粗略看完上面随手收集的党话，都让人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压抑感和窒息感。

2) 党话强制建构的政治体制

(1) “党”是党话的核心

“党”是党话的核心，党话系统的其他部分都是围绕“党”这个核心建立的。党话语词中不管是否出现“党”这个语素，我们都可以通过有限步骤的推导，发现隐藏在后面的“党”的黑手。比如，“同志”这个词里没有出现“党”这个字，可是我们只需问一句，“同的是谁的志？”就会发现背后的中共阴影。

从“党”顶端，派生出“党的教条”和“党的运作”范畴。“党的教条”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骗人的表象，我们将在下一节具体讨论。“党的运作”是党保证其政治统治地位永远不变的运作结构，包括组织、方针、政策、运动、人员、纪律和奖惩制度等等，规定社会的行动方向，全面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造成强大的党文化土壤，浸泡并塑造国人的思想意识。

(2) 党话建构的中共政治体制

下表通过列举常见语词，勾勒了党话建构的中共政治体制（表二）。

党的领袖	马恩列斯毛；四个伟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继往开来的领导人；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绝对权威来自人民群众
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党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统帅地位和向导作用，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和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根本保证，是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
党的路线	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文艺路线，干部路线，群众路线，阶级路线，农村路线，统一战线；工运路线
党的政策	打土豪分田地；合作化，人民公社；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韬光养晦；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摸着石头过河；对外开放；经济特区
党的建设	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革命圣地；长征路线；历史回顾；学习党史；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整党；整风；保先运动；组织整顿；内部清查；重新登记；发展组织；组织生活；把支部建在连上；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革命事业后继无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党的作风	艰苦朴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疾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干部下放劳动；带头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党的作风
党的纪律	绝对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怕流血牺牲；永不背叛；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党指挥枪；由党委领导一切；集体领导；保密制度
党的组织结构	地下工作；地下党机关；少先队；共青团中央；妇联；工会；人事科；干部科；中联部；组织部；中宣部；中央军委；政委；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教导员；指导员；省委；省委书记；市委；市委书记；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党组；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党委成员；支部；支书；总支书记；支部委员；政治工作干部
党的组织生活	传达报告；交党费，交团费；过组织生活；队日；政治学习；政治生活；检查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了解大家思想；争取入党入团；候补党员；候补期；组织发展；发展对象；候补党员转正；组织上谈过话；党的活动经费；党组织；积极分子，预备党员；组织考验；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发展资本家入党，三自爱国教会中的党组织
党内派别斗争	改革派与保守派；两个司令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个凡是；党的历史上N次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
党的文献	马列主义原著；毛泽东思想；单行本的《毛著》；毛选；雄文四卷；小红书；邓小平理论；红头文件；办公厅批发；党史；国际

有人总结过“套话大全”，比如：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都是典型的八股话。

写文章结尾难免要出现：“我们相信，在××××的努力下，××××一定会……”。

在文艺娱乐、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充斥着党八股话。

《四郎探母》是著名的京剧，在庆祝中国京剧院建院五十周年的经典剧目展演的《四郎探母》光盘上，赫然写着这么一段话：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京剧院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排并上演了一系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京剧剧目，造就了一批艺术人才。作为国家级艺术表演团体，中国京剧院为传承民族艺术，弘扬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郎探母》的创作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在京剧舞台上唱了近二百年经久不衰。成功的原因是剧本好，演得好，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京剧遭到了中共惨烈的破坏。京剧界四大须生中的马连良、奚啸伯、周信芳、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尚小云、著名武生盖叫天等均遭迫害。因此，那段话实际上是对京剧传统经典的亵渎，背后反映的是一种讨好当局的讲党八股话的思维。

潮菜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在《中国正宗潮菜》菜谱的前言里，有一段话：“新中国建立后，潮菜烹调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潮汕地区经济的腾飞……当今潮菜已经进入了一个鼎盛发展的时期。”既然是正宗烹调，当然是口味牌子越老越好，越传统越好，不知道为什么改革春风能吹到锅里，让潮菜进入“鼎盛发展时期”。这反映的同样是一种习惯性讲党八股话的思维。

可以说，谁都知道党八股话不好，谁都觉得党八股话让人恶心。但为什么人们却又如此高频率地讲党八股话呢？甚至很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时髦？其背后反映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态呢？

2) 讲党八股话背后的心态

党八股话背后隐藏着一种恐惧心理。人们形成讲党八股话的思维，时时处处随口讲党八股，在某种意义上无非是向当局告白：他服从独裁秩序，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在中共专制之下，人们不知道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言论什么时候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甚至于杀身之祸。所以重复党说过的话，就成了一种最好的防护办法，除了党用过的词，人们轻易不敢用。而党说过什么话，则必须“紧跟形势”，这样才有安全感。自己说了党八股，起码政治上是正确的，不但别人挑不出毛病，还可以站在制高点上去攻击别人。这种恐惧心理是人们养成讲党八股话的习惯思维的直接原因。

讲党八股话也是中共强行灌输的结果。报纸、电视、电台、领导讲话，到处充斥着那些党八股词，还有各级官僚部门发行的名目繁杂的“简报”、“内参”、“通讯”、“信息”，更是党八股话连篇。长期的灌输，使得这些词占据了人们的思维，当人们用语言来陈述事实或自己的想法时，会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这些语句。而很多不知道党八股话危害的人，则习惯于鹦鹉学舌，共产党说什么自己就说什么。

“要深刻认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工作作为×××的重大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一刻都不能放松。”

“全党同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为全面建设×××，不断开创×××而继续奋斗！”

这是在中共某次大会报告中的段落。这样空洞无物、套话连篇的党八股话在中共的大会小会、广播电视、报章杂志中比比皆是。党八股话是中共官员的典型话语系统，但党八股话不仅仅限于官员，同时也在民间广为普及。从官方到民间，讲党八股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反对党八股》，可是他的真实用意并不是反对党八股，而是以此为借口，用“言必称希腊”之类玄玄乎乎的话影射和打击党内有留俄背景的共产国际派，主要是被其视为夺取党内最高领导权最大障碍的王明。换句话说，毛不是要反党八股，而是要用自己的毛式党八股替代别种样式的党八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狂读“老三篇”、狂背“毛语录”、狂挥“小红书”的时候，毛却再也不提“反对党八股”了。

1) 时时流露的习惯性党八股话

每逢什么大会，必定得来个政治表态，说什么离不开党的坚强核心，离不开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什么观；或者历史证明什么什么是正确这类大话空话。还有要坚持某某某的领导，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以什么来武装群众，沿着什么特色道路前进，或者是紧密团结在某某人周围，高举什么旗帜，为什么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豪言壮语。

每逢领导讲话，就要拍马说什么“重要讲话”，以突出讲话人的地位，拔高讲话的内容，说出一堆好话，如深刻说明了什么，引起什么重大反响，具有什么重大意义，等等。

代表上级讲话，就一定要说到党中央十分关心，高度重视。官员去世，典型悼词就是纵观某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什么什么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官员出现了什么问题，一定是因为偏离了什么什么理论，没有领会党的什么什么精神，表决心一定要干得更好。

受到表彰，一定要表示感激党的培养，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和爱护，最后要为什么什么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社会上或党内出现什么状况，一定会加上“极少数”、“极个别”、“一小撮什么分子”。

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总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西方××势力……”。还有千篇一律的套话，要以某某为指导，某某为基础，某某为动力，某某为保证，某某为目标，某某为中心……领导讲话几乎篇篇如此，以套话成堆来显示深刻和全面。

还有紧跟政治宣传口号的，什么张口就是“三讲”、“三个代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稳定压倒一切”、“三步走发展战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时俱进”、“和谐社会”等等。

	共运史；中国共产党×届×中全会公报；党的××大决议；××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
党和各政党的关系	统战；统一战线；民主人士；志同道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衷心拥护共产党；橡皮图章；花瓶；政治民主协商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
中央与地方关系	全党服从中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步调；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和以×××为首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上级与下级关系	下级服从上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党军关系	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党群关系	人民；国家的主人；由工农兵当家做主人；创造历史的动力；保护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工农兵学商；关心人民疾苦；患难与共；群众路线
反党组织	反革命集团；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定时炸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集团；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叛徒集团
宣传口径	内参；新华社通稿；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宣传纪律；党的精神；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思想统一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每个中国人可以说都对上面表格的内容相当熟悉。中共从对最高权力者的称呼，到其独裁地位、运作机制、统治手法等等，都用党话进行了界定。而中国人在工作中、课堂上、政治学习中，无时无刻不在重复中共那一套党话，包括对中共党魁的恭维吹捧，对中共独裁地位的认可，对党的纪律、组织生活的遵守，对党的路线、政策的追随。中共的政治话语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有些词从表面上看，不太容易看出其中的党文化色彩，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中国古代和其他国家，或对那些话背后的因素进行剖析，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语词完全是在中共的运作过程中形成的，被中共赋予了明确的意图，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语言都截然不同。

3) 党话强制建构的精神生活

共产党把其指导思想伪装成世界和人生的唯一“真理”，因此必然要编造一个涵盖社会一切方面的话语体系。传统社会中由宗教、哲学、科学、历史、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都能在党话系统中找到一套替代性的说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共的“信仰”。正统宗教让人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道德水准），直到达到天国世界的标准，从而“涅槃”、“圆满”、获得永生。而中共首先宣称天国地狱都是不存在的虚构，神是人创造出来的；进而把所谓“历史必然性”象神一样膜拜，并宣称自己代表了“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规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于是共产党公然鼓吹暴力和杀戮，

一切罪恶的形式至此变得“合法”了。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中共的道德。传统道德的内涵是“道、德”、“仁、义、礼、智、信”。党定义的“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的和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其约束作用。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最高的道德”（《现代汉语词典》，1981，商务印书馆）。

显而易见，在党话系统内，一切真理、历史、道德、艺术性等等全都是为中共的统治服务的。

下表简单列举了党文化在系统替代传统文化、系统对中国人进行思想改造过程中常用的词汇（表三）。

对正信的否定	宗教是精神鸦片，封建迷信；对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共产主义是天堂；历史必然性；“三自爱国”教会
人从哪里来	进化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人到哪里去	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消灭阶级；建立人间天堂；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所有人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
人生意义何在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神，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讲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指路明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斗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党的“历史观”	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道德观”	党性；驯服工具；无限忠于；誓死捍卫；无限忠于党；三忠于四无限；朴素的阶级感情；共产党员的修养；把一切献给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切都听党组织安排；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怀着打算牺牲的决心到前方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把党的指示化做我们一切行动的灵魂；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科学人生观教育；八荣八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党的“文艺观”	匕首；投枪；香花；毒草；思想性；三突出；样板戏；主旋律；红色经典；革命历史题材；革命现实题材；革命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艺术为工农兵服务；艺术为无产阶级服务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史官精神，春秋时代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国君，被史官以弑君记录入史。崔杼杀了这个史官，但第二个史官还是这样记录。第二个、第三个史官被杀了，其他史官还这样坚持。这就是一种气节，一种民族能够长久生存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和迫害手段却无情地摧毁了这种精神，知识分子或遭胁迫，或被收买，助纣为虐，帮助中共编造更多谎言欺骗民众，以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

中国古人也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不少无畏强权、蔑视权贵、为了尊严与价值可以不惜牺牲生命的人。西方社会里，也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但在今天的中国，在中共的暴政与党文化灌输下，中国人的勇气却空前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无端的怕心与恐惧。

于是，中国自古的民族尊严消亡了，一个民族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被扼杀了。有人说，中国早已是亡国奴，是殖民地。不错，自1949年之后，中国其实就在精神上亡国了。共产党扼杀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所建立的不是“新中国”，而是从精神到肉体的残暴专制帝国。

一位著名的盲人作家曾经说过：“我的身体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正常社会里正常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充分选择的权利，生活丰富多彩，人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有了吃喝嫖赌的自由，但是却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危险意识”使得中国人把自己关在思想监狱内，不符合“党”观念的一概不接受，甚至害怕，躲避。在这样的一个严密体系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非常难以在党给的思维体系外思考。在自己的心牢里只能拥有符合党文化和中共观念的东西，其看世界的方式也只有自己的框框里的那一点。思维立足于党文化之中，受其精神奴役，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乐趣，人生变成了为中共而活。

4) 摆脱无形的恐惧 主宰自己的头脑

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常识：“危险意识”的想法直接违背了现代的法治精神。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所惩罚的都是人们的犯罪行为，而绝不能是人们的思想。也就是法律只能根据一个人做什么去惩罚他，而绝不能根据这个人在想什么去惩罚他。当我们觉得某些想法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中共以思想入罪的野蛮做法的后遗症。

“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这种习惯性党文化思维、这种危险意识是非理性、无根据的。人的大脑由自己支配，想什么由自己来决定；一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共产党也并不能把他怎么样。就其主观意图而言，共产党的确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可是，即使在共产邪灵最猖獗的时期，这一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过。今天，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意愿空前强烈，但其控制能力却空前虚弱。中国人需要从中共制造的那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也一定能够从这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摆脱对共产党的非理性恐惧心理，此其时也。

摆脱恐惧，我们才能恢复做人的尊严，才会拥有一个自由的社会。

4. 党文化使人习惯性的讲八股话

“要认真学习×××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不断保持和发展×××，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的伟大道路上奋勇前进。”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牛因为没见过老虎，自然不会认为老虎危险。而很多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受到中共迫害，但是这种思维却几乎人人都有。原因何在？是因为党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给中国人造就了心牢。

从心理上讲，“危险意识”来源于“怕”。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人的言论和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控制的。如果思想中有了不符合党的观念，保不准什么时候就露出端倪或者说漏了嘴，不就会遭到中共的整肃吗？历史上吃了这种亏的人大有人在。于是，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就连跟党不一致的想法都不敢有，要自我约束。不但自己不能有，还要让家人都不能有。整个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危险意识”。

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与中共长期的思想灌输和高压统治是分不开的。

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周期性的杀人、镇压、搞运动，目的就是强化民间的恐怖记忆，巩固中共的政权。中共历史上的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恐惧心理。中共控制一切资源，掌握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其迫害手段没有底线，也没有预知范围。持有与“党”不同意见的人，遭到的是从小到大，从经济、名誉、心灵、肉体、生命等各层面的压制和迫害。不信和质疑共产主义邪说，不满并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存有不同意见，也会遭到严厉的清洗。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仍然实行着高压统治、特务统治和黑社会统治。其手段包括：封锁自由资讯，监听人们的言论，实行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追求自由信仰、自由言论以及合法抗争的民众；监控海外归国人士；挟持国家资源进行海外渗透，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戒心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人们不知道谁最后会捅自己一刀，会告自己的密，党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有时是自己的敌人，有时却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是自己舍命相救的人。告密成为了中共统治下独特的一道龌龊的文化景观。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采取了与党一致的做法，在稍微“敏感”一点儿的话题上，就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于是，接受了党文化的人们主动地用中共的思想考虑问题，揣摩中共的心思，体会中共的观念。表现形式有：先假定自己是中共，跟中共保持一致，然后判定什么是符合目前党观念的，接着拿这个规矩去衡量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对自己是画地为牢，努力排除自己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连想都不愿想；对别人谈论“敏感”话题进行阻止和劝说，更有甚者直接就去举报或者打小报告，直接让党来迫害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便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在没有党控制的环境里，仍然“本能”地害怕，人们象机器人一样服从党的命令。

3) “危险意识”危害民族

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自动与党保持一致的思维形成之后，人们变得处处小心翼翼，怯懦求全，习惯于通过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来得到极权者和上司的恩宠，象奴隶般过日子，人的尊严彻底丧失了。六四时，有位参加游行的教授打出的横幅是，“跪久了，站起来遥遥”。可见，中国人被奴役久了，连抗争都有气无力——遛完了，再回去跪着。可悲的是，有很多人真的又重新跪下去了。

思想改造	脱裤子，割尾巴；洗澡；写检查；思想汇报；臭老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中国知识分子长期采用的基本政策；对知识分子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教育他们克服其地主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
------	---

对中国人而言，也许什么“宗教是精神鸦片”、“封建迷信”等等都是可以随口而出的词汇，用来指称传统信仰。但很少人会仔细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他们的话语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在中国过去的几千年里都有各种信仰，对传统正信以“封建迷信”一言而蔽之，完全是中共党文化的产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盲信盲从共产主义、完全接受中共的思想控制，由此而给中国社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劫难的时候，却很少人会想到“共产主义是精神鸦片”，“共产党是邪教”，因为中共通过长期反复灌输，在“精神鸦片”、“邪教”这些词和某些中共打击的团体或思想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固的联系，人们很难突破思维定势，用这些词去反思中共。

4) 党话大举侵入私人空间

中共对社会控制极端严密，在正常社会里由伦理道德、社会习俗等规范制约的领域，也一样伸进了中共的黑手。因此，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的私人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党话。正常人的话一旦被“党”看中使用，就被污染成党话；而党话肆无忌惮地渗透、挤压、改变和侵吞正常人的话语体系。

传统社会对有婚姻关系的人的称呼是“夫妻”、“夫妇”，“相公”、“内人”，近代以来称为“先生”、“太太”，文气一点的称“外子”、“内子”，通俗一点的称“老公”、“老婆”。不管怎么称呼，这些词都能反映出男女的差别，其中暗含着尊重不同性别的特点、进而做到两性和谐共处的意思。

中共统治下，人们称自己的配偶为“爱人”。“爱人”原来是相互爱慕的人之间的称呼，意思和“恋人”差不多，还有很多国家是指情人，特别是非婚姻关系、不伦关系。在中共“根据地”，这个词被广泛用来指“配偶”，把妻子和丈夫都统称为“爱人”，据说“反映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变革”。历史学家吴晗初到“解放区”，听人介绍吴玉章的太太时说：“这是吴老的爱人。”吴晗吓了一跳，心想，吴玉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在谈恋爱？

“爱人”这个词虽然没有“同志”那么重的肃杀气息，可是任何一个词的背后总是含有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中共宣扬所谓的“平等主义”，试图抹平人与人之间在道德品质、文化教养、社会地位、财富和性别等方面的一切差别。“爱人”这个词的使用反映了中共鼓吹的“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等观念（于下章深入剖析），变异了男女两性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最终造成了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人本来有男有女，男人跟女人有各自角色和义务，阴阳调谐才有和谐的家庭。中共却要人们不分男女，要女人干男人的事情，甚至要女人也参与暴力、“革命”行动，这样的女人不但不温柔，而且和男人一样阳刚，家庭中也出现了斗争和“革命激情”的碰撞，这样怎么会有和谐生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的今天，“同志”一词越来越受到冷落，不知从何时起，很多人将同性恋者称作了“同志”。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爱人”这个词的党文化含义，“爱人”仍然是中国人称呼配偶的常用方式之一。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大量的党话。比如，形容一个人心绪烦躁，人们会说他“满脑门子阶级斗争”；说一个人德才兼备，人们会说他“又红又专”；形容一个人勤俭持家，人们会说“艰苦奋斗”或者“艰苦朴素”。有人伤心欲绝，别人会安慰他，要“化悲痛为力量”；有人做出成绩，别人会告诫他，要“戒骄戒躁”，“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一个人从一出生，就被党话包围了。哪家生了小孩，同事会说：“你们家有革命接班人了。”起名字叫“向东”、“卫东”、“建军”。上学以后很快戴上“红领巾”（中共血旗的一角），小学时学习好要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中学时学习好要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高中分文理科，一定有人告诉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在中共统治下，文科因为跟意识形态离得太近，被人视为畏途。每学期末的操行评语第一句必然是“该生政治上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团）组织”。填履历表，必填“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上大学以后免不了和“党总支”、“团总支”、“政治辅导员”打交道。交朋友时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要说自己“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的意思是：只有一种工作，那就是中共的“革命工作”，现在我被接纳为其中一员了。“参加工作”意味着这个人有了“单位”、找到了“组织”，每周必须参加半天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结婚要“单位”开“介绍信”，生孩子要有“指标”。这样干了几十年，到了退休年龄，要按照中共官僚体系规则论功行赏，某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叫“离休干部”，某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叫“退休干部”，再年轻一点，就没有“离退休”的份了，只好“下岗”、“内退”，被“组织”一脚踢开，去“自谋生路”。有些人不愿意受这份窝囊气，就主动“下海”、“停薪留职”、“买断工龄”。如果不幸去世，讣告中的最高评价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追悼会上少不了要列举哪些党政干部在此人病危期间看望了他。

党话大举入侵私人空间的结果是：正常的社会结构、家庭生活、思想感情全部被党文化污染，人们失去了据以评判中共政权的重要参照体系。

4. 党话的建立经过了大规模整肃的过程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汉语书写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对于保持华夏文明的稳定与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长、传统深厚的国家，语言规范行为的谨慎与适度，就显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却不是保持正统文化的完整与纯正。恰恰相反，为了铲除一切妨碍中共建立独裁统治的障碍，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并且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等邪说。于是，中共动用国家政权，进行超大规模的语言整肃。以国家机器用一切手段把党话推行到全国，是党话系统建立的根本特点。

1) 党话的来源

概括起来，党话主要有六个主要来源：成批翻译、党魁制造、组织伴生、系统编纂、文人帮闲、大众合作。

马列主义是一种外来学说，最初的党话必然以翻译著作为载体。1897 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第一次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铺垫。1919 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出现在《新青年》杂

学家的面，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

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2004 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在电话里，老人想了一想说，我还是不来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来十七八年了，没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评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这些‘反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本能”地躲避。

人们知道高压电、过马路闯红灯、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东西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一念。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

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象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向来都是一个褒义词。

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或者一谈到共产党，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学、就业、参军，都离不开政治审查。对重要社会事件，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四十年前，在家里种几根青菜，养几只鸡都是政治问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历次运动中，不跟上形势，“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与党一致的时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确的，与党不一致的时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2) 党文化造就的心牢

众欢迎，典型的如《生死抉择》、《新中国第一大案》等。其实这些作品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伤痕文学及相应的电影，如《天云山传奇》、《戴手铐的旅客》、《海外赤子》等等一样，不管它们怎样挖掘主题，怎样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思考，怎样试图冲破一些思想禁区，怎样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拓宽艺术的表现形式，都脱不开党文化的思维影响，作品最终又归结到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党有决心改正错误；而中共造成的社会弊病、民众苦难则笼统归结为“时代的悲剧”，淡化中共的罪责。

在中国民间，创作“恶搞”颇为流行。比如某厂商把雷锋像和毛语录印在避孕套包装盒上。看起来这是对多年来中共党文化灌输的一种反叛，实际上还是对于中共树立偶像的权威的认同，依旧没有脱离党的影响。党文化无处不在，当今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党”所占领，这就导致人们的思维无法摆脱党文化的语言要素，不得不用这些要素思考和表达。一些所谓特别有创意的广告语“将……进行到底”、“……就一定要实现”也是创作思维过程中离不开党文化的语言要素的例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很多中国人着迷于所谓“老歌新唱”，即把赤裸裸歌颂中共的所谓“红色经典”或以现代乐器重新配器，或以现代唱法演唱。很多人声称，这样做纯粹出于怀旧，并非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有学者指出，很难想象，1945年之后的德国民众会采用歌唱希特勒的形式来怀旧，或者苏共二十大之后前苏联民众会通过颂扬屠杀两千万前苏联人的斯大林的歌曲来怀旧。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老歌，实在是因为党的基因早已渗透了人们的文化细胞，人们觉得这是自己的一部分了。

这些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表现，既有因为在党文化弥漫的社会大环境中长期熏染自觉形成的习惯性，也有长期高压下被迫如此的情况，有为了捞取个人利益、政治资本而有意如此，还有想跳出党文化却跳不出，从而创作思维习惯不自觉地依旧离不开党的情况（如“恶搞”的作品仍然是在党文化中打转）。总体上讲，党通过强制手段为保障，以党文化作为民众唯一可能得到的“精神食粮”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大众和他们自己，最终使得党文化成为人们创作思维习惯的定势，使人们的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只是创作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方面，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方式渗透各行各业。具体创作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但是人们受党文化的影响，从选材到思考到具体创作，每一步都跳不出党文化的框框。要想真正地自由地创作，发挥自己的才华，就要首先从党文化思维中跳出来。

3. 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 “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
- “这些想法反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
- “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
-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

1) “危险意识”无处不在

在开放初期，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

志上，党话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后，把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和苏共文件当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专门设立“编译室”、“编译局”等部门。在延安被杀的王实味就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词汇就是从这些翻译著作中来的。

中共党魁是党话的另一个主要制造者。毛泽东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制造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党话。和毛同时或后来的中共党魁如法炮制，试图通过制造“新话”奠定自己理论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资派”、“四个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就是这些党魁制造的新话。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中共领导人个体同样需要给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由于几乎每一任中共领导人都留下了血债，因此他们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又不能突破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预先设定的底线。华国锋就是没有摆正两者的关系，没有撇清和毛的关系，提出“两个凡是”以后不久就被迫下台。

中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伴生”的党话是指伴随着中共的组织形式和常规活动而孳生的大量词汇。这些词汇有些是中共生造出来的；有些是汉语词汇或是来自德文、俄文、日文的借词，但经过中共的长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强烈的党文化气息。因为这些词和中共的组织运作相伴而行，构成了中共组织内部上传下达的文件的坚硬内核，因此可以说是最隐蔽、但却最强有力的党话。本文上半部分重点剖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就属于这一类党话。

系统编纂。中共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文教部门、科研机构，只要中共党魁或者“党中央”定下所谓“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机构就开足马力发挥论证，直到把它们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马克思主义××学》、《毛泽东的××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类的书，就是把“革命导师”关于某一问题的片言只语收集起来，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御用文人铺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制造出大量党话。

文人帮闲和大众合作也是党话的来源。邪党的文人为了媚上邀宠、升官发财，主动配合中共制造党文化垃圾。大众生活在一党专制之下，或顺从或无奈，也参与了制造党话的过程。比如，中共文人制造的“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论调就是“文人帮闲”的一个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说出“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样的话，就属于“大众合作”的范畴。

2) 党话的形成和演变

透视党文化，要注意其中的变和不变。共产党的理想大旗在变，方针政策在变，打击对象在变；但其专制独裁永远不会变、邪教属性永远不会变，流氓手段永远不会变。因此，虽然不同阶段的党话与中共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呈现不同的特点，但其间存在着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坚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质

特性。

中共党话的发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几个时期：

（1）1919—1937，党话草创阶段

1919年《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个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从理论基础到组织形式，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除翻译词汇以外，基本没有形成有特色的党话。这时的中共，武装称“红军”、根据地称“苏区”、割据政权称“苏维埃”，十足的苏共应声虫。

（2）1938—1949，披上中国化外衣

毛泽东因为党内斗争的需要，窜逃延安以后，急于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1938年的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后通过延安整风，毛一方面用自己新发明的党话打击政敌，一方面给党员干部洗脑；一边反对“党八股”，一边把自己的私货当作标准文风固定下来。党员干部被迫熟读背诵中共领导的话语，中共集团语言雏形初成。

（3）1949—1966，攫取话语霸权

中共攫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同时攫取了这块土地上的话语霸权。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出版、新闻、学术、教育，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党话被强制推广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各个年龄。党话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语言。中共开始用党话全面扫荡传统文化。

（4）1966—1976，党话大爆发

文革十年是党话的大爆发、大检阅、大示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唇枪舌剑的大辩论、檄文、诏书（最高指示）……语言暴力被发挥到极致，国人在心惊胆战中目睹了语言的摧毁性力量。党话全面替代了人话，中国人至此不会说正常人的话了。

（5）1976—1989，党话混合变异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对人民做了有限度的松绑，少量正常人的话被重新允许使用，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曾有过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但是，由于中共在建政以后三十年的强力灌输，也由于中共在政治领域绝不放松，党话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里仍然具有支配地位，人们已经丧失了对党话的辨别能力和免疫能力。

（6）1989至今，衰败腐朽时期

江泽民时期，中国社会的表面浮华下面蕴藏着各种矛盾，生活无聊，道德低下，思想枯竭，改革倒退，社会千疮百孔，党话愈加空洞无物（“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贵州铜仁某屠宰厂标语），展示末代红朝的衰败没落。末代党话企图借助西方术语、科技术语（××工程）、和一些传统文化用语（德治）挽回自己败亡的命运。党话和大量民谣、政治笑话构成了奇特的共生现象，表征着社会的全面腐朽和民众在绝望中自嘲的心态。

3）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

根据某个语词的使用是否贯穿中共发展的各个阶段，可以把党话分成“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两类。阶段性党话是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创造并使用的党话，具有暂时性和易逝性。制度性党话则贯穿了中共建立以后的各个时期，是最核心、最重要、最能体现中共的本质属性的党话。阶段性党话表

基调不得不认同的无奈。

创作内容上离不开党的思维习惯，还体现在党否定的就得跟着否定。对神佛的信仰被当作封建迷信加以否定；传统文化成了独裁专制的同义词；中共之前的历史人物，必定存在“历史局限”，一句“封建”就足以把中国千百年来忠孝仁义等传统美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圣贤忠良等人物打入另册；十年文革的破坏，成了“四人帮”的过错；饿死几千万人的人为饥荒，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屠杀，政府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学生反而负有很大的责任；对法轮功的诽谤之词，更是铺天盖地；与中共不一致的政党团体，很少可以不带贬义色彩；听从中共的，便是爱国；批评中共的，便是反华。这些中共否定的对象，在艺术创作中多数成为被批判、被丑化、被有意歪曲的反面形象。

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中共的黑暗面和中共的打击对象被视为创作的禁区，人们避而远之。随着偶尔触及中共禁区（如民主、宪政、人权等等话题）的记者、作家纷纷被捕，许多人便自我约束。敏感话题偶有提及，也是离真实相差甚远，不足以影响中共的“光辉形象”，不触及中共的核心原则。很多人认为现在创作范围很广，作品很丰富了。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参与文艺创作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创作题材越来越广，甚至许多人们过去不敢想象的创作主题也开始流行，如所谓“下半身写作”的性文学大行其道。这并不是因为民众创作可以完全自由、离开党了，而恰恰是人们知道这些主题不威胁中共的意识形态，才可以没有顾忌的。中共允许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党的禁区牢牢进入人们的记忆，绕开禁区、打擦边球成为创作习惯性思维的一部分，这其实代表了对中共制定的创作规则的服从。

3）创作思维过程离不开“党”

党文化对文艺创作最大的影响，莫过于钳制人们的思维了。

在流行的许多古装电视剧中，古代宫廷戏全是勾心斗角，官场的腐败自古都如此，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创作思维是党文化历史观直接影响的结果，抹杀传统观念，用现代人的观念去表现古人。把几千年来传统中国社会描绘成一片黑暗，是一个人人相互斗争，“人吃人”的社会，以突出中共的“光明”。把腐败表现为古今中外官场的通病以淡化中共的腐败，欺骗中国人把中共恶政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上去。

纪实文学作品创作往往是这样一种定式：如果是发生天灾人祸，就如本小节开始的例子，要讲党如何关心人民；如果是官员，就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如《孔繁森》之类的；如果是官员胡作非为，最后就是党最终维持正义；如果是政策错误，最后就是党如何如何纠正错误；如果是一个阴暗面，会归到官员个人的无奈，最后仍然要衬托党的“伟光正”。任何经济方面的成果，必定离不开党的“英明政策”的指引；任何企业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任何教育、科技上的成果，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亲切关怀”。出来什么人才，个人有什么成绩，必定离不开党的“培养”；军队更是“胜利离不开党的领导”。连一个下岗（实际上是失业）工人稍微状况改善，也是离不开党的“关心和支持”；连宗教界也是“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和支持，只有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景”等等。

因为中共腐败愈演愈烈，民众怨气无处发泄，近年来“反腐电影”很受民

中共伟大，掩盖历史罪责的手段。

还有一种创作动机是为了宣传党文化思想而服务的。如“文革”年代，到处是“革命样板戏”，为的是配合文革形势，鼓励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一些充满政治宣传的台词成为民间流行语，“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争做时代的新闻将”、“手捧宝书满胸暖”、“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血债要用血来偿”、“甘洒热血写春秋”、“仇恨入心要发芽”等等。

与此类似，出动大批军人参与拍摄，耗资三千万美元的《英雄》则借历史主题歌颂秦始皇，鼓吹蔑视生命、独裁专制的党文化，间接成为中共主旋律的得力吹鼓手。电影把共产党的江山同天下人的利益混淆等同了起来，从而把恋权位不退，杀人维持暴政的统治者拔高到代表天下人利益的正义位置，潜移默化地灌输观众应该牺牲个体生命以成全暴君统治。

2) 创作内容离不开“党”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为文艺创作定下了基调——文艺要服务于政治。中共建政以后，仍然奉行这一“文艺的指导方针”。中共还有中宣部保证其“文艺方针”的强制执行，这就使得文艺创作在内容上不可能脱离党的要求。

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晚会集中了全国顶级的演员和艺术家和创作班子，全国几百家电视台转播并直接延伸到海外。每年的春节晚会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社会和艺术创作的缩影，可称为党文化的集中突出表现。到二十一世纪的“春晚”，干脆不许讽刺一丝一毫中共统治的黑暗，预定主题，专门为“春晚”写专用歌词，“好日子”，“越来越好”，“五福临门”，“万家欢乐”，“盛世大联欢”，以党国庆典取代民族欢乐，以党文化取缔传统文化。百姓的痛苦、民族的危机在处处弥漫的浓厚政治气氛中蒸发掉了。

因为“党”严格规定了文艺作品的基调，所以人们不得不遵循这些要求、规定，否则作品会遭到封杀。

中国各地有许多曲调优美的民歌，一直在民间传唱。但是民歌的内容一般以情歌为主，虽也有些是歌颂家乡山水的，但总体来讲与中共文艺要服务于政治的基调相差甚远，因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这些歌曲本来大多不在中共允许的范围之列。但这些优美的民歌被受到党文化毒害的艺术界人士或直接窃取附上为党歌功之词，或按党文化要求改写、“再创作”而赋予政治内容，就成为谎言蒙蔽下的民众乐于传唱、中共也乐见其成的新“民歌”，如脱胎于陕北民歌的“东方红”、“翻身道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脱胎于蒙古民歌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脱胎于藏族民歌的“北京的金山上”、“哈达献给毛主席”，源自于赫哲民歌的“乌苏里江船歌”，源自于哈尼族民歌的“阿波毛主席”等等。这些歌曲一经“再创作”，传回民间之后，便给人以一种假相，好象各族民众都狂热地拥戴中共及其党魁，而中共又无耻地把这些附体于民族音乐上的作品吹嘘成为其“发展民族音乐”的所谓“贡献”。

2005 年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声”节目风靡全国，广受年轻人的欢迎，节目人气直接威胁到中共的龙头媒体中央电视台。于是很快这一纯娱乐性的节目开始遭到媒体的抨击，处处都是封杀的喊声。在今年的超女大赛节目中，主办方特地邀请了以唱党的赞歌而走红的所谓“老艺术家”与大赛冠军共唱“红色经典”歌曲“马儿，你慢些走”、“只有山歌敬亲人”等，并请“老艺术家”指点年轻人。这种离不开党的“创意”很大程度出于对中共把持的文艺

现了中共的“变”，制度性党话表现了中共的不变。如果说阶段性党话是流动的泥沙，那么制度性党话就是坚硬的河床。中共的欺骗性体现在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阶段性党话上，每次政治运动一过，就通过迅速淘汰阶段性党话，做出改头换面的假相。那些认为“中共变了”、“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共了”的人，都是没有认清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的关系。

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带入大量的生造词语，举例如下（表四）：

年 代	政治运动	党 话
1942	整风运动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审干、锄奸、抢救失足者、小广播、逼供信、脱裤子、割尾巴
1947 - 1950	土改	三查、三整、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翻身、打土豪、分田地
1951 - 1952	三反五反	不法资本家、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跳伞、跳冰棍（跳楼自杀）
1957	反右	百花齐放、引蛇出洞、阴谋阳谋、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扩大打击面
1958 - 1960	大跃进	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面红旗、亩产万斤、三年自然灾害
1963 - 1966	四清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四不清干部
1966 - 1976	文化大革命	派性、现反、支左、横扫、文斗、武斗、揪斗、牛棚、斗批改、顶峰论、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红海洋、红宝书、红卫兵、造反派、走资派、臭老九、狗崽子、翻案风、站错队、大串联、样板戏、红代会、黑后台、工宣队、斗私批修、文攻武卫、兴无灭资、革命小将、黑线人物、二月逆流、上山下乡、大树特树、批林批孔、资产阶级法权、反动学术权威、清理阶级队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77 - 1989	“改革开放”时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四项基本原则、四个现代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有新人、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9 - 2002	江时期	三讲、三个代表、江八点、与时俱进、先进文化、稳定压倒一切
2002 至今	胡时期	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保先、八荣八耻、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

制度性党话是围绕着党的运作而产生（组织伴生）的一些语词，如“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些词直接规定着“党”的强权地位、组织结构、思想控制、统治手段、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是最能体现中共的邪教属性的党话。

4) 党话和正常人的话的关系

（1）党话附着在民族语言上

中共并没有创造一种语言，而是采取了继承民族语言的基本形式、塞进党文化内涵的方式，从内部变异中国的民族语言。因此，被党话附体的现代汉语，语音变化不大，基本词汇还在使用，句法的变化主要是白话文运动以后汉语欧化的结果。中共操控下的对汉语的整肃和变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创生大量新词

如：苏区、边区、红军、斗争、长征、统一战线、整风、土改、互助组、合作化、公私合营、肃反、下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大庆、铁人、大寨田、龙江风格、红卫兵、样板戏、走资派、造反派、大联合、工宣队、支左、大批判、大鸣大放、清队、革委会、红色娘子军、粮票、布票、油票、阶级烙印、政治挂帅、东风压倒西风、两手抓等等。这些词是共产党在日常运作和政治运动中生造出来的，虽然使用的是汉语语素，但本质上和民族文化格格不入，具有十足的党文化色彩。

（3）扭曲汉语语意

一些本来就存在的汉语词汇，经过中共的长期扭曲使用，词义被歪曲，被歪曲了的词义再被中共的词典固定下来，当作该词语的基本义或基本义之一，如是积非成是、陈陈相因，人们还以为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对其中的党文化因素冥然不觉。

如：书记（原意是书记员，一种跟秘书差不多的职务。中共标榜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把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中共邪教教主称为“书记”，给人一种“亲民”、“为人民服务”的错觉）、检讨（原意是检查研讨，这个意义在台湾还在使用。逼人“检讨”是中共对党员群众进行思想强奸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共统治下，从基层党员到中央领导、从小学生到老教授，几乎都有被逼写“检讨”的经历。在“检讨书”中，人们被迫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深入挖掘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向“党”表决心，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迷信（人只要入迷地相信了什么，就是迷信了，这个词本身没有反义。人就在迷中，区别只是“信”和“不信”而已。如果迷中的人能够信神佛，信天理，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训，那整个社会就会处在比较高的道德水准，对其中的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中共强行把“愚昧”、“落后”、“反科学”等内涵灌进“迷信”这个词，不光变异了汉语，也败坏了社会道德）、觉悟（原本是一个具有修炼文化色彩的词，指人们通过修炼而具有大智慧和大能力，“佛”在梵语里的本意就是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共产党把这个词和党员被洗脑的程度联系起来，党性压倒人性就是“觉悟高”，否则就是“觉悟低”）等等。

中共把某一类词的比喻义变成常见义，使这些词也染上党文化色彩。比如：包袱（原意是包裹，现在经常指思想负担。被中共洗脑的人常常面临“党性”和“人性”的激烈冲突，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通常会劝告此人“放下思想包袱”，意思是只要放弃人性，就不会有良心的煎熬了）、辫子、帽子、棍

金总队为老年公寓送水”、“停水日，没有一家医院的食堂减少粥和汤类供给”、“哈尔滨道里开通专线保证残疾人生活用水”……总而言之，“形势一片大好”，甚至比没有受灾更好，目的是反映出“省委省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

在哈尔滨市停水四天后、供水恢复的第一天，黑龙江省长当众作秀喝了第一口水，新华网的记者颇有“创意”，特别描绘了普通民众创作的诗歌称颂党，以表白赞美是百姓自发的。在报导《黑龙江省长喝第一口水，百姓作诗赞》中黑龙江省长喝水前称“不是我说话算数，是共产党说话算数，人民政府说话算数”，一句话就点出了省长喝水的用意，似乎先前那个隐瞒灾情的政府不在中共领导之下。省长喝水后马上有普通市民作诗一首点题：“斟上一杯放心水，心中感到格外美；党送温暖家家乐，百姓心里放光辉”。报导结尾说“挤满人的小屋里立即响起了一片欢笑声，四天来松花江水污染的阴霾在阵阵欢笑声中一散而尽。”一场关系上千万民众生命的特大污染灾难就这样“一散而尽”了。结论是民众受灾，多亏“党”的拯救帮助。

这种党文化中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种种复杂形成原因和形形色色的表现特点。但是就创作思维过程而言，没有无处不在的党的影响，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

中共公开宣称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并利用层层宣传机构和组织来保证这种服务，所以，创作的出发点就决定了文艺是党文化的宣传品；同时，文艺创作要求体验生活和表现生活，而生活中早已充满了党文化，体验和要表达的内容就是在党文化中打转转；而对于创作者而言，他们本身也深受党文化思维和理论的影响，就会按照党的要求和思想去寻找灵感；更重要的是，党控制了创作者和其一家人的饭碗、住房、看病和前途，就会强制作者在违背意愿和良心的情况下，麻木自己，迎合中共，长期下来便成习惯。于是，从动机到内容到作者的思维，都严严实实地罩在党文化的帷幔之下，创作便离不开党了。

1) 创作动机离不开“党”

就作品创作动机而言，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出于为党歌功颂德的目的。受中共扭曲的历史和党文化“社会发展史”的影响，很多人是自己受了蒙蔽而把中共当作民族的“大救星”，为中共唱赞歌，反过来又影响更多的人，在整个社会形成对中共及其魁首狂热的崇拜思想。典型的作品有《红旗谱》、《青春之歌》、《苦菜花》、《三家巷》、《红岩》、《洪湖赤卫队》、《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烈火中永生》、《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等等，文艺形式包括从小说、诗歌到歌剧、电影，无一例外地反映中共领导的所谓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和中共的“光辉形象”、对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很多歌曲，如“党啊，亲爱的妈妈”，“毛主席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更是赤裸裸肉麻至极。

回顾近二十年来的文艺作品，虽然手法更精致，取材范围更宽，更加注重作品人物的人性化，但是许多作品的创作动机，仍然离不开为中共抹粉的基调，如电影《开国大典》、《周恩来》、《大决战》、《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改革文学”，“市场经济文学”，创作动机是通过描绘改革后的社会变化，间接为中共歌功颂德。改革本身是一种历史潮流，是中共闭关锁国几十年后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在艺术创作里它却成了证明

“他们活该”。

被称为“红卫兵外长”的李肇星回答记者提问时态度蛮横无礼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问起邓小平的身体状况，李答：“他身体很好。”记者又问：“邓小平是在家还是在医院拥有这样良好的健康状况？”李回答：“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是会知道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的。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里。”记者的提问并不刁钻，完全可以不失外交风度地正面回答，可是李外长斗的意识根深蒂固，随时都要表现出来。再如，邓小平说，“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说，“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斗争、暴力、镇压的习惯性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

争斗性的话语习惯使人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信息、理性公允地探讨问题，讨论时使人一味追求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没有从善如流的听德，更没有知错就改的雅量。

争斗性的说话方式一旦开始，必然不断恶化，就象人常吃味道重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会越来越重。强烈的语言用久了，人们会觉得不够劲儿，必然去寻找、制造更富刺激性的语言。在这种环境中日复一日，人们必然变得更为麻木。

（4）清除斗的意识，纯净我们的语言

一个真诚、善良、宽容、自信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更不会非要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放狠话、讲歪理，千方百计在语言上挤兑别人，让对方尴尬难堪，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争斗语言的背后，是中共斗争哲学造成的一种混合着自大和自卑的扭曲心态和畸形人格。

在正常的人类社会里，人们对待同等地位的人彬彬有礼；对待比自己弱小或不幸的人，讲话尽量和气温婉，好言安慰；夫妻相处时相敬如宾，教育儿童时循循善诱；讲道理时就事论事、冷静理智，错了也会坦率承认。君子风度的后面，是平和自信、与人为善的健康心态。

清除语言中斗的意识，仅靠语言上的努力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党文化的斗争思维。

2. 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松花江被大量有毒致癌的苯化合物污染，在污染物沿松花江扩散、下游急需尽早采取防范措施的时候，中共当局却对民众连续隐瞒消息将近十天才承认发生灾情。然而就在当月底，黑龙江电视台用三天时间组织创作了一台大型特别节目《水之情》。据报导，特别节目“连夜投入制作，表演唱《清泉滚滚八方来》、相声《社区见闻》、歌曲《我想告诉你》等六个节目为专门创作……通过独唱、表演唱、舞蹈、相声、小品等多种艺术形式，反映省委省政府在处理突发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统筹全局、以人为本、情系百姓的执政能力……”

这种把灾难当作喜庆，把受灾民众作配角，中共当作主角的创作思维习惯，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人看起来都怪异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人却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这种创作习惯性思维不仅体现在文艺作品创作上，也体现在报刊、广播的新闻“创意”中。如上述污染灾难发生后，黑龙江省级重点新闻网站——东北网——接续的相关报导是“中小學生利用停水后的假期充实知识”、“哈尔滨市社区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停水期间见真情”、“武警黄

子（“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是中共政治运动中常用的手段。揪辫子是指抓住政敌的把柄；扣帽子是指给政敌和打击对象安上一个吓人的罪名，如“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毛主席”、“右倾”等等，从而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然后再放手打击而没有后顾之忧；打棍子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中共是一个控制极其严密的邪教组织，它把控制军队的方式推广到控制全社会。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很多杀气腾腾的军事用语成为日常通用语，这也是海外华人和港台人士觉得大陆人说话杀气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见的有“队伍”（指集体、团队）、战线（指某一领域，大陆有一种学术期刊，就叫《社会科学战线》）、“兵”、“战士”（指成员、工作人员，往往与“战线”搭配使用，如“党的交通战线的一名新兵”）、“消灭”（指吃完、做完等，如“你把这个菜消灭了”）、“歼灭战”（指完成任务，如“咱们打一场歼灭战！”）、“战斗力”（“我没有战斗力了”的意思是“我吃不下了”）、“打扫战场”（指善后工作）、“精兵简政”（指裁撤冗员）等等。

（4）改变词汇的感情色彩

党文化和正统文化的价值观截然相反，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中共把一些词的褒贬含义完全颠倒过来。“斗争”、“战斗性”一类词从来没有被正常人类文化歌颂推崇过，可是中共把它们当作正面的思想行为肯定推广。同时把一些本来具有美好意义的词或者中性词注入反面的内涵。如“善人”（中共在“土改运动”常用来指“地主”，如“王大善人”、“李大善人”。中共对“地主”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因此“善人”变得几乎和“恶人”同意）、“忠恕”、“仁爱”、“礼义”、“孝悌”、“清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共把这些说成是“封建主义”的）、“人性”、“民主”（中共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锦标”（“锦标主义”是指只注意提高工作技能但缺乏所谓“革命性”）等等。

（5）改变词汇的联想含义

词汇的意义包括理性意义、情感意义、搭配意义、联想意义等。联想意义是指某一个词经过反复大量使用，和某些意义产生了近乎必然的联系，一提起这个词，人们就会联想起一句话、一个社会场景、甚至一种文化氛围。

比如，红色本来是一种普通的颜色，可是因为中共用红色指代“革命”、“革命性”，因此一提起红色，人们就可以联想起跟共产革命相关的大量信息，如“红色江山”、“红色接班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红色旅游”、“红色记忆”、“闪闪的红星”等等。

由于中共对社会控制全面而严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规模巨大而持久，这一类词的数量很大，只不过程度有区别。例如，“风雨”（指斗争，如“经风雨，见世面”）、“货色”（指东西，如“资产阶级的陈旧货色”）、“算盘”（指计划、想法，如“敌人打错了算盘”）、“外衣”（指外表、伪装的东西，如中共说林彪“披着马列的外衣，大行孔孟之道”）、“阳光雨露”（中共美化自己时用来比喻“党的关怀”）、“问寒问暖”（经过中共长期宣传，这个词常常使人想起中共干部“关怀人民群众”）等等。

（6）人为淘汰、边缘化语汇

在建立党文化过程中，中共一方面捏造新词或者扭曲、滥用汉语词汇，一方面人为淘汰或者边缘化传统文化中的词汇，比如修炼用语（太极八卦、河图

洛书、阴阳五行、丹经道藏等）、传统道德语汇（因果报应、仁义礼智信）等等。“因果报应”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对民众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发挥了极大作用。在党文化中，这个词没有被彻底废弃不用，而是被蒙上了反面的内涵，成为被贬低、轻蔑、嘲笑的对象。

（7）句式、篇章和修辞

党话还表现在一些特殊的句式、行文方式和修辞手法上。中共的斗争性渗透在语言方式里，就表现为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有话不好好说，正话反说，多用反诘句和反讽句，使谈话对方陷入被动而尴尬的境地。

在论证一个道理的时候，受党文化影响的人不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地讲道理，而是诡辩，强词夺理，得理不饶人，没理狡三分，盛气凌人、态度嚣张。有人曾指出所谓“毛语体”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或多或少渗透进普通中国人的话语方式中。这些特点包括：

第一，定性。如：“×××是什么人呢？是西方反华势力的走狗。”第二，群体称谓。其好处是无法证明他在捏造，而且不用负任何语言责任。如“众所周知，广大中国人民都早已识破了他的真面目”。第三，举证倒置。就是把举证的责任推给对方，事实上自己无法证明却弄得好象别人无法证明，最常用的词是“不可告人”或“别有用心”。如“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第四，一律证伪。对实在无法反驳的就冠以“虚伪”、“恶意”、“假新闻”等。比如“他口口声声说×××，实际上都是虚伪的，只有我们党才真正维护×××”。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曝光后，中共“新闻发言人”狡辩说，“最近境外一些媒体报导我国器官移植医疗活动时编造虚假新闻，恶意攻击我国的司法制度。”第五，总结，不给对方留下任何后路。如“不论他如何狡辩，也否定不了他×××的本来面目”。第六，自我贬低，做“我是流氓我怕谁”状。如“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无情地打击他这样的反动派，不讲任何温情”。

渗透着中共变异、邪恶思维方式的语句和篇章，可以是由中共的独特语词组成的，也可以是普通的语词组成的。不管怎样，这些语句和篇章是党文化的思维方式组织起来的，全都带有鲜明的党文化烙印。

（8）党话是一个系统

语言是作为系统存在的。一个词的表意方式和使用方式受着整个系统的制约。党话也是作为系统被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共创造了大量的语词（以及语词指称的制度等），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语词、传统文化的语词、外国文化的语词被重新组织在党话系统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因此，在中国人目前使用的语言中，汉语原有的词汇在数量上固然仍不少，但由于中共强烈地改变了汉语语义场和语用空间，这些普通的语词也大都具有了党文化的色彩。

“党”象一个强引力场。就象黑洞闯入太阳系会瞬间改变太阳系内的星体排列方式一样，“党”闯入中国的话语空间，也改变了汉语语义场和汉语词汇的表意方式。“党”又象一个强污染源。党文化所到之处，正常人的话也难免被沾染上毒素。

5）党话的实质是中共把帮派黑话强制推广给全体社会成员

中共从起家开始就是一个流氓帮派，只不过后来夺取了政权，“窃国者为诸侯”，帮派政权化了，邪教国教化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此即使放大想象力，人们也一般想不到这儿，或者根本不敢往这儿想。《九

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不是有什么‘核捆绑’理论吗？就是说核武器把整个世界的安全捆绑在一起，要死大家一块死。”（迟浩田《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

又如“我不好过也让你好过不了”，“我死也不让你活着”等。

破罐子破摔型：

这种争斗性语言体现了一种极不理性的、跟自己过不去的心态。说这种话的人被一种“盲目地斗”的意识支配，不管坚持的是什么，也不管坚持的东西多么荒谬、错误、没有意义，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表现出一种极不理性、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

例一：“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泽东）

更多例子：“我就这样了”，“你能把我怎么样？”，等等。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随着共产党统治策略的变化，人们的言谈话语方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其中“斗的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强调的是，坦白直率的语言中不一定含有斗的意识，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意的语言乍一听也可能是不入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说话时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还是存心找茬、拆台、挑衅、有意无意打击别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3）争斗语言的恶果

争斗语言伤人心。中国谚语说“话能开心锁”，可是充满了斗的意识的语言可以给人的心灵造成严重伤害，开启了人际争端，这种语言不但不能打开心锁，反而结下不少难解的心结。2006年北京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教师使用语言暴力是一个普遍现象。72%的被调查初中生表示，老师使用的不文明语言对其造成了心理伤害。在另一项报告里，81.45%的被访小学生认为校园“语言伤害”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语言暴力在一定时候，很容易转化为行动暴力。因为语言的争斗，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会产生矛盾，小小问题可以闹出人命来。2005年，一个北京的警察到山西太原，在红绿灯前和一个太原的警察拌了几句嘴，这个太原的警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竟然找了一些人，将这个北京的警察活活打死。山东济宁市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仅仅因为一个网民的网名不合己意就与对方在网上展开恶骂，后来对方换了一个女孩子的网名与其交谈，套出其正在上网的网吧地址，然后赶到将其一刀砍死。

争斗语言诱导人们用斗争哲学的眼光看待问题。语言是人思维的工具，习惯性的带有斗的意识的语言诱导人们用“斗”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这就好象一个人本来想找刨子做木匠活，可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把斧子，于是只好改劈柴了。现在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跟语言中斗的意识关系很大。比如，领导对下属颐指气使，动不动就是“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下属不服管，心里想的是“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随之而来的，就是彼此间的争来斗去。

在政治和外交场合，这种斗的意识反映更为明显，后果也更加恶劣。2003年5月19日世界卫生大会的会场外，台湾媒体问：“你听到台湾二千万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需要吗？”中共驻联合国代表沙祖康用不屑的口气说：“早就给拒绝了！”并以傲慢的口气说：“谁理你们！”也是这个沙祖康，在被问及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注射伤害神经药物时，毫不掩饰地回答，

治的几十年历史中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可以把争斗语言大致分成如下几类：

恃强凌弱型：

例一：“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1966年）

例二：“我是公务员，打他又怎样，打伤了给他十万，打死了给他二十万。”（2004年重庆万州发生数万人的大规模冲突事件，起因是一个自称“公务员”的人殴打一个不小心用扁担碰到他妻子的民工。这句话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导火索。）

例三：“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2005年底何祚庥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中国矿难频发的问题时说的话。）

其他例子包括“把台湾炸为焦土”等等。这类话反映了典型的恃强凌弱心态。

妒火中烧型：

例如：“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这句话反映了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心态：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无产者”才能浑水摸鱼，一夜暴富。）

更多例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多新鲜哪？！”（毫不新鲜）“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别人遇到好事或者取得成绩，只相当于过年改善生活，稀松平常，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就你行！”（意思是“没什么好显摆的”，“其实我比你更行”。）

针锋相对型：

例如：“你不打他就不倒”；“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跟丫死磕！”“跟我斗？没你好果子吃！”等等。

自贬贬人型（恶者反守为攻）：

使用这种话语策略的人，先把自己（或者所有人）说得一钱不值，然而开始放手打击对方，而不担心对方反击。这种策略的微妙之处在于，说话者占据了道德至低点，反而相当于占据了话语权的制高点。

例如，有人用普世的道德准则来批评中共时，中共往往辩解说，“在阶级社会中，道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潜台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人权、宗教信仰、新闻自由都是‘虚伪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然都是虚伪的，那就别怪中共所谓‘社会主义道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为共产党统治服务了。”

又如“我是流氓我怕谁？”等。

损人不利己型：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之后，产生了一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病态心理。

例一：“原子弹（战争）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毛泽东）

例二：“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宁肯要

评共产党》第一次揭示出中共是反宇宙的邪灵、邪教和流氓，在一定意义上是开始了一个“正名”过程，让人们能够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中共。

因此，党话实质上是一种黑话，或曰“集团方言”、“政治方言”。中共推行党话的实质，就是把帮派黑话强制推广给全体社会成员。

黑话又称秘密语，是在某些黑社会、帮派内部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一般没有独立的语音和语法系统，是依附在正常社会语言之上的一种语言变异现象。党话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黑话具有交际功能、保密功能和识别功能。交际功能是指在帮派内部，黑话能起到达意和交流的作用；保密功能是指帮派外面的人不懂得黑话的含义；识别功能是指帮派成员根据某人是否使用、懂得该帮派的黑话判断他是否是“自己人”。值得注意的是，黑话的交际功能和保密功能是同时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交际行为的话，就没有秘密可保；使用黑话能够对于帮派内部成员起达意的作用、而对于圈子外面的人则能起到保密的作用。

党话同样具有这三个功能，不过党话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复杂。人们熟知的文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黑话台词，“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从字面上完全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必须知道黑话解码规则的人才能听懂。可是后面的“脸怎么红了”和“怎么又黄了”，既象正常人的话，又象黑话，可以做两个层面的解读。中共的党话这两类都有。前一类包括“三反分子”、“三名三高”、“三搞一篡”、“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三讲”、“三个代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个转变，牢牢把握三个原则”等等，如果不是经过解释，正常社会的人看到或听到这些词完全不知所云（即使经过解释，理解起来也十分吃力）。另外一些词，看起来也象正常的语词，可是中共赋予这些词独特的含义，对这些词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中共党话的复杂之处在于，同一套党话，用不同层次的解码方式，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思。越是处于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掌握的解码方式层次越高，就越能看出中共党话的真实含义。比如，最近中共高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没有掌握黑话解读方式的基层党员和普通百姓可能觉得共产党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了，可是中共的中层干部掌握了一定的解码手段，就会比较准确地把它理解成“现在进入了‘和谐压倒一切’的时期，要是谁胆敢上访上告、鸣冤叫屈，发出‘不和谐音’，党的专政机器可不是吃素的！”中共的权力核心掌握了最高级的解码工具，他们知道“和谐”、“人本”的最深层含义：退党大潮使中共的亡党恐惧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两个口号也许能充当救命稻草，挽救中共土崩瓦解的命运。

由于中共党话这种复杂的保密机制，很多外国人，包括很多专家、学者、政客都被中共蒙骗而不自知。一位国外学者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和中共党代会报告用词特点并统计词频的方法来分析中共的政治走向。可是中共“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这位学者的研究方法无法看出中共的政治走向，最多只能看出中共撒谎的走向。

党话的识别功能表现在，通过一个人的话语方式，中共党徒可以辨认出此人是否属于党的圈子和他对党文化的认同程度。2000年发生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怒斥香港女记者的事件，使举世哗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就会发现香港记者的问话非常简短，可是就在这么简短的问话中，江就明确判定：该记者不认同中共的香港政策，于是破口大骂。[记者：江主席，你觉得董先生

连任，好不好呀？ / 江：好呀！ / 记者：中央也支持他吗？ / 江：当然啦！ / 记者：不担心这会影响到香港自治吗？ / 江：（破口大骂）]

2005年7月，“保先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向媒体介绍中共“保鲜”情况。有记者问到：“最近几个月，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骚乱的情况，您是否能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骚乱事件的？”李景田答道：“很感谢这位女士对中国农村情况的关心。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李景田也是一下子就辨认出这位记者不是中共帮派的成员。

长期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为了了解政局的真实情况，发展出阅读中共文件和报纸的超常本领。他们善于从字里行间、从领导人的排序、或者从某一个“提法”的变化来辨认中共的政治风向。中共垄断了人们的一切信息来源，人们出于不得已而这么做。他们也许可以发现政治变化的蛛丝马迹，但因为中共党话的解码方式也是不断变化的，这种“自发的解码”必然是片面的、有偏差的、甚至是差之千里的。更重要的是，中共这种肮脏的“搞政治”方式，连有点品味的黑社会都不如，我们怎么能允许它继续祸国殃民下去呢？

由于中共集团窃据国家统治地位，党话这种“集团方言”、“黑话”，被扩大成一种“政治方言”。“政治方言”是人类语言学史上的一个罕见现象，在其他形态的社会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它以集团的私利为核心，为政治目的控制言语交际的方式，传播着狭隘的甚至是邪恶的纲领、意识形态，用帮派操作的方式取代国家和社会运转的正常方式，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吞噬受控民族的精神和灵智。

5. 党话的特征

党话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特点。比如，党话“假、大、空”，粗鄙野蛮，血腥气重（据1986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在包括实词和虚词的所有现代汉语词汇中，动词“死”的使用频率排第237位，“杀”排第940位）。此外，由于共产党造反起家，对中国人民进行准军事化管理，所以在党话中有军事色彩的语词非常多。这里我们重点分析党话的四个特征。

1) 中共垄断了话语的定义权

西谚有云：“恺撒的事归恺撒，上帝的事归上帝。”政治只是全部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在一般情况下与信仰、道德、习俗等共同发挥作用。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权，不会试图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更不会试图解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何在？”这类人生终极关怀问题。可是，中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邪教政权，它必然要提出一整套对天、地、人、人的行为、生活和思想的解释来代替正教信仰、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对社会的约束和调节功能。中共系统制造的党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虚幻世界，严丝合缝地覆盖在真实世界之上，规定着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

从表面上看来，党话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可是，党话系统的根本规则是绝对不变的，变就意味着党话的自我解体。这个根本规则就是：党话系统是为了维护中共的邪教独裁统治服务的，党话的“变”也以不危害“党”的根本利益为度。为此，“党”必然垄断党话系统的解释权。这一点决定了党话归根结底是一个封闭系统。

中共官方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中大量词条的解释都

中共党文化的独特产物。

（1）语言中争斗意识的成因

与“人人见面有戒心”一样，“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也是中共的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的产物。在中共眼里，暴力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品格。中共的斗争哲学，通过教科书、影视作品、文艺节目、歌曲、小人书等等，潜移默化地进入一代代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人的行为是由思想决定的，如果思想中被灌输的都是暴力、仇恨的东西，人的语言和行动所反映出来的也必然是暴力和仇恨。所以，中国人语言中的争斗意识，是中共的暴力哲学、暴力文化和暴力实践在中国人内心形成的本能反应。在近几十年的生活和教育中，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中，人们受到了太多斗争的熏陶，其后遗症是不言而喻的。

在那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处处充斥着暴力语言。在中共的媒体上，人们最常看到是“批判”、“斗争”、“打倒”、“砸烂”、“横扫”、“牛鬼蛇神”等等攻击性极强的语言。这种暴力语言在报纸的社论、评论、批判文章中尤为多见。譬如什么“斩断×××的魔爪”，“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砸烂他的脊骨”，“××决没有好下场”，“油炸、火烧、剥皮抽筋”，“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都是那种充满暴力、威胁、恫吓、火药味的词汇。这种暴力语言充分适应了专权者恫吓大众、制造恐惧、培养顺民的需要，充斥媒体、文件、教科书、文艺作品，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方式。

在中共发动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人们争斗的恶习被充分调动起来。那些最恶毒、最不择手段攻击别人、诬蔑陷害别人的人，最善于给他人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在背后泼脏水的人，经常得到领导和“组织”的重用，飞黄腾达；而那些被诬蔑、被攻击而却无法辩解的人则往往结局悲惨。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挨整的境地，人们努力打造自己的语言本领，让自己变得伶牙俐齿，随时可以迅速反击别人。到了今天，无理争三分，谁嗓门大就是本事，已经成了人们潜意识的本能反应。

语言中的争斗意识反映了党文化中的深刻不安全感。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人们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对别人不使坏心，也不用时刻提防别人，心里笃定踏实，更不用在语言上跟别人争斗。而党文化造成了人时时刻刻担心自己挨欺负、吃亏，因此要通过在实际上或者言语上胜过别人来给自己赢得安全感。中共宣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势者只能处在食物链的低端被别的动物捕食，而处于食物链高端的强者才最有安全感。这种思想将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变成斗争关系，在斗争中是否获胜成为人自我评估安全感的重要指标。于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人们把说得过别人当作自己反应敏捷，聪明才智胜过对方的表现，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别人强，过后心里沾沾自喜。

（2）斗的意识一脉相承

或许很多人以为斗争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人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系统有稳定性的特点。形成了的话语系统会通过年轻一代的语言习得而成为他们的话语习惯。换句话说，小孩学说话的过程，就是学习一种话语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过程。家长、老师和全社会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斗争心态，会以另外一种变体在年轻一代身上呈现出来。现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斗富比阔、瞧不起穷人、嫉妒心强，都是一种争斗心的表现。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在中共统

得过瘾。这种在语言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斗的意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在公共场所购票，在那排着队，可能不知哪个时候突然上来一些插队的人。如果说，“请你排一下队”。很可能别人会狠狠瞪你一眼，冷不丁来一句：“关你屁事！神经病！”在大街上走路，不小心碰到别人，刚想要道歉，一句高分贝的话已经过来了：“没长眼睛啊？”看两人闹矛盾的时候，旁边的人有时不但不解劝，反倒火上浇油：“跟他干！”朋友之间开玩笑都会说：“待会搞死你！”

家长教育孩子，语言更是生冷不忌，夹枪带棒。“早就告诉你，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现在好了吧，作业写不完，看老师明天不收拾你！”“你看人家×××，每次都比你强。”“哭！就知道哭！哭也没人帮你！”“让你不听，等你考完试咱们算总帐！”“你等着，看我不揍你！”“小兔崽子，治不了别人我还治不了你！”

台湾朋友发现，中国大陆人说话，往往习惯于用反问句，而且语气很冲。“怎么连这都不知道？”“你自己不会看哪？！”“没看我正忙着吗？！”“谁说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早干什么去了？！”“哪有你这样的？！”这种说话方式带有强烈的火药味和责备别人的意味，暗示对方“笨”、“不正常”，并且因为使用了反诘句而语气更强。

争斗性的语言普及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一些大众文艺形式都以语言攻讦为重要内容。近年来流行的很多小品的主要内容就是男女演员的互相攻击、挤兑，侃爷、贫嘴成为小说、电影、电视剧里受青睐的角色，很多作家把尖刻当成深刻，网络论坛更是刻毒语言的天下。农民、穷人、残疾人、相貌丑的人、文化程度低的人，等等，都成为人们攻击挖苦的对象。

在这种比赛刻薄的社会气氛下，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超级女声”评委对年轻的女选手说出这样的话：“跑调了！你真不知道你跑调了吗？”“你连基本的音乐素质都不具备！”“把民歌都给糟蹋了。”“你唱歌和你说话一样做作。”“好好学习，前途无量；要想唱歌，死路一条。”“别吓着后面的选手了。”“别人唱歌是偶尔跑调，你唱歌是偶尔不跑调！”“花钱学声乐在你有些浪费。”“你年纪不大，却好象怨妇一样！”这种话直接打击人的自尊心，对人没有起码的尊重，却堂而皇之地在电视上对几亿观众播出，而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对此津津乐道。

中国人的这种争斗意识不光表现在争斗性的语言上。在一般的语言里，也充斥着斗的意识。人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以建设性的态度、从共同把事情做好的基点出发正面立论，而是反面立论，这不对、那不行，反正别人没有自己聪明，就算本人对该怎么做一样没谱儿，也要表现自己的“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显得比别人强。

老一辈中国人受到党文化的长期浸泡，年轻人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大家都以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话的，并不觉得这么说话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其实，中国古人讲究温文尔雅的礼教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信奉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讲究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处事态度，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与今天的人大相径庭。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语言和行为受宗教、道德、法律和职业伦理的强有力的约束，争斗性的语言被限制在法庭、候选人辩论等有限的场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话谦恭礼让，整个社会处在很和顺的状态。全民人人语言中都带有斗的意识，而且是强烈的斗的意识，这种现象是

充斥着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洗脑宣传，共产党把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书变成“现代党文化政治词典”。下面这些词正常社会也在使用，可是中共对它们的解释截然不同。

“党——政党，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党。”“党”在正体字里即“尚黑”，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结党”必然“营私”，“党同”就要“伐异”，是一个传统上的贬义词。所谓“立党为公”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在西方修辞学中被称为“矛盾修饰语”（oxymoron）。中共把“党”用作自身的专有名词，党无所不在，统治一切，被中共强行赋予褒义、正面意义。

“解放——解除束缚，得到自由和发展，特指推翻反动统治。”

“革命——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推翻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民主——指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的自由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权利。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在我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和真正的民主。”

中共垄断的不仅仅是对话语的解释权，而且是对法律的解释权，对真理的解释权，也即对真理的控制权。有了话语霸权，中共就可以时刻把自己伪装成真理的化身了。

2) 党话的多层次性和欺骗性

党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可以粗略分成表层党文化、中层党文化和深层党文化。表层党文化唱高调，用来欺骗和控制大众；中层党文化用以维持党的基本运作；深层党文化以维护党的生存为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是党赖以延续的根本保证。党和党的领导并不受表层党文化制约，只是把表层党文化当成一个工具。党文化的这种多层次性，是人们认识党文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与此相对应，党话也可以分成表层党话、中层党话和深层党话。表层党话包括那些最冠冕堂皇的中共意识形态语言，“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等等。中层党话与中共政权的日常运作相辅而行，一般人容易把它和正常社会政府行使管理职能时的行政用语混淆起来。中层党话包括上文着重分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八股话。深层党话不具有形态上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大白话，但是因为赤裸裸地体现了中共极端残暴无耻的邪教、流氓特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在中共核心集团内部流传。这类党话包括刘少奇说的“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邓小平的“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的“法轮功讲真善忍，可以放手打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有时候让深层党话进入表层，来达到某些特殊的目的。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些“我是流氓我怕谁”一类的表白，就激起了很多人对强权的崇拜。中共将军朱成虎“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也要和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论调，前国防部长迟浩田“清场美国”的言论，就是中共假装“不经意”地透露给外界，既试探他国的反应，又明确告诉对方它是一个亡命之徒，给对方造成心理震慑。

普通人被党文化控制的过程是一个从浅入深的过程。起初被表层党话欺骗（革命年代的冲动，少年儿童的天真无知，年轻人的热血沸腾），进一步到对表面党话的反感（但是又不敢说），再到习惯成自然的轻车熟路，机械重复中层

党话，成了中共邪教组织的一分子。更进一步的人，尝到了依附党文化的“好处”，对深层党话的实质含义（极端自私地维护党的利益和生存）心领神会，从而把自己与党彻底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现在人们大多对表层党话十分反感，对中层党话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的实质认识不清，对深层党话或者不知情，或者不敢相信这些极端自私残暴无耻的话才真正体现了中共的本质。相对而言，表层党话欺骗性较弱，中层党话的欺骗性较强。深层党话对党的邪恶不加掩饰，但无法出现在正规的文件和媒体上，不能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中共的邪恶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读懂深层党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也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表层党话，但中共在宣传上却离不开表层党话，因为中共需要用它们欺骗外国人，在中共内部释放烟幕弹互相欺骗，同时蒙骗党员的良心。

3) 党话的抽象性和诡辩性

正常人的话往往是具体可感、易于理解和把握的。中国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抱负，都要从最基本的洒扫进退、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做起。正统的信仰和道德体系，往往都用明白浅易的语言表达，比如“摩西十诫”里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等标准，非常具体，并不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人人都可以理解并实践。

可是，中共党话却异常抽象含混。党话的高度抽象性使中共很容易地偷天换日，翻云覆雨，玩弄诡辩蒙骗国人和世界。中共把这套党话强制性地灌输给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往往能够达到使人们宁可相信中共繁琐艰深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不相信自己的常识性判断的地步。

中国北方农村在中共的所谓“土改”前有着非常和谐的宗法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和雇农是一种合作互助的关系。可是共产党来了之后，除了煽动、支持当地的地痞流氓造反，就是灌输给农民阶级仇恨。大多数人虽然一生中也没有见过中共描述的“地主恶霸”，可是中共诡辩说，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质”，所以“个别”普通农民的亲身经历无法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结论。人们一方面出于恐惧和遗忘，另一方面无法否认中共关于“阶级本性”的抽象说辞，慢慢地就开始相信真的存在一个地主阶级，这个阶级对贫苦百姓欺凌压榨，要想过上好日子，或者把他们赶尽杀绝、或者让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这个现象非常典型。中共谎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跟党话的抽象性和诡辩性关系甚大。中共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都出现过这种现象——不相信亲情、友情这些天然的伦理感情，甚至不相信自己的亲身体验，而去相信极端有悖常情常理的共产党的理论。文革时多少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人伦惨剧就是这么造成的。

据上引《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就使用频率而言，“主义”这个词排在所有现代汉语词汇（包括实词和虚词）的第 37 位，在所有名词中排第 4 位（仅次于“人”和方位名词“上”、“里”）。“主义”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出现 253 次，十三大 250 次，十四大 216 次，十五大 253 次，十六大 155 次。在中共文件、报刊、教科书中常见的带“主义”词尾的词有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

轻轻松松的生活就变得高度戒备、提心吊胆、事事防备。人人见面有戒心造成人人互为近敌，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依靠。长此以往，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生活中难以享受信任和轻松带来的快乐，精神病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比例大大增高。据精神病学专家估算，中国目前至少有一亿人患有各类精神障碍疾病。

在战场上保持警觉是正常的，但在日常中时刻情绪紧绷，防卫别人，这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人人见面有戒心”的情况并不存在于正常社会。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鼓励言而有信的品德，人与人之间无须相互琢磨，不用费劲去打听别人的德行，人际关系非常简单，做人要轻松得多，每个人都可以从中享受很大的好处。

戒心思维也使中国人之间合作难、矛盾多。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样的戒心成本恐怕难以计算。

戒心让人们什么也不相信，当然也就不会相信中共体制外的一切，连事情本来的面目也不相信了。当中共扭曲掩盖的事实真相被揭露与还原时，人们会持怀疑、不相信的态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共的造假宣传、操控和欺骗民意得逞。

戒备心理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也构成了障碍。中共煽动的戒心和仇外心理，不仅使别国难以产生信任感，也无法使自己真正走入世界舞台。带着这样一种有色眼镜，把别人都看成“反华势力”，如何去正确解读别人的信息，如何与世界各国合作呢？

人们可能觉得，我不防备别人，不自我保护，别人不把我当傻子欺负吗？的确，谁愿意甘当第一个放弃戒心的人呢？有人用踮脚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踮着脚尖看戏，都很累，如果大家一起放下脚尖来，都会变得轻松而且能更好地看戏。可是，谁也不相信谁，我放下脚尖了，别人不放，就我看不到，这不亏大了吗？

从党文化中寻找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人见面有戒心”的状态就是党文化造成的。只有解体中共，才能清除造成戒心的大环境。人们免于来自共产党的打击和迫害之后，才能有信仰自由，才能逐渐恢复仁义礼智信等等中国传统观念。这样自然就会有人愿意选择放下脚尖，他们善待他人、诚实守信的行为又能带动整个社会道德的提升，从而回归正常社会状态。

2) 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2001 年，中国大陆一位语言学家在年轻人中做过一个流行语调查，在前十名流行语中，“恶心”、“白痴”、“变态”等具有强烈攻击性的词语赫然位列其中，高居第二位的竟是“去死吧”。

争斗性的语言不仅存在于青少年亚文化当中。如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弥漫着这种语言。比如，文化衫上写“别惹我，烦着呢”；歌词鼓动“该出手时就出手”；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几万球迷在足球场上有节奏地齐声高骂：“傻×”；“你有病啊？！”“你吃错药了？！”“你大脑进水了？！”之类的话更是到处都可以听到。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亲身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谈论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打击别人，把别人不好的地方挑出来讲，把事情搞黄。话中含刺，语言尖锐刻薄，富有攻击性，不顾及别人的感受。遇事不是心平气和讲道理，而是先争一口气，对别人的不同观点有时想都不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对一通才觉

喜爱的颜色——红色；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斗争和谎言还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党文化建立过程的深层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毁了传统信仰，否定了传统文化，灌输斗争哲学，宣传马恩列斯毛伟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运动破灭后，带给人的是什么也不相信的心理创伤。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们抹不去的重重戒心。

（2）戒心的传承

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些运动，现在也好像没有跟以前一样讲阶级斗争了。但事实上，造成人们习惯性戒心的社会机制仍然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在中共的喉舌媒体中，人们仍然可以随时看到“清醒认识”、“严密防范”、“高度戒备”、“严厉打击”、“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等等字眼，时时激发人们的斗争心态。

现在的父母也用自己经历的政治运动的教训，谆谆教导年轻一代随时警惕小心，让这种戒心思维代代“承传”着。朋友之间也往往会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人要提防一点”，让防备的记忆时时更新，戒心效应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被放大。

中共所灌输的互相检举、揭发打小报告的告密文化，到现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精致周密。孩子们从上小学幼儿园开始，就被鼓励从告密行为中获得好处。大学里为了入党和分配好工作，学生们用告密的方式向辅导员“要求进步”，搞好关系。工作单位里在私下骂领导最凶的却往往是领导安插来让手下放松警惕、敞开心扉说实话的探子。

中共的党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管。从报章杂志到互联网，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处处控制、操纵着社会。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视之下。中共对六四的镇压、对上访人士的抓捕、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信仰团体的迫害，说明中共的阶级斗争思想仍然无时不在地运作着。尤其是对法轮功镇压中采用的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全民动员、人人过关、人人表态，与文革有什么两样呢？

中共权力系统谎言和腐败的示范效应，大大加剧了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而这种全社会的道德下滑又更促使人们使用戒心思维。这种人人互相戒备的党文化深深渗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反映在思维和行为上，就是时时防范着别人，时时揣测着别人的“居心”，时时担心被别人“利用”。一位华人经理几年前到中国考察，回来后感慨地说：“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人们没有信用和道德，对于任何人而言，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相信，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政府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法律得不到执行。”这样的社会状态，对这个国家来说会是好事吗？

一个习惯形成的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被外力强加的不自愿阶段，第二是不断强化而形成条件反射的自觉阶段，第三是充分内化的本能式习惯性反应阶段。中国人的整体戒心最早是被中共强行灌输和煽动的，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强化，到今天，人们的戒心已经充分本能化、自动化，不需要监督，也不需要意志努力，而是自然而然的习惯性思维状态了。

（3）戒心生恶果

人人见面有戒心的党文化思维使中国人活得极其沉重。戒心可能会使人得到暂时的自保甚至好处，但是长远来看，本来可以坦诚相处、相互信任、过得

会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冒险主义、逃跑主义、关门主义、自由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修正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一本书主义、一杯水主义等等等等。时至今日，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弄清这些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可是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主义”的帽子曾经把千百万人置于死地。

党话的抽象性方便了中共按照其政治需要对语词随意解释。如果使用的语言太具体、直白，大家都看得懂，中共就没那么容易蒙混过关了。抽象一些，大家都含含糊糊，中共就可以随意解释。毛时代“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邓上台的时候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江时代可以让资本家入党。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说白了——凡是共产党搞的，都是“社会主义”。

“阶级”、“路线”、“认识”、“左派”、“右派”、“进步”、“反动”、“公有制”（人民抽象拥有，中共真正拥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等等晦涩抽象的党话构成了重重黑幕，中共权力集团躲在黑幕后面，为了集团的利益和生存，一边在内部进行毫无廉耻的倾轧，一边对人民大肆犯罪。

4）党话的吸纳性和能产性

党话还具有吸纳性和能产性的特点。吸纳性是指中共擅长把正常人的话整合收编，化为己用，甚至用别人的批判往自己脸上贴金。中共无耻地窃取人类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为自己辩护。“爱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德治国”等本应具有美好意义的语言，被中共长期盗用，现在我们几乎无法正常的使用这些语言而不引起反感。

能产性是指形成了的党文化思维可以创造新词，显示“中共政权与时俱进的活力”。中共有着严密的组织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一旦这个邪恶政权的主脑——领导人或党中央——决定了什么方针政策，政权的基层组织就会象这个邪恶政权的肢体一样，高效地执行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党话。

近年来中共创造新词的主要模式包括：党文化+传统文化用语，比如“德治”、“和谐社会”；党文化+科技术语，比如“××工程”（希望工程、安居工程、菜篮子工程、米袋子工程、再就业工程、211工程、五个一工程）；党文化+西方术语，比如“××意识”（政党意识、首都意识），等等。

党话的吸纳性和能产性造成的后果是：一茬党话淘汰了，新一茬党话迅速被制造出来；党话在使用过程中混杂、变形、出现了数量庞大、形形色色的变种，这些新词的党文化内涵使人们防不胜防。

6. 推行党话的后果

1）文化—语言亡国的现实

在中外历史上，外来入侵者仅依靠占领土地，往往并不能使一个民族臣服，因为只要被入侵者民族精神不亡，仍然不会轻易屈服。本章引子中谈到，语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所以入侵者除了占有土地外，往往还要摧毁原来的民族文化，以毁灭其民族精神；而毁灭承载文化的语言，就是摧毁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比如1870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占领法国后，就试图在沦陷区的学校强迫教授德语，禁止法语。中共摧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采用了多重手段，变异、替代语言是其中之一。

与传统文化“培养德性、完善品格、教化人性”的语言态度相反，中共的语言是为其集团利益服务的，虚假是中共语言的灵魂。中共的语言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扭曲错位的。它用一套似是而非的词汇，潜移默化完成了对人的思想变异。它用一套偷梁换柱的言语系统，彻底改变民族的历史延续和走向，最终掐灭了天赋神授的中华传统和精神而使国人不自知。中华正统文化荡然无存，为党文化内容全面偷换取代。中华民族由此偏离了与宇宙的和谐关系，在世界中错误定位，与人类本原精神对立，民族整体生存方式和走向背离了上天安排的轨迹。

语言和文化来源是什么，今天的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了，还以为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说话的。党话体系窒息着民族精神和活力，加强并巩固着这个人类异己体系的力量和束缚。

历史上人们都以中国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倍感骄傲自豪。中国文化除了和平时期的辉煌召来各国的朝拜，更以战败以至丧国时期对异族文化的同化表现着恢宏的气度。蒙元和满清统治者折服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心甘情愿地臣服其精气神力，承传了中华民族香火。

综合大量语言事实的分析，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现实：中华文化无可战胜的历史已经被改写了。中华文化被土著共产党用外来的马列邪恶主义取而代之，文化上、语言上我们早就亡国丧权了。

2) 党话强制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党话是当代中国人使用的语言里最活跃、最具有行动力量和支配力量的部分。党话支配力量大表现在：第一，党话使用频率高；第二，党话的权威度高。

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一些典型党话词语的使用频率在所有现代汉语词汇（包括“的”、“和”等虚词）里的排位为：“革命”71，“同志”83，“阶级”149，“敌人”153，“斗争”209，“解放”285，“领导”312，“无产阶级”372，“路线”561，“代表”570，“战斗”602，“反动”617。另外，“党”这个词在传统社会并非常用词，可是在中共建政以后，“党”的使用频率迅速窜升到119位，“共产党”331位，加在一起，差不多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中共在当今中国一党独大的独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党话权威度大是指党话以中共暴力为后盾，占据了政治、经济、司法、教育、新闻等最有影响力的语言领域。伦理纲常、衣食住行、风花雪月这类正常社会的语词并没有完全消失，可是处在边缘的、被支配的地位。人们不管愿意与否，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都被迫使用党话。党话和党话带来的后果（中共的理论被“学习”、“领会”，中共的政策被“贯彻”、“执行”，等等）强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3) 党话——当代中国人的有色眼镜

语言是思想的工具，人的思想表现为词和语句的组合。党话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党话是当代中国人的有色眼镜。

(1) 党话让人不自觉地维护中共恶党

党话或者是中共造出来的话，或者是经过中共改造的话，其存在目的就是维护中共恶党的统治。用中共提供给人们的扭曲了的语言材料，人们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的样子，而只能看到中共希望人们看到的世界的样子。

中共自己发明一套词汇，描述其起家的历史。如果一个人用这套词汇去思考中共历史的话，得出的只能是中共让他得出的结论。请看下表（表五）：

因为对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产生戒心，上来就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人人见面有戒心，时刻防备他人，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有人说中国人活得真累。确实如此。

(1) 习惯性的戒心是党文化造成的后果

人都单纯过，相信过，真心付出过。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运动中，或者自己整过人，或者被人整过，或者今天整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整，或者看到别人整别人，或者看到别人被别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斗争史。

中国民间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共的斗争哲学硬生生把这个关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社会地位来划分的阶级（群体）对立关系。人们开始用敌视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人，用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党性、兽性、阶级性代替了人性，专政代替了关爱，敌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们被随时要求防范所谓“敌人”的“渗透”、“攻击”和“反扑”，由此既担负了防范“敌人”的义务，同时也产生了必须警惕“敌人”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担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会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去提防别人，才可能换来一点安全感。长期下来，这种敌视防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的常态。群体戒心可以说是传统信仰和道德被摧毁以及中共灌输阶级斗争观念的一种必然结果。

烘托整人闹剧的是种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务、告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倒戈、两面派、墙头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邻里成仇、师生相斗、隔墙有耳等等。留心眼成为了人们求生的本能。

如果说人整人造成的戒心还有丝丝裂缝的话，中共社会从上到下的谎言则把那些裂缝都堵上了。在心理学上发现，一个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时候遭到欺骗，会造成强烈的情感伤害。越是真诚过，伤害后会反弹越激烈，越会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国人当初曾经对中共盲信盲从过，但中共的种种出尔反尔，参与者的种种丑陋，受害者的残酷磨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灵创伤。一次次的被骗被迫害，人们本能地形成了防备别人的心态。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设想别人有问题，让自己警惕起来，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让人不相信别人，怀疑一切。戒心成为习惯后，又会反过来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不相信”会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子》中讲了一个“疑邻窃斧”的故事。有一个人丢了斧子，他怀疑是被邻居的儿子偷去的。于是他仔细观察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说话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脸上的表情、动作举止，没有一样不象偷了自己的斧子。后来直到这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时再看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说话、表情等一点也不象偷了自己斧子的样子。

中共给我们培养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首先人人都不可信，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然后再为这个预设的立场搜集证据。此时我们就象那个丢了斧子的人一样，看别人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相信。党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怀疑一切”被作为人们思维和交往的指导思想，提倡鼓励人人相互戒备。马克思在接受大女儿燕妮的采访时的回答可以说是党文化的三昧：“对幸福的理解——斗争；

第八章 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

一种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共产党依靠超乎寻常的宣传灌输和触及灵魂的血腥实践把党文化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党文化的思维从被动接受最终演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党文化思维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欢思考，有的民族喜欢音乐，有的民族喜欢创新，各个民族的各种思维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们被共产党强加的“本性”却非出自人性，而是党性。党文化变异了我们的民族，造成人与人交往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充满斗的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习惯性地离不开党；在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险；习惯性地讲党八股话；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与党与民族的概念，等等。

这种党文化思维在全社会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响到思维、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的“习惯势力”。我们看到，即使共产党的组织解体，但党文化所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不能化解，那么未来的中国仍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但却带有深重共产党阴影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思维、话语以及行为中的党文化“习惯”不能得以清理，它还将影响我们的是非判断、信息分析与决策，我们仍然可能互相戒备、仍然会去掠夺自然战天斗地、仍然会觉得国际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这就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即使发动机熄火，它仍可以顺着惯性滑行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清理一下党文化中的习惯性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

1. 人人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1) 人人见面有戒心

中国人自古淳朴好客。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亲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揣摩他是不是图谋不轨；看见有人带着小孩寻求帮助，你也许会猜测那孩子是不是用来坑蒙拐骗的“托儿”；人在路边招呼你去帮个忙，你会警惕是不是附近藏着他的同伙，正等着傻瓜自投罗网。

相反，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对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车子坏了，常常有人停下来问你要不要帮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边，人们更是要踊跃伸手。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古人心中的礼仪之邦。今天为何在文明礼仪的故乡，反而不见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充满了戒心呢？这种戒心还不仅仅限于陌生人。上下级、邻里、同事、甚至于亲朋好友之间，也常常存在防范心理。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后看透世态炎凉后那颗自我保护的对他人的戒心。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严的城池。互相间的戒心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正常社会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人目前的戒心并非来自对方传递的信息，戒心不是

党 话	实 质	辨 析
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	叛乱、暴动	起义是指为了正义的目的起而抗争。中共所谓“起义”的实质是叛乱、暴动、颠覆当时的合法政权。
长征、北上抗日	逃亡、溃退	1931年后，日本侵略军大敌当前，中共在江西发动叛乱，进行“武装割据”，被围剿后向西南仓惶逃逸。后来北上原本是想逃到苏俄，勉强在延安站稳脚跟，日军全面侵华后乘机坐大，最终把赤祸推到全国。
整风	延安洗脑、延安恐怖	“整”是整顿、治理、规范的意思。“整风”这个词暗示人们：“党在管党”、中共在“加强自我建设”、在努力使“党风”变得正派。其实“整风”是中共对党员干部的强化洗脑，是中共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总演习。
解放	中共夺取政权	“解放”指解除束缚，获得自由。中共建政后把全中国变成一所大监狱，全国人民处于普遍性的奴役状态。
下放	流放	一字之差，可以看出中共掩盖恶行时的狡诈。
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大饥荒	三年饥荒是中共的朦胧政策造成的一场人祸。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破坏，全民大洗脑，政治大清洗	传统文化相信君王受命于天，“革命”指“天命变更”，如《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共扭曲了“革命”的意思，用来指“推翻统治阶级的暴烈行动”，又给这个被扭曲词义的词蒙上一层褒义色彩。“文化大革命”一词掩盖了这场运动的实质，对于年青人、外国人尤其具有欺骗性。
上山下乡	青年知识分子变相劳改	“上山下乡”这个词使人产生一种温馨浪漫的联想，这也是一些当年的知青对那段日子充满怀旧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	为了维持政权，在经济上放松控制，在政治上加强控制	闭关锁国、经济倒退是中共人为造成的。所谓“改革开放”只不过是部分地恢复了中共夺权前的经济活动方式。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任何松动。
反革命暴乱，政治风波	八九民主运动	中共开始时高调把八九民主运动称为“暴乱”，后来开始使用“政治风波”这个词，企图把水搅浑，让人误以为中共也是“风波”的受害者。

近年来，中共又创造了大量的政治隐语，为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太平。比如把失业称为“待业”、“下岗”、“内退”。“待业”暗示将来会有工作，“下岗”表示过去曾有工作，就是不提现在没有工作。又如，中共统治

下的穷苦百姓被称为“弱势群体”，暗示他们的悲惨遭遇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中共的“政治隐语”型党话有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颠倒黑白型，如“起义”、“解放”。

党国不分型，如“建国”、“爱国”、“反华势力”。

把水搅浑型，如“十年浩劫”、“荒唐岁月”、“政治风波”。其特点是用一个莫名其妙的词来指称某一历史事件，让人无法看出中共在其中扮演的罪恶角色。

反话正说型，如“长征”、“改革开放”。其特点是把坏事说成好事，把中共在危机时期捞起来的救命稻草说成是中共的“丰功伟绩”或中共领导人的“英明决策”。

声东击西型，如“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四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就是不提“政治现代化”（“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需要检讨，不过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民的福利水平是由多项条件共同决定的，中共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掩盖独裁统治带来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环境恶化事实上使中国人民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

“此地无银三百两”型，如“和平崛起”。一个人去拜访朋友，绝对不会说“我不是来你家抢劫的”。多少个国家经济崛起了，并没有听说其中哪个声称自己“和平崛起”。中共这么说，恰恰反映了它发展经济背后的军事野心。

由于中共对文化、教育、科研、新闻等领域的垄断，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谈论某一类问题，很难不使用中共造出来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又诱导着人们必然地得出维护中共恶党统治的结论。党话的一统天下给人民的正常思维和言说都造成了巨大困难。

（2）党话使人无法正常思维

党话使人无法正常思维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主要的一方面是破坏了基本的道德准则。

传统社会的人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和人之间的关爱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中共为了夺取并巩固权力，需要不断煽动人们的仇恨。可是人们对同类的仁爱之心一时无法根除，中共于是创造了“阶级敌人”、“黑五类”、“×教分子”一类的词把它要铲除的群体妖魔化，使党员在迫害这些人时不但没有罪恶感，反而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自豪感”。

在共产党统治下，“出卖”一词被“汇报思想”、“向党交心”、“大义灭亲”、“检举揭发”、“协助政府把情况搞清楚”等党文化中的褒义词语代替。“出卖”不但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谴责，而且被官方推崇为“高尚的革命情操”、“坚定的革命立场”、“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对党忠心耿耿”的“正义举动”，它解除了正常人对“出卖”、“告密”等卑劣行为的羞耻感，鼓励人们背弃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

党话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邪恶而变异的。在这个变异的党文化大环境下，某些荒谬的思维方式反而显得正常了。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中共鼓吹了近三十年，老百姓习以为常，把它当成了正确性不容质疑的金科玉律。可是稍微多想一下，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就象“布料是检验尺子的唯一标准”、“货物是检验天平的唯一标准”一样荒谬。如果一定要沿用这个句式，那么说“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还更合理一些。可能有人会说，你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此这般，在当时具有“拨乱

的“无产阶级”。

在今天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意识的外延更广泛，表现更复杂，但其实质都是按某种标准把社会成员分类，对于不属于自己的异类加以打击。这种深入生活的“阶级斗争”意识的具体表现有：强制别人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不尊重他人；攻击、贬低、抹黑别人，直接打击对方的心灵、名誉和人格；不讲道理，不好好说话；跟人吵、骂、斗；善于使用权力、利益、生活条件、人的感情或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渠道，用各种办法给别人施加压力、把对方镇压倒、弄服。解决生活中、社会中的问题也很少考虑他人，从积极的、建设性的、把事情办好的方面出发，常用的是斗争、带有破坏性的一套负面手法。

每个人的个性、才能、工作、家庭状况、财富多寡、生活环境、文化背景都不同，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存在着差异甚至矛盾。而共产党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结为阶级，推行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差异和矛盾，使得中国人看问题简单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而忽略了人的思维和行为本来是复杂的，不存在完全的对立或者完全的一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或者认同也不可能建立在没有矛盾或者没有不同见解的基础上。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也遗忘了为人着想，倾听他人意见，谦逊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西方的团队精神，包容化和多元化也无从谈起。稍微有不合或者差异，自然而然的就用斗争的手段解决问题。中国人的内耗内斗现象每个人都深有体会，阶级斗争的观念从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发动的政治运动中，民众尚需动员、威逼、利诱之后才能参与，那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随着人们的恐惧心在运动中逐步增长，随着中共灌输斗争思想、宣传“党的伟大”，跟随中共的指挥棒起舞、冲杀就逐渐开始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成为日常思维、行动的自然状态了。

结语

政治只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党文化入侵以后，中国人的私人生活被强行拖入政治。我们的传统节日被废除或者被篡改了内涵，我们被迫过党安排的节日，把党的喜怒哀乐纪念庆典当作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纪念庆典。婚姻大事要党操办，年轻人结婚时既无拜天地父母的仪式，也不表示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却要感谢党，向党表忠心。

我们讨论抗洪抗旱、控制生育问题时，应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中共没有科学决策，而是中共不可能科学决策。中共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不是科学决策，而是“斗争哲学”。“抗洪抗旱，战天斗地”反映了对自然的态度就是斗争。人口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投资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而中共偏偏放弃一切人道和温和的做法通过杀人和强制来控制生育。宣传“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则是鼓动女子与男人争强，背后仍然是一个“斗”字。“党指向哪就打向哪”，一个“打”字也反映了“斗争”思想。

经过中共灌输党文化中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之后，中国人在生活中习惯用斗的思想来解决具体问题。遇到矛盾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有话好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用强制、杀人、群众运动等斗争的手段。遇到与自然界相关的问题，想到的不是顺应自然，而是硬着脖子逆天而行。

深挖“斗争哲学”的根源，则与中共的无神论与唯物论的宣传有很大关系。正因为无神，所以不会敬畏天地，不会“仁者爱人”。这是斗争思想得以推广的原因。

只有剥离党文化，我们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笑,琢磨着自己今天可别那么傻了,那么政治化了,可别参与什么派系了。人们认为正是人们政治上的激情被共产党利用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现在人们对政治的反感和冷淡应该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荒唐事了。可是,大家看看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人人都体会到是文革再现,而且其宣传诽谤造谣煽动仇恨的攻势借助今天现代化的媒体工具比文革更是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过去的运动借助了人们盲目的政治热情,而中共今天的政治运动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正是靠了人们对政治的反感、恐惧和“明哲保身”的所谓超然态度。造成的后果都是“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让中共虐杀迫害民众的行径得逞。更可怕的是,由于今天人们的所谓“超然”和对政治的所谓“不关心”,使得中共的迫害能够更轻易地得手,更惨烈地展开,特别是当中共把迫害从地上转向地下时,在背地里更是使尽了阴毒的手段。

中共的政治就象高速行驶的火车,你只要坐在里面,你就是火车的一部分,不管你动还是不动,是主动地动还是被动地动。“超然”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只有人们都跳出中共的党文化怪圈,不配合中共的政治迫害,退出中共,解体中共,才能从源头上杜绝文革的再现。

阶级斗争观念的作用与表现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那个“打”字有讲究,那是中共阶级斗争思维活生生的写照。“对同志象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象严冬般冷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好象不打不斗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共产党自创立之初就建立了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宣言》称“迄今为止所有存在社会的(文字)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其后这一理论又被马恩列毛等发展。中共在夺取统治权之前需要鼓吹阶级斗争理论,因为这是其推翻当时合法政府的唯一理由;中共建政之后,不断开展阶级斗争是其巩固统治、杀戮异己的手段。所谓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了党文化的基石之一。

斗争哲学造成了一种全社会随时随刻都可以调动起来的准军事化心态,所以不管是哪一次大的运动,其动员速度都是惊人的。除了军队被塑造成指哪打哪的工具外,各个工作领域都被中共称为“战线”,当然也是军事化管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只要中共指出一个目标或一个方向,很多人就会立刻附和,一哄而上。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人们常常会看到、听到经济活动被称为“××战役”、科研上“打一场攻坚战”、职位调动叫做“赶赴新战场”,什么都带有“打”、“斗”、硬干的心态。不但在前面提到的“抗洪、抗旱”等对待自然灾害的问题上采取封堵和斗争的办法,在对待所有社会问题和矛盾上,中共的思路都是“斗争”和“强迫”。任何社会矛盾只要一露头,中共便用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日常生活中尚且如此,在中共真正进行阶级斗争,整人、迫害人的时候,表现就更变本加厉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所谓的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比如“历史反革命”、“右派”、“走资派”等等“阶级敌人”在被批斗之前,就早已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共产党仍然把他们列为阶级敌人,理由是,他们的思想、立场仍然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所以“阶级”的划分依据,实际上是人们的思想。思想不被中共认同的,一概被划为阶级敌人加以清除。

早年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被批斗的“资本家”,如今被称作“企业家”,只要其思想、立场被中共认同,就可以被划为“无产阶级”,加入所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中共党员;一无所有的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则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如果敢于上访喊冤、表达不满,说了中共不喜欢听的话,则可以用武力镇压这些真正

反正”、“思想解放”的意义。问题恰恰在这里。必须把这句话放到中共制造的荒谬社会现实中,它才显得“有理”。这就反证了党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是荒谬而变异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3) 党话使人难以和正常社会的人交流

人们接受了中共自我定义的党话以后,既无法清楚地向党文化之外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思,也难以听懂党文化之外的人说话的真正含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权”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人权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当一个西方人谈到捍卫人权的时候,他关心的是普通人的权利不受政府的侵害。同理,当一个西方人跟中国人谈到人权问题的时候,他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而不是中共政权的一边,这时一个正常人应该对他表示感激才对。可是经过中共长期灌输,很多中国人认识问题的基点是“这一定是西方霸权主义以人权为借口侵犯我国内政”、“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听到西方人讲人权,这些人可能比中共官员跳得还高。这种交流中的错位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损害中国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无法以一种开放平和的心态接纳来自外部的讯息,从而断送了校正民族发展走向的机会,使整个民族与正常人类文明始终格格不入。

结语:清除党话,说正常人的话

1) 如何辨认党话

要想清除党话,首先得能够辨认党话。辨认党话的根本原则是:顺着党话想下去,一定会得出维护中共统治的结论,这就是党话词语的“微言大义”。我们再来讨论一些辨认党话的简单方法。

多问一个为什么。近年来“搞政治”变成一个可怕的罪名。可是,中共不是号称是个政党吗?它不是号召人们都要参加其组织、都要拥护它,并且都要关心“国家大事”吗?这么一问,我们就会发现,中共是只许自己搞政治,不许人民百姓参与政治。又如“办实事”这个说法。为什么“办实事”也可以成为中共官员自我标榜吹嘘的资本呢?难道政府官员不就是应该办实事吗?不办实事难道还要办“虚事”吗?这么一问,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官员的本职工作是整人、进行思想控制、再搞点“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所以办一两件“实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值得炫耀的了。

问问说的是谁:由谁来做?为了谁?比如“稳定压倒一切”这句口号,我们不妨问问:谁的稳定压倒一切?老百姓的稳定,还是共产党的稳定?当我们发现答案是后者,就可以知道这句口号也是中共喊出来维护自己统治的。

看看经常和什么词搭配。比如,“宣传”(党的政策)、“贯彻”(中央精神)、“执行”(党的决议)、“高举”(……的伟大旗帜)等等。

看看同义词、近义词、或者反义词是什么。填履历表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民主党派”,就要在“政治面貌”一栏填写“群众”。为什么不填“无党派人士”呢?“群众”和“无党派人士”的意思相同吗?经过比较,我们发现,“群众”并非“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无党无派,而“群众”有想入党的愿望却不够格,“党”不要你,你只有接受“领导”的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群众”,也是党话词语。近年有些中国大陆作者在提起共产党的时候,用“执政党”这个词。为什么不直接用“共产党”这个词?“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存在的,在中国根

本就没有在野党，共产党和所谓“民主党派”的关系是独裁党和花瓶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执政党”这个词的使用，造成了中共是民选政府的假相，是对中共独裁政治的掩盖。与此相关，“提高执政能力”的说法也给人一种共产党在行使正常政府管理职能的感觉。其实，“提高执政能力”的正确解读方式是——巩固独裁权力。

进行场景置换。想象一下是否存在出现下列场景的可能：洛杉矶市市长在某次会议上发言道：“我们要认真领会加州共和党总书记××同志关于××问题的重要讲话精神”；NBA（美国职业篮球联合会）著名球星在接受美国电视网“西方之子”节目采访时说：“我们获得本次联赛总冠军，应该首先归功于民主党的领导……”

此外，进行纵向比较或者横向比较，也就是跟中国传统社会或者国际社会比较，也是辨认党话的有效方法。

2) 注意“党话的背景化”现象

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破产，党文化成了中国大众嘲弄取笑的对象，大量利用党话编出来的民谣、笑话、戏仿、反讽成了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人们用“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干部不怕吃喝难，百盏千钟只等闲”之类的话讽刺吃喝风，底层民众用“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政府是黄世仁，我们是杨白劳”这样的语言表达对中共经济政策的不满。

党文化确立以后，党话成了标准的话语方式。修辞是偏离标准的表达法。上面列举的由党话衍生出来的修辞现象，固然是对党话的嘲讽，可是同时也等于承认了党话的先入为主，加强了党话的“标准”地位。这时党话从明处退到暗处，从人们的意识进入潜意识，以一种更难以令人觉察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党话的背景化”现象。

变形的党话仍然是党话，而且是隐藏更深的党话。任何一个语词都携带着特定的信息，在民谣笑话里经过变形的党话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对人思维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这种语言。

目前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开场合谴责、控诉中共恶党。在这种时候，人们应该使用正常人的语言和正常人的思维骂恶党，而不是在党文化当中、用党话骂恶党。

需要强调的是，某些党话本来是正常人类社会的语言，可是被共产党改造以后，在党文化的环境中重复使用，染上了强烈的党文化色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后不能使用这些语言了。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正常的意义上、在正常的语境里堂堂正正地使用这些词，就象《九评共产党》恰如其分地把中共称作“邪教”一样。

3) 寻找真相，了解真相，传播真相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内建立并推广一个庞大的党话体系，依靠的是暴力强制手段、封闭的信息环境和铺天盖地的宣传灌输。因此，清除党话就不光需要不凡的道德勇气、拒斥党文化的道德自觉，更需要大量接触以正常人类语言为载体的真实资讯。如果中国人民拒绝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他们的努力就不能不从寻找真相，了解真相，传播真相开始。

新的中华文化呼唤着新的语言，新的语言将由那些道德上获得新生的人创造。

下面的民众呼应说“该杀”，就格杀勿论。在群情激昂中，没有人敢对“地主”、“反革命分子”表示同情。

第三种，中共在运动中先打压一批所谓“罪大恶极”者造成恐怖气氛，然后迫使每个人自我“坦白”、“检讨”，宣布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的政策，再充分利用人们希望早日过关的心理，使人们出于自保或投机而揭发陷害他人。这就使得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扭曲人性，“检举、揭发”亲人、朋友、同事，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党的一边”的。如中共早年的“延安整风运动”、1952年发动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等都是采取这种手法，迫使人们为了“过关”而互相揭发；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是采取了分配右派指标到各单位，强迫大家“揭发”同事。

自以为“党指向哪”就“不打向哪”，其实还是“指向哪就打向哪”

经过几十年运动，人们的思想变得更为复杂。相信共产主义的几乎没有了，对党魁的狂热个人崇拜也绝迹了，共产党的假恶斗很多人也看透了。现在共产党发动政治运动时，面对的百姓同过去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已经不愿卷入共产党的那些政治斗争去了，除了少数心怀不轨想捞取政治资本的坏人，大部分群众在这些运动中不再会积极主动地跳出来，而是觉得自己很超然了。这种“超然”，就是不去探究事情中的细节和对错，也不愿去听取别人的申辩和了解有关事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是一种间接的“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表现，在党文化中，恰恰因为人们不信任党，讨厌党、讨厌政治，反而造成“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荒唐事。

一方面，中共希望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打个比方，当一伙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而受害者出于绝望也可能就不会激烈反抗。如有人觉得中共对异议人士、民间维权人士、民间信仰的镇压等等与自己无关，甚至把放弃个人的良知、道德责任当作一种不介入政治的“清高”，让中共对民间的打压更加肆无忌惮。

另一方面，在党文化中实际上很难真正地“超然”。共产党绝不会允许真正的“超然”。你总得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上网站吧？偌大的国家，都是它的宣传声音，不可能不往你耳朵里灌。单位、学校、乡村和街道委员会也都是传达党的声音的通道。人们天天泡在政治中，不知不觉地，以为自己“不参与政治”的人们早已个个都成“政治家”了。这时，如果不反抗中共从而解脱中共的政治，而是消极配合中共，那其实就是在十足地展现自己的“政治面貌”了，哪里还有“超然”可言？

共产党的攻势一来，觉得自己“超然”的人们，是这样表现自己的“超然”的：党说表态，就去表态，党说签字，就去签字，党说谁谁不好，就跟着说不好，党说不要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说跟谁决裂，就去跟谁决裂；党把谁定了性，就不敢和谁接触，甚至宁可听凭中共的谎言灌输而不敢了解受害者的真实情况。“超然”超在不跟党“斗”，“超然”超在“党说干啥，就干啥”，“超然”超在“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这种“超然”，不过是“政治化的超然”或者说是“超然的政治化”，是参与中共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其实，这就是在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各种党文化因素在新时期的综合表现。

可能有人认为自己正是对政治反感，早已是“党指向哪”就“不打向哪”了，怎么反而成了“打向哪”？事实就是这样啊。人们现在觉得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可

斗争心态是紧密联系的。

为了生存或利益而跟随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有三种典型情况。先说第一种。各级政府、司法、执法、监督机构的官员、基层职员是执行中共“政策”的工具。中共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强迫他们就范，跟随中共作恶。一方面中共层层下达了硬性指标，完不成就要丢乌纱帽、丢饭碗，另一方面中共又采取或明或暗的奖励措施，用物质手段奖励那些违背良心追随中共作恶者。中国人十几年来到处都在骂贪官、骂腐败，但是中共有决心和力量打压异己人士、民间信仰，有能力封锁媒体、互联网，就是不能根治腐败，原因就是中共需要给各级官员以贪腐的机会，通过这种隐性的奖励，鼓励他们听随中共的指挥棒打压异己、巩固政权。有很多民众对于警察、城管人员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都很气愤，查一下互联网可以发现网民对他们几乎没有好评。原因就是中共希望给这些基层人员以非法手段“创收”的机会，鼓励他们忠实执行自己的“政策”，在必要的时候“党指向哪就打向哪”。

比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开始时有大批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中共把各地上访人数作为衡量当地“治安状况”的指标，造成各地官员、警察不遗余力地抓捕“上访者”、以体罚、酷刑和罚款强迫法轮功学员保证不再上访。各单位也是如此，常常是一人上访，全单位扣除奖金等等，用牵连措施迫使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仇视法轮功学员。

此外中共把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转化比率作为各级监狱、劳教所、拘留所的政绩指标，造成大批法轮功学员在这些机构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杀。很多官员、警察就告诉被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也是没办法，不然要丢饭碗”。各地 610 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的罚款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而 2001 年以后许多劳教所、监狱和医院勾结，残忍地进行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这都是中共给“第一线”忠实执行迫害政策者的隐性奖励。

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全面掌控社会资源，人们的生计已经和是否听从党的指挥棒紧密相联系了，观察风向保证自己不要闯到党禁忌的方向，也成了人们的另一种生活经验。比如中共的媒体、各级官员遇到关系到百姓生命的大事，如禽流感、SARS、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党中央”的态度明朗之前，一律闭口沉默、封锁消息。本来发现疫情要尽早采取隔离措施、通知民众防范传染，发现污染要早通知下游受到影响的地区采取补救措施，这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只要有良心就能做到的。但中共的媒体、官员在这种关键时刻生怕自己说错话，跟党中央不一致而丢了饭碗、乌纱帽，所以宁可违背良心也要跟随中共的指挥。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当“党”的喜恶并无可操作的明确标准时，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宁左勿右”，表现得比党的表面要求更过分。比如中共并没有在明确规定在互联网站点上含有哪些词的文章要封杀，但许多网站版主出于自保往往划定很大的封杀范围，比如含有“自由”、“台湾”、“独立”等词语的文章、对话完全有可能是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但很多网站把这些词语都列为封杀的关键词。

第二种，利用公开“批斗大会”等挑动民众的“革命热情”，在大家一哄而上的狂热气氛中，虽然很多民众明知被批判的对象是乡里、街坊的好人，但人们为了自保而努力表现出立场坚定，主动参与“批斗、揭发”。比如中共夺权不久发动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就经常采用“群众批判大会”，由党定性，然后挑动民众起来“控诉”，接着就随意处死。往往只要当地中共“领导”点头，

第七章 生活中的党文化

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都经历过漫长的积累和演化过程。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一代又一代帝王逝去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终结了，但敬天、信神、仁民、爱物的价值核心却从来没有失坠。

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部门，以满足人不同层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等等。政治的存在为社会服务，社会的存在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这些社会的基本内容对政治起着制约和引导的作用。当政权偏离了正义的轨辙，人们可以依据社会公认的准则规范政权、校正政权，甚至推翻政权（替天行道）、重建政权。孔子说过，“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说，朝廷失去礼仪，要去民间把礼仪找回来。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其重要性甚至远在政权之上。

传统中国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涵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会。健康的社会意味着心智健全的人民，而心智健全的人民不会听凭共产党愚弄和恐吓。因此，共产党要全面根除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因素，用党文化取而代之。

在共产党统治下，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一元化。共产党声称“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在一片杀伐声中，破除的是中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建立的是具足中共邪恶基因的党文化。

或许有人以为自己没有受到党文化的沾染，比如很少看电视和报纸上的时事，或者基本不参加政治学习。可是，中共实行的是“党领导一切”，而不是“党领导一切减去你的个人生活”。党文化对中国人生活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说，只要是生活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就不可能不受到党文化的毒害。

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深刻而彻底。历法节庆、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甚至家庭和生育，都被中共揉捏成它想要的样子。我们下面从几个简单的例子入手，讨论生活中的党文化。

1. 把中国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把中国新年叫春节

现在的中国人把传统的历法叫作农历或阴历，把“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这里所用“农历”、“春节”等说法带有明显的党文化含义。一个名词的改变看似无关紧要，但几千年历史的传承却会因此斩断。

1) 把皇历叫作农历或阴历

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历史的，中国对历史的记载之详尽和准确远非有着同样久远历史的欧洲或非洲可比。这固然由于中国人有记录历史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修史利器——纪年方式。

简单地说，“历史”就是对“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记载。如果纪年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会给修史带来极大的障碍。也正因为此，欧洲的历史在统一历法（十七—十八世纪）之前的年代常常是模糊甚至混乱的。

中国的传统历法以干支纪年。所谓“干支”是“天干”与“地支”的简称。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地支。纪年则按顺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为始，六十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

直至无穷。这种干支纪年的方式使中国历史摆脱了年代的定位问题,几千年后,中国人仍能很轻易的将中国史书中的纪年对应到西元的纪年上。

另外中国人也以干支来纪月、日和时。换句话说,由于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个字,每一个时刻都由年、月、日、时的干支来标记,因此共有八个字。例如 2006 年 6 月 6 日早上 6 点,就属于“丙戌年甲午月丙寅日辛卯时”,此时出生的人“生辰八字”即为“丙戌、甲午、丙寅、辛卯”。

中国最早的历法是轩辕黄帝颁布的。轩辕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因此,中国人对历法的重视可见一斑。《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都对历法进行了修订,在帝舜的时代人们对一年的天数、节气的划分已经相当准确。

由于轩辕黄帝是道家文化的创始人,因此中国人从文明之初就非常重视道家的阴阳学说。历法也表达了阴阳平衡的概念,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既不是单纯的阴历,也不是单纯的阳历。

现在人们常用的公历就是一种太阳历(简称阳历),它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基础,其月份的划分与月亮的盈亏没有关系,只是个名称而已;伊斯兰教历法是一种典型的太阴历(简称阴历),它完全以月亮的盈亏周期为基础定月份,每年 12 个月,大约 354 天,所以积 33 年与公历相差一年。

注重阴阳平衡的中国古人制定的传统历法,同时兼顾月亮的盈亏周期和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其历月的平均长度接近朔望月,定“朔日”(即月球位于太阳与地球之间,月球被太阳照亮的半球背对着地球,这一天从地球上看不到月亮)为每月初一日,所以月中则为“望日”(月圆之日);通过设置闰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是一种“阴月阳年”式的阴阳合历。它既能使每个年份基本符合季节变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与月相对应。此外早在舜帝之时,准确描述季节变化的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就已经完成,传统历法中的节气取决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位置的周期变化,属于太阳历范畴。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天人合一”,道家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因此极为重视对天象的观测。汉初司马迁写《史记》时,专门写了一章“天官书”,对星球的运转规律、位置以及对人间格局的影响做了详细的阐述。

由于天干地支对应着五行,并进一步对应方位、颜色、季节、五脏、社会结构等,因此成为周易预测学的主要依据。以干支纪月时,这里的“月”也是传统历法中的以月相盈亏为基础的月,即周易预测也必须基于传统历法。

在历史皇朝建立之后,皇帝登基,或者发生什么大事、天灾等,都会改年号,所以历法中又加入了年号。如我们所熟悉的“贞观”、“永乐”、“康熙”等都是年号。因为传统皇朝的历书都由皇帝颁布,与皇帝年号联系在一起,并且由官方刻印,因此传统历法被称作“皇历”。又因为最早的历法来源于黄帝,因此也叫“黄历”。

皇历以干支纪年,包括二十四节气的日期表,每天的吉、凶、宜、忌,涉及婚姻嫁娶、仪式庆典、建造搬迁、生活起居、祭祀安葬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历法充分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蕴含着自然循环运化的规律,即时(时间)空(方位)互动,和“阴”与“阳”的作用结果,同时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相生相克、祸福转换、改朝换代、循环往复等规律的理解,其背后反映的是道家文化和中国传统社会敬畏天地神明、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的价值观。

中国历法由于其阴阳平衡、天人合一、预测学内涵而成为中共消灭的对象。

经过长期的党文化灌输,人们在生活中“党指向哪就打向哪”,人人都有阶级斗争观念。具体表现在,党一旦对哪个群体“定了性”,甚至稍作暗示,整个社会或主动参与迫害,或歧视、疏远被党定为“异己”的人群,或对于被打击的受害者保持戒惧和冷漠,而民众的言论和行为,又进一步成为中共宣扬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的依据。

有人觉得如今中共并不搞阶级斗争了,人们的思想都集中在经商、捞钱,大都政治意识淡漠,党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还有一些人,自认为久经政治风雨历练,早已看破党文化的实质,厌倦了中共的政治运动,并不受其影响。

实际上,中共几十年来发动的残酷整人斗争,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以无神论和斗争思想为基础的党文化结合这种遍及社会、每隔几年重复一次的斗争形式,几乎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人们或因为受骗、冲动盲目跟随中共去作恶,或为了生存与利益而主动跟随中共去整人,或出于无奈而对中共的运动不置可否,或由于厌倦而不愿了解有关事实,其实都是在直接或间接配合中共加强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控制,都是在党文化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起舞、冲杀。

因为受骗、冲动盲目而跟从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这种情形,今天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们都比较熟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鼓吹的“人间天堂”梦幻仍然被许多人所憧憬,加上中共一贯以谎言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人们出于冲动和受骗在中共的号召下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举动。

如中共号召搞人民公社,人人都热血沸腾,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农村。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口粮无偿上交给食堂。没几年,就出现饿殍遍野的惨象。

中共搞大炼钢铁,全国上下就得以此为首要任务,都搞土法炼钢,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几百万吨什么用也没有的土钢废铁。同时很多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有人估计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河南省则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

中共提出除四害,于是连鸟雀都成了“战斗”的对象。男女老少挥舞扫帚,敲打锅碗,喊声震天,工厂鸣汽笛、汽车鸣喇叭,使众麻雀惊飞,无地可落,最后吓死累死。麻雀大减,害虫却大增,造成农作物大歉收,饥荒严重。

1968 年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很多人便热血沸腾,数百万城镇大中学毕业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到农村和边疆“战天斗地”,继续掀起“革命”新高潮去了(实际上是接受变相劳动改造)。

“文革”时中共鼓吹破“四旧”,很快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就成了打砸对象。无数文物被付之一炬。连名人祖坟,死人尸骨也是“革命”斗争的目标。孔子、王羲之、岳飞、海瑞、张居正、袁崇焕、蒲松龄……凡是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只要能找着,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中被掘了坟。

中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屋前屋后的蔬菜瓜果、家禽牲畜很快就被割走了。有些农民人为解决生活困难偷偷拿出些鸡蛋换日用品,马上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检举揭发。

这些造成疯狂的破坏力和荒唐行为的事,跟“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这种盲目

顶着大自然硬干，逆天行事。

此外，中国古人认识到天灾的出现是对国家失道行为的警告，警示当政者及百姓，如不悔改，更大的灾祸就会到来。商汤登上王位的时候，天下大旱，于是汤王在桑林设坛向上天祷告，检讨自己的行为，灾情因此而得到缓解。这就是历史典故“汤祷桑林”的由来。

不论是大禹治水，都江堰，还是商汤桑林祈雨，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灾的态度：因势利导与修德禳解，顺应天理和自然规律。而中共信奉无神论，一直进行自我神化和造神，以“伟、光、正”自诩，当然不会把自然灾害当成对其暴政的警告，更不会从而改过迁善。而中共常用的治国手段又深受斗争思想的指导，因此习惯于对自然灾害进行对抗。

另一方面，受唯物论影响，中共只在意自然界可以带来的看得见的经济或者农业利益，而忽视客观和最基本的生态规律，只把自然当作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很喜欢搞“大工程”，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折腾。为了在人们面前扮演无所不能的角色和展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量，中共愚昧地“围湖造田”、“焚林造田”、“辟草造田”，给中国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生态灾难。

举长江为例。中国自古有河患而无江患，是指黄河经常泛滥成灾，而长江则鲜少水患。这是因为长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大约有 4000 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而中共夺取政权后滥砍滥伐原始森林，造成蓄水能力锐减至 1000 亿立方米，3000 亿立方米蓄水能力被中共破坏，相当于 10 个三峡工程（三峡蓄水能力不过 300 亿立方米）。而中共围湖造田，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在 50 年时间失去湖泊面积 12000 平方公里，超过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积的总和。治理水患完全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涵养水土和放弃“围湖造田”这种人工破坏的方式来实现，而中共党文化词典中恰恰没有的就是“顺应自然”。

中共在内蒙古辟草造田，上千年形成的植被一火焚之，然后撒上种子种庄稼。开始的三年由于土壤覆盖着有上千年积累的腐殖质层，不用施肥即可获得大丰收。然而甜头也仅三年而已，庄稼没有固定水土功能，大风吹起加上雨水冲刷，土地迅速沙化。大片大片的千年草原，三年垦殖即毁坏殆尽，留给子孙不可逆转的大片大片沙漠和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中共新疆兵团为了在盐碱地种庄稼，耗费每亩数千立方米的水“淹灌洗盐”，即把土地用水反复浸泡，土壤含水量饱和后，下渗的水将耕土层中的盐碱带到土壤深层。两三年后，地下水位上升，将盐碱带回地面，耕地无法再用，原本的植被被铲除，只留下一片沙漠。仅 50 年代，中共用这种办法就制造了 200 万亩沙漠。塔里木河水位下降、最终断流，使原本沿河灌溉的绿洲也荒漠化，又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

不仅如此，更有中共培养出的所谓“科学家”提出用原子弹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 50 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的疯狂想法，其根源也是“战天斗地”。

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人们为了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环境，造成了今日中国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对于抗洪、抗旱，很多人习惯于看事情发生时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造成自然灾害的原因。实际上，造成中国目前各种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战天斗地”的党文化思维。

2)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中共建政之后，开始认为“皇历”代表了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并且其中有很多与预测学、风水等有关的内容，于是废止了“皇历”。叫“黄历”或“夏历”则会让人回溯历史，于是称传统历法为“阴历”。应该说，“阴历”的叫法是错误的，中国历法是“阴阳合历”，叫“阴历”就打破了传统文化中阴阳平衡的观念。然而，中共觉得“阴”仍然是道家的提法，还是带有修炼内涵，于是在 1968 年，中共以破“四旧”为名把传统历法叫成“农历”。

中共把传统的皇历叫作农历，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传统历法的作用仅限于农业，是计算农时的需要。这也是和中共唯物论的原则一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耕社会产生出的历法其作用只限于农事，只对农民有用，与现代社会、与其他人没有太大关系。传统历法由此而被边缘化。实际上如前所述，传统皇历的作用绝不仅限于农业，它和百姓生活更直接相关的部分，是其直接将“天地人”的关系反映在内的以天干地支为基础，根据五行生克确定的每日吉凶宜忌，以及以敬天信神为核心的各种年节、祭祀活动。这些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内容，能够使中国人时时回溯自己的文明传统。中共把它简单叫作农历，实际上是籍此贬低掏空蕴含博大文化内涵的传统皇历，截断传统文化的承传。今天的年轻人说到农历，只知道它和寥寥几个剩下的传统节日有关，还与农民种地有关，而不知道其中蕴含的深厚传统文化内涵了。此外在中共党文化中，农民常与“政治觉悟”不高，和“封建、愚昧、落后”等联系起来，中共把皇历叫农历是对传统历法的一种贬损。

2) 把新年叫春节

过年是华人社会最大的传统节日。《说文解字》中“年”的意思是“五谷大熟”。古人丰收后要感谢神明保佑，因此举行谢神祭祀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的重要仪式。

传统的新年是从腊月八日开始，直到正月十五结束。“腊八”是佛祖释迦牟尼开悟成佛的日子，民间与寺院都在这一天喝腊八粥，祈祷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接下来就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一天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民间认为灶王爷监看着一年以来一家人的一举一动，到了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天要上天庭去汇报。至除夕再贴上新的灶王像。这种活动是中国人“头上三尺有神灵”的一种表达。由于相信灶王的监督作用，人们自然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

腊月三十也称“除夕”，是新年庆贺的高潮，这是“祭神祭祖”的日子。其中置天地桌、贴门神、接福神、财神、贵神、喜神、太岁神、请灶王爷像、贴春联、放鞭炮等都与中国人的敬神传统有关。天地桌是供奉神佛和接神的临时性供桌。春联的原形是桃符，因为传说中鬼怕桃木，至五代时蜀主孟昶在桃符上题字“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成为正式的春联的开始。

祭祖也是过年的重要部分，大多是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祭祀的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上香跪拜。《论语》上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因此祭祖不仅是孝道的表达，也是对古人道德传统的继承。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共商量夺取政权后建政事宜，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似乎只是个普通的庆祝“春天”的节日而已。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叫法，同样是中共为了批判、替代传统文化、宣扬无神论的需要。这样一改，传统过年中感谢神明看护、尊敬神明与先祖的文化内涵就被去除了。

这时过年的吉祥话变成了“祝你今年能够上北京，见到毛主席”、“革命精神代代传”等政治话语，春联变成了“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敬神

祭祖”变成了“忆苦思甜”，组织看政治电影，组织有“教育意义”的联欢会，搞“团拜”，唱“人民公社新风多，婆婆婶婶都唱歌，春节不去搞迷信，大家上台演节目”。张贴的年画从敬神祈福变成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好”、“春节期间学习老三篇”、“全家学公报”。中共的报纸是这样描述百姓过年的：有人打算趁一家团圆机会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的准备大年夜吃“忆苦饭”——“这顿‘年夜饭’，是阶级教育饭，我们一定吃在肚子里，记在心坎上，永远不忘阶级苦，永远跟党走革命！”还有人计划开家庭批判会，或者准备看看亲戚朋友，一起交流“思想收获”，畅谈“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节日变成了共产党给老百姓洗脑灌输党文化的政治课。

文革结束后，传统的庆祝方式有所恢复，然而经过三十年的破坏，新生的一代已无重拾传统的可能。近二十几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被中共鼓吹为中国百姓的“新民俗”，然而晚会完全是歌唱“主旋律”，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主题贯穿始终，而且格调越来越趋于粗俗低下。千百年来蕴涵在新年中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感怀被中共破坏殆尽。

2. 取消传统节日，过党安排的党节

传统节日除了过年被中共叫成“春节”外，还有很多被中共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党节，以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与修炼、神佛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重要的传统中国节日除了新年之外，还有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盂兰盆会、中秋节、重阳节、冬至，此外还有浴佛节、七夕等。

元宵节在“正月十五”，原本来自于道教的“上元节”，传说中为天官大帝的诞辰日。汉明帝刘庄因为崇信佛法，于是下令寺院与民间在这一天放灯，象征佛法大明。自此，元宵节也成了灯节。

清明节是祭祖扫墓的时候；端午节一说起源于祭祀屈原、一说源自于龙神崇拜。中秋节起源于周朝，周天王每年中秋要祭月，后渐渐留下了赏月的习俗。重阳节为九月初九，按照中国的术数，“九”象征极高（道家讲九层天）、极广（九州方圆）、极深（九地之下）、长久等等，此时人们赏菊、佩戴茱萸、饮菊花酒等。冬至则是帝王到天坛祭天的日子。

浴佛节在四月初八，又称佛诞节、龙华会，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日子，这一天善男信女要到寺院进香、参加斋会，举行布施、放生等活动。七夕是七月初七，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盂兰盆会在七月十五，是荐亡的节日，起源于佛教中目犍连尊者依释迦佛开示，设盆斋僧，使其母脱离饿鬼道的典故。

略述中国的节日，可看出无节不与祭祀、神话或佛、道教有关。如果这些节日得以保留，并依循传统庆贺，则中国文化中与神有关的部分会代代相传，这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为了割断中国人和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传统文化价值之间的承接、联系，让中国人不再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保护，完全暴晒和浸泡在党文化之中，通过日常习俗对民众进行洗脑，中共除了正月初一这个被改称“春节”的节日而保留之外，其它传统节日，无一为中共的法定假日。传统的节日民俗被中共挤压得失去了生存空间，不得不遗憾地退出历史舞台。

同时，中共制定了其它“节日”，为其统治服务。这些“党节”包括“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

过节的时候，回溯节日的起源常常成为当天的热门话题，而中共所指定的节

找女人对男人的顺从和尊重，结果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人们更加淡漠对婚姻的责任感。现代中国社会的高离婚率和各种婚外情的泛滥，与家庭受到党文化破坏有很大的关联。

“男女都一样”还表现在女性的着装上。毛曾赋诗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更是女人的天性。中国女人到底爱什么怎么能由共产党的男性党魁说了算呢？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女人只能穿三种颜色：蓝、黑、灰，服装样式也限于列宁装、绿军装几种。一旦有人敢于穿带点花样的衣服，轻则受批评，重则被批判。共产党曾经专门派人把女人高跟鞋的跟砍断，把好布料做的裤子用剪刀剪开。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女人的无性化装束，着实吓了一跳，还以为中国穷到女人连裙子也穿不起，只好把丈夫的衣裤穿到大街上。

现在人们的衣服虽然花样多了起来，可是党文化灌输的观念还在顽固地发挥著作用。和其它国家的人相比，中国女人着装不得体，说话粗声大气，不够善解人意，行为也常常显得无礼。娇柔、优雅、端庄、细腻、体贴等女性美的体现，被共产党破坏得所剩无几了。

5. 抗旱、抗洪、战天斗地，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1) 抗旱、抗洪、战天斗地

提到自然灾害，我们脑海里会自动跳出抗旱、抗洪这样的字眼，浮现出排人墙、堵堤坝、人在堤在，严防死守等场景。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是：“与天斗，与地斗”。在党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中国人相信，对于自然灾害的处理，一定要用这种对抗的办法才行得通。“改造自然”、“战天斗地”被解释成英雄气概。然而以血肉之躯与洪魔做殊死搏斗，堵来堵去，险情还是接连不断，洪水还是冲决了大堤，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对待自然灾害，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启示。

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都十分熟悉。禹的父亲鲧治水采用“堵”的办法，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大禹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逢山开山，遇坡筑堤，疏通水道，依据水的流势加以引导，最终使其归海。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坝”，堪称人类文化精华。川西平原因为有了都江堰，变水患为水利，才成了肥沃富饶的著名“天府之国”。最为神奇的是，绵绵 2200 多年，它一直滋润着川西平原，迄今依然不倦地哺育着天府之国。在全世界还没有另外一个工程有如此之长的生命。

都江堰包括岷江中间的一条鱼嘴分水浅堤，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这条堤并不是去挡住洪水，而是在河当中，把洪水自动按四六分成，洪水季节外江六成，内江四成，而在枯水季节内江六成外江四成。分入内江的水进“宝瓶口”向东灌溉川西平原。为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内江水位过高，洪水经平水槽漫过飞沙堰入外江，保障内江灌区免遭水淹。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涡作用保证泥沙不在宝瓶口前后沉积。整个都江堰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和自然对抗，而是巧借自然之力以用其妙，化害为利，与自然和谐共处。

现代西方国家采用分蓄洪区减轻洪水危害，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也是暗合因势利导之妙。而对普通居民，标准的防洪措施是离开家，事先买保险，家里东西采取保护措施，尽量减少损失，而不是象中共那样

“平天下”不过是把“齐家”之道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在家庭关系中，“夫妇”关系又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样”，直接破坏了家庭的平衡与和谐，是中共颠覆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

在传统社会里，女性虽然在政治、经济、科研、军事等方面没有做出突出的成就，但在教育子女、维系道德和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母亲将慈爱根植于孩子幼小的心灵，待孩子长大后才会把这种爱心传递给社会。象“孟母三迁”和“岳母刺字”的故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如果没有深明大义的岳母的教导，也许就没有后来岳飞“尽忠报国”的壮举。

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强行改变女性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让女人和男人一样冲锋陷阵，去干自己难以胜任的工作。另一方面，照顾老人、教育子女的担子无人承担或无法承担好，对孩子的教育完全依赖上一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学校和社会，因此而造成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

鼓吹“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是中共进行全民斗争的需要。因为传统女性很少介入社会活动，这样一来，中共能操控的人就少了一半。中共宣传自己“解放”了妇女，实质是要鼓动女性参加所谓的革命活动，把从前温柔贤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性组成“铁姑娘队”和“红色娘子军”，把全社会都卷入中共的造反运动中。

“男女都一样”表面上好象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殊不知这样的观念是建立在对党文化的认同上。这种全然不顾女人生理上的不同而强迫她们做很多力不胜任的工作，用对男人的标准来要求女人，实际对女人是不公平的，是党文化下对女性真正的奴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恰恰是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构成了一个多彩的社会。每个人各有所长，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而在中共那里，要“统一思想”，把社会变成一元化的社会。对于男女这种天地生成的不同，中共则灌输“弱肉强食”的丛林思想，让女人觉得如果比男人弱就会被牺牲掉，就会被压迫。而女人如果想保护自己，就必须强悍起来。

女人弃柔从刚，等于放弃自己的长处，而以自己的短处去与男人的长处争强，于是失去自己很多本色的东西。女人除学习工作外，又得做好贤妻，又要繁衍后代，还得为自己要不要作良母挣扎，又得当男子闯关夺将，又得做女儿描红绣朵。中国女人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压力，感到做女人累。

“男女都一样”的观念导致了中华大地阴盛阳衰的现象。这种党文化造就的女性形象就是刘胡兰、李铁梅、江姐、阿庆嫂……等等，她们个个杏眼圆睁，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讲起话来气壮声粗。中国古代女人温情的一面被人为的抛弃了。这一点，很多女性自己也从书报、影视上发现了，日本、韩国、台湾的女人更会打扮，更有女人味。党文化指导下的女人在男性化过程中失去了温柔的特性，变得粗暴蛮横，强调女性实现人生价值的核心就是战胜男人的激进观念，造就了当今许多失去女性特质的女孩子，也造成了今天男女之间的恶性竞争、婚姻家庭关系的紧张。

人们在被党文化变异了的婚姻和家庭中很难得到有精神上的归宿感。女人要去顶半边天，做男人要做的事，势必使女人也变得象男人一样强悍。家里谁也不服谁，互相间的争强斗胜使家庭失去温馨。男人抱怨女人没有女人味，女人也恨自己的男人不刚强，窝窝囊囊。被女人压制的男人，不再可能顶天立地，拥有男子汉的尊严，变成了“妻管严”。很多男人在家里无法实现男人的尊严，就去家庭之外寻

日，无一不与“阶级斗争”或“革命”有关，或者是对它自己的里程碑的纪念，这种节日政治化的做法，目的就是让人顺服它的意识形态，以及庆祝中共的成立和发展。不仅如此，在党节里还不只有放假休息，每到党节，就组织“歌咏比赛”、“文艺汇演”等，为恶党歌功颂德。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共动辄给它的节日冠上“国际”二字，好象真是全世界的盛大节日。到了国外人们才发现除了几个共产主义小兄弟，人家外国人过的都是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根本没有“三八”“五一”“六一”的。共产党故意渲染“工人、妇女和儿童”是被歧视的阶级和群体，鼓动他们起来斗争。其实，恰恰是在共产党国家“工人、妇女和儿童”才是真正受到压迫的。共产党利用这几个节日不过是为了配合其阶级斗争的需要。

“三八妇女节”常见的活动是评选模范或者是“三八红旗手”，举行女性为主的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或者是表彰会、庆祝会、联谊会等集会性的活动。近年来三八节的庆祝被要求搞创新，但不管多少过法，主题可以概括为进一步借节日来加深人们头脑中“女人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党文化，表现党对女性的“关怀”，突出党让妇女“翻身”，得到“平等”地位，同时让女模范们对党歌功表忠心，对其他人进行洗脑。

“五一劳动节”起源于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五一变成党节，庆祝的活动给人灌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评“劳模”，从下到上，给工作出色，有成就的人或者是各行各业的突出代表以荣誉，甚至直接吸收入党，让人们感觉到自己被承认肯定，高兴之余不忘是党给了自己这一切。通过对这些优秀者的统战进行对各个行业的进一步控制，同时壮大自己的门面。

“五四青年节”则起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原本一场维护主权的爱国运动，经共产党宣传成为“觉悟了的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标志。

庆祝“六一儿童节”的主要国家都是“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儿童节”的起源莫衷一是，中共把这个节日也归结到“反帝”上。“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归妇联管，去公园也好，文艺演出也好，孩子过节却不能做孩子想做的事情，小孩要说大人想听的“小孩话”，各种活动由老师一手操办，其意义不单纯是庆祝和娱乐，“五讲四美”、“做接班人”、“知荣辱庆六一”等等活动的主题都要符合党的某个阶段的政策和要求。孩子们耳濡目染的是党文化里借文艺之名达到政治目的的一套，还有“主题队日”、“歌咏比赛”，天真的孩子们从小就被迫适应这套虚伪的做事方式。

不仅如此，六一前后是入少先队的日子，在“队旗”下宣誓：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小就把孩子们拉到中共的邪恶政治里边。

“七一”则是个不伦不类的“节日”，因为中共并非7月1日成立，却被中共规定为“党的生日”。实际上，中共是由苏共在1920年8月派代表维经斯基来中国建立的，党名也是苏共所取，当时称为“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又称中国共产党”，其使命为苏共所托付的“颠覆中华民国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1921年7月所召开的只是中共的代表大会。从常识推论，也是先有共产党，后有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是苏联人出钱召开的。后来投靠汪精卫成为第二号大汉奸的陈公博

是中共创始人，一大代表。他携新婚夫人借开会机会到上海“公费旅游”，住在大东旅社。7月31日，在陈公博住所隔壁发生一起情杀案。随后法租界警察来办案，中共才移至嘉兴南湖开会。当时成立政党是合法的，警察也并不是为了抓中共代表而来，而中共却将警察的到来渲染成“对敌斗争”的险恶。1981年，中共党史研究室根据1921年8月初《申报》上关于情杀案的报道推算出中共成立时间为7月23日，并写进《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

“七一”虽为“节日”不是“假日”，但却是各级党委和中宣部对社会开足马力搞宣传的重要时机。对外如此，对内亦然。党员要参加各种组织活动，党的各级领导要讲话，也是每年一次重新给党员充电，增强党性的机会。除此以外，新党员入党也多选在七一前夕。全社会承认七一作为节日的存在，就是承认中共对中国的占据。整个节日每年一次起到了给中共输血，加强中共生命力的作用。

“八一建军节”是为了庆祝中共称之为“南昌起义”的暴动。当时的背景是，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带领下于1926年发起北伐战争，讨伐北洋政府。由于人民的拥戴，北伐军进展顺利，国家即将统一。中共一方则在斯大林亲自命令下不断破坏北伐，甚至于要用武装暴动的办法打回广东去，以阻止国民党打垮北洋军阀。蒋介石被迫于1927年4月12日，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而中共则于当年8月1日发动南昌暴动，搞起武装割据。由于南昌暴动是中共掌握自己军队的开始，故被命名为“建军节”。

“十一”是中共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日子，却要求全国人民来共同庆祝所谓的“国庆节”。“国庆”活动即被赋予重大政治意义，作为庆典的主体，在北京举行国宴、阅兵、焰火、游行。一方面炫耀武力，震慑百姓，另一方面用焰火、国宴、园艺等粉饰太平，用天安门广场摆放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来“统战”台湾，用游行来伪造“万民拥戴”的假相。此时，电视通常要放“开国大典”等影片，缅怀中共“解放”的不易，人为把中国定义为中共建立的国，加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混淆党和国家的概念，给人错觉好象中国是中共建的。

事实上，现在很多华人将10月1日称为“国殇日”。自中共建党以来，带给中国人无尽的苦难，特别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造成了大约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出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毁灭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对于道德和生态方面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中共强迫人民庆祝它的成立与发展壮大，等于强迫人民庆祝自己日益深重的苦难。

中共把“五一”、“十一”变为七天长假，天数虽多，却没有自主调剂的余地。中国人常在这几天安排旅游、结婚或其它重要活动，这些活动常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以至于多年后也许还会指着自己的结婚照或旅游纪念照说“这是我某某年‘国庆’节照的。”从而潜移默化地将中共的节日，与普通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

3. 年轻人结婚，要新事新办，不拜天地神，唱感谢党的歌

1) 正统文化中的婚礼

正统文化重视四大礼节：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
“冠礼”是指成人礼，按照儒家礼节，男子二十岁行加冠礼以示成年，意味着真正承担社会责任的开始。“丧礼”是在人过世之后的丧葬仪式，常请僧道追荐亡魂。“祭礼”则是祭祖、祭神的礼节。中共夺取政权后，上面的三种礼仪都被废弃，这与其中包含的敬天敬神，“慎终追远”的因素有关。

相敬如宾就是这种状态的写照。

中共党文化不光变异了人们的婚姻礼仪，管制人们的生育，同时也重新规定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中共批判传统文化，把传统的人伦关系称为封建落后的糟粕，把家庭中的温情与人性贬低成小资产阶级的人性，是党性和革命性不够的表现，由此架空夫妻之间的人伦关系。人性被抽离掉之后，党还要灌输党性，鼓吹夫妻是“革命同志”，不承认夫妻之间的感情和伦理。夫妻“同心”要同党的心，“同志”要同党的志。夫妻间的信赖绝不能超过对党的信赖；夫妻之间的恩义绝不能高于对党的忠心。

家庭生活是婚姻的目的，中共恰恰相反，男女结合并非为了组织家庭，而是为了党，成为党的一个单元，是党搞革命的手段和工具，于是夫妻便成了“革命同志”。中共承认的十位“女革命家”之一、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写到自己的婚姻观：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家庭、亲情人伦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人类也因为有夫妻的家庭形式，才能在理性和道义的约束下繁衍和发展。然而，共产党用“革命同志”间的利益关系，取代夫妻间的人伦关系，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正如本书第六章《习惯了的党话》所分析的那样，夫妻之间称呼“同志”，是让夫妻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记得自己的“在教身份”，使中共邪教的阴影凌驾在家庭之上。首先是“同志”，然后才是夫妻。若一方被中共划为敌人，则不属于“同志”之列，因此而必须划清界线，抛弃配偶，靠拢党组织。将夫妻等同于“革命同志”，打破了夫妻间的传统亲情，破坏了夫妻的恩义与信赖，人们连枕边人都无法相信。一旦“革命同志”的关系被打破，夫妻之间的伦理也不起作用，直接造成了文革期间和各次政治运动中夫妻相互揭发检举，毫无人性可言。

对人造成最大伤害的常常是最亲近的人，因为对方知道你几乎一切的优点、缺点和弱点。一旦被最信赖的人伤害，人很可能会觉得天下滔滔，无处可以容身，人海茫茫，无人可以再信，进而怀疑一切。这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

“文革”结束后，革命的因素渐渐淡出，这种“革命同志”关系演变成了生活中的“同志关系”，只为了具体的目的和利益而维持家庭，夫妻之间情感的交流和相互体贴非常欠缺，家庭生活变得单调沉闷。很多家庭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夫妻甚至不知道今后要干什么。

3) 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俗话说男女有别，而在党文化多年的影响下，提起女性，很多人自然地回想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的话来。然而，男女本来就是不同的。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阴阳平衡，其实是讲了一个万事万物相互协调的规律，其中包括男女。男为阳，女为阴，男子的特性是刚直，女子的特性是娇柔。二者刚柔相济，和谐共生，而不是恃强凌弱。中国几千年的伦理道德中提倡的是夫妻之间恩爱为重，男主外，要承担家庭责任，要养家糊口，爱护自己的妻子，为她的终身负责；女主内，要上敬公婆、相夫教子，要疼爱自己的丈夫。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古代中国社会里，家庭和家族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人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遵循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现在的一对夫妇在供养四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父母老了就没有依靠,而国家又没有救助机制。在中国农村地区,一个家庭一旦生了女儿,那么在女儿出嫁而父母年老后,将无人、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失去生活来源。

计划生育还造成中国目前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衡。从前生了女孩,还可以接着生,直到有男孩为止。现在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许多人通过堕胎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性别选择,为了传宗接代,香火传承,流产女婴保男婴,结果造成男女婴儿比例严重失衡,如今达到 120:100,这意味着二十年后,会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大约 4000 万)找不到配偶,从而给社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控制生育还造成了城市年轻一代极少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们动辄成为一个个独享宠爱的小皇帝,造成了“骄娇”二气严重以及自私任性、缺乏责任感和缺乏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当这一代独生子女们成为社会的中坚时,他们的性格特点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

其实,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正如《诗经》所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即会降低至 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 1.82 和 1.11(以上根据 1986 年的统计数据,现在在进一步下降)。

习惯于杀戮和强制政策的中共,对于堕胎兴趣盎然,而对于有根本作用的教育,却毫无兴趣,投资比例之低令人咋舌(不到 GDP 的 4%,在世界排名到几乎末尾,不及非洲的乌干达)。按中共公布的资料,2006 年全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约需 2260 亿元;而中共公款吃喝仅 2004 年一年就达 3700 亿元。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停止公款吃喝,便足以让全国适龄儿童受到免费教育;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有效减缓人口增长的压力。

本世纪,许多国家采取了家庭计划的办法。例如印度,超过 21 岁法定年龄结婚者予以奖励、对生育了两个孩子后主动做绝育手术的夫妇在家庭福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给予照顾等等,但没有强制性措施。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国家也为家庭计划立法,但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夫妇有权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

西方国家面对低生育率,应对的措施无非是经济上提供补贴或者减税之类的鼓励,政府也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控制生育。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去管每个家庭的生育问题,更没有暴力机构去保证生育政策的实施。采取控制生育的只有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2) 夫妻是革命同志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文化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工业化最发达的美国,有“家庭观念”仍被视为重要的美德。

对于人来说,家庭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夫妻之间有恩义、有信赖、有体贴。夫妻之间敞开心扉的倾诉是消解心理压力的最重要方式,也是维系人心理健康从而保持生理健康的重要途径。

《诗经》上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传统的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刚直体贴,为妻儿遮风挡雨;女人温柔贤惠,主管家政,是丈夫的贤内助。夫妻如琴瑟一样相互和谐,两情相悦。婚姻的美满重在互相宽容、能体谅对方,举案齐眉、

然而“婚礼”毕竟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是中国古人还是西方人,婚姻为一生的约定,要拜天地神明,隆重其事。

《礼记》中专门有“昏义”一章(“昏”为通假字,同“婚”,因古人婚礼常在黄昏时分举行),规定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其中“纳采”指提亲;“问名”指询问女方姓名,以便占卜吉凶;“纳吉”指将占卜的好消息告诉女方;“纳征”指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请期”则指男方通过占卜择定婚礼日期后请求女方的同意;“亲迎”则指男方在婚期去迎娶女方。

儒家认为,婚礼是两姓合好,上则行宗庙祭祀的职责,下则养育后代,因此婚礼是恭敬、谨慎、尊重婚姻的正礼。迎娶之日,男女要先拜天地,请天地作为婚姻的见证;拜高堂,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并请父母做婚姻的见证;夫妻对拜,以示相敬如宾。

西方的教徒结婚则要上教堂,请天主为见证,不信教的人也要念誓词“从今以后,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足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都将爱护你、珍惜你,直到天长地久。我承诺一生一世,对你忠心到底。”

2) 中共对婚礼的扭曲

正统文化中的婚礼一方面表达了对天地神明的尊敬,另一方面将人伦之常通过外在的喜庆又不失庄重的礼节表达出来,有对祖先的敬、对父母的孝、也有夫妻之间的恩和义。

婚礼的细节常常成为人一生中最幸福的回忆,因此共产党也一定要把婚礼作为其巩固和维系统治的重要方式。在中共插手之下,婚事带上了强烈的党政治色彩。例如结婚需要“党组织”批准,不同“阶级”地位的相亲相爱会受到警告或不被批准。而党的干部则常常由“组织”给配一个,于是这样的家庭充满对党的感激,变成党的“微型战斗堡垒”。婚礼的仪式被鼓吹为“新事新办”,不再拜天地神明,而改为向党唱赞歌,用党替代了传统的神的位置。

《百年风俗变迁》提到了中共建政后的婚礼形式,除了在服装上去掉了男子的马褂长袍、女子的凤冠霞帔而改穿列宁装之外,证婚人也从天、地、父母换成了“党支部书记”。结婚的时间则选在“五一”、“十一”这样的中共规定的节日,“拜天地”变成了“向毛主席像鞠躬”。

至文革时,结婚前更要念一段毛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中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将婚姻私事上升到“革命”的高度。注意一个细节,就是“一切革命队伍中的人”才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革命性高于人性。同时还要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恩情深”,“毛泽东思想是传家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在婚礼庆典上,还要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向毛表忠心。

“天大地大”这首歌是 1966 年邢台地震后开始传出的。在婚礼之时唱这样“赞美诗”式的歌曲,无非是共产党神化自己的手段,并使人在回忆婚姻的甜蜜时自动想起这些赞颂中共的歌词。

即使在文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有工作单位的人,尤其是有头有脸的人的婚事仍然免不了党组织、党领导的介入,新郎新娘还得表示感谢党的关怀。尽管中共现在已经不再插手具体的婚姻形式,但经过几十年的间隔,正统的婚姻礼节已经被抛弃,而随之被抛弃的更是婚姻的神圣感与责任感。现在的很多婚礼,除了闹

得乱哄哄的,已经看不出其中的神圣与传统礼仪的规范了。很多的家庭矛盾、夫妻感情破裂、一夜情的盛行,与中共破坏正统的婚姻观念和婚礼形式不无关系。

4. 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党文化无处不在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除了完全占据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外,还全面介入一向被认为是百姓个人领地或隐私范畴的家庭生活。结不结婚、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何时才能生,党一概要管,而且是动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来管。

夫妻本是姻缘所致,恋爱和婚姻是人类富有浪漫色彩的永久话题,家庭更是人生航程的栖息港湾。家庭和睦,夫妻恩爱,那是人们所期望的幸福。但是,共产党却要把阶级斗争的战场直接开进每个家庭。夫妻变成了立场分明的“革命同志”,政治斗争从工作场所延伸到下班后的厨房和卧室,造成了变异的家庭关系。

上天造人,分为男女,是要他们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因此男女双方在人的特性和身体能力上各有所长。而共产党却要把女人变成男人,鼓吹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不但没有让妇女在求职就学和政治官场上的地位上升,反而把中国女人的温柔贤淑抹杀殆尽,造成了大陆社会特有的阴盛阳衰的恶劣后果。

1) 控制生育

中共有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党策”)叫“计划生育”,国际社会称其为“一胎化政策”,因为牵涉到妇女儿童权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争议。我们暂时撇开这些是非不说,单是这项政策出台的本身就有着很深的共产党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党文化因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按照这种来源于唯物论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数量和炼钢织布的产量可以相提并论,都是党眼中的“生产”,那么就象共产党搞计划经济一样,控制各种产品的生产量,共产党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毛和中共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称号。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写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彻底的揭发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1981年3月6日,中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强制要求少生孩子,“计划生育”遂成为中共的基本“国策”。

中共的“计划生育”和外国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计划”通常是得到政府补助、服务和相关咨询,由民众自愿进行。而中共的“计划生育”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提倡(在很多单位是强制)晚婚晚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除少数例外),育龄妇女要领取生育指标才能怀孕。

“计划生育”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胎儿未出生时,或者说流产可行时,计生委“执法人员”强制把非计划怀孕者送至医院流产。倘使胎儿在出生后才发现,计生委将“依法”对该家庭处以高额罚款。在实际操作中,共产党一

如既往地暴力当头,人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计划生育”执行范围广、时间长,又涉及胎儿生命,其过程异常残酷。特别是对“超生”的农民,中共整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无准生证,就不准生出活的来。即便生下来了,医生护士也必须把刚出生的无辜婴儿活活弄死。据估计,从“计划生育”开始,至少有四千万名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中共杀死。

从大陆乡村的口号和标语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杀气。“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并且不是说说而已。抄家、扒房、抓人、连坐、杀婴等等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2006年中国大陆媒体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武汉市黄陂区蔡店村村民黄求生因家境非常贫寒,没有钱上下打点,计生办的人冲到他家将已怀孕九个月的黄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给她打了一针堕胎药,当日下午黄妻将孩子生下来。然而那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计生办的人见状,就逼着黄把仍活着的婴儿丢掉。下午五时左右,一位姓刘的太婆听到街坊说,乡财政所后面的厕所里有小孩子的哭声。当过医生的刘太婆赶忙循着哭声找去,果然在男厕所的便池里发现了该男婴,只见他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便里。刘太婆急忙上前将孩子捞起,简单的清洗后,马上抱到隔壁的诊所,为孩子剪断脐带,打针消毒。一切处理妥当后,刘太婆用包被将孩子包好,坐在门口给他喂水喝。正在这时,乡计生办的五个人出现在刘太婆家门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刘太婆怀中的孩子,掼在地上。当时只听得一声闷响,孩子痛得四肢抽动,计生办的人还不罢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脚。之后,这伙人将小孩拎走,走了老远还听到孩子的哭声。最后,计生办的人将孩子放在水稻田里淹死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大陆,并非个别现象。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无神论教育的具体表现。即使发生很大的天灾或战争,屠婴都是重大的反人类罪行,而中共“无神论”教育下的各级官员唯中共马首是瞻,毫无“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观念,对杀害婴儿毫无负罪感。

西方国家有个传统,遇到危险时总要把生机留给小孩和妇女。尊重弱者权利的民族,才会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中共对婴儿人权的蔑视,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所有人的人权。中共对农民的压榨,对矿难的冷漠,对上访人员的无情迫害,甚至是对婴儿的杀戮,都反映出“弱肉强食”的价值观。结果就是中共人权记录的持续恶化。

人们可能会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人口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由政府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的主要是中国。这里不是反对解决人口问题,而是反对中共为所欲为不敬神明,特别是杀人害命的做法。

中共控制生育造成了严重后果,其表现为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面临崩溃的压力。